

第一部分 论领土财富

第三篇 在领土财富分配上，哪种方法能给社会带来最大幸福

我们迄今探讨了人如何通过劳动创造生活资料，以及劳动的结果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认识到劳动是我们所说的财富的唯一来源；因为劳动产生、加工或至少是收集自然物品，这是人类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但是，我们也已经觉察到，在错误的领导下，劳动本身也会造成贫困，而劳动的目的却是消除贫困。我们也明白，有时与其催促大家劳动得劲头愈来愈大，倒不如为了家庭和城市的良好规范，为了完善的政治经济学，给这种吞噬一切的活动规定一定的限度，使国家得以避免因自己工业产品壅塞而负担过重，并给劳动者们保证，免除他们承担互相进行竞争的后果。

为了准确地认识应该怎么办，使社会大家庭的最重要和最宝贵的阶级，也就是养活整个社会的那些阶级，能够摆脱看来正在威胁着它们的灾难，我们发现，这些阶级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阶级，而不应把我们的目光盯着事物的抽象性质；必须通过观察，认清社会生活中，什么使这些阶级幸福，什么使这些阶级遭殃，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加以研究，研究它们的风俗习惯，它们的家庭经济，并且只有充分掌握了事实以后才去考虑各种体系。

在对人类及其生活条件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应该首先注意从事人数最多，而同时又是最重要的一种职业，也就是使土地开花结果的职业，没有它，任何社会都不能存在，这种职业似乎是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只要看看，在想象梦幻中出现的黄金时代就是以这种职业为主题的，就足以证明了。然而，也正是这种职业最受人类贪婪之苦，遭到最残酷的横征暴敛、贫困和奴役的灾难。

的确，如果我们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待靠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两大类；一个类别是向土地索取其劳动果实的，另一类别是向人索取其劳动果实的。第一部分人仅仅致力于在交给他们用的土地上施肥，在土地上预支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种子，而期待土地用收获报答他们，无论在价值上和数量上都超过他们付给土地的东西。无疑，这也是一种交换，但这种交换是在人同大自然之间进行的。农人把他的资本交给了大自然，又从大自然那里得到他的收入；他是靠土地财富生活的；另外，他是独立的，并且可以说不怎么需要其他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在不止一个国家中，有的社会只是由农夫和收入组成的，他们只从事田间劳动，他们的妻子则在家里为他们准备衣服。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交换，没有贸易，除了同大自然斗争外，没有其它斗争。

第二类别的人生活在商业财富之中，只在文明的社交中来往，从来不会孤单。他们致力于互相交换服务、劳动或劳动成果，可以说，他们生存的任务是为农民服务，使他们免除由于田间劳动而没有能力照顾的事情，为他们准备生活中的各种方便和多余的东西，而农业则提供生活的最基本需要。

文明的进步，财富的积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两类性质最初看来那样不同的人混淆起来。一方面，领土财富的儿女陆续放弃他们的独立性，而愈来愈使他们的生产劳动依赖于贸易的运气，同时商业财富的儿女，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效劳，取得了同农人相似之处。然而，农田和城市两种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是足够用来从事科学研究了。

依靠领土财富生活的这一阶级的人是最古老的和最必需的。另一方面，依靠领土财富生活的那个阶级则是文明和进步的产物，因此总是为那些认为国

家的力量就在于财富的人们所欢迎。商业是由大量和多样的交换构成的，因而发明了大大方便和促进交换的工具：货币。这些交换涉及商业财富的资本本身，但只包括领土财富收入的一部分，社会愈不发达，这一部分也就愈小。因此，纯粹的农业国所拥有的货币要比商业国的货币少得无法比较。此外商业又建立了信贷，因为商人的资本往往一年要经过他手好几次，他就可以履行他所承担的义务，即使需要他拿出全部家产也行。另一方面，要是没有商业的帮助，地主得到他的收入是很困难的，就无法偿付债务，他的土地财产由于债务遭到损失。然而，长期以来，只有货币和信贷被视为财富。政府所觊觎的就是它们，政府用于国防的也是它们，又是它们使政府幻想商业财富十分重要，并认为这是社会的主要财富和资源。

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这种对商业财富的偏爱仍然保持下来，虽然对货币的性质、信贷的性质，大家更加了解了，虽然人们不再认为，把贵重金属吸引到自己国家里，不再让它们流出去，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富有了。其实，只要看看农业给那么多人提供工作和生活资料，人们本会响应絮利所说的这句话：牧场和耕种是哺育国家的两个乳房。但是重商主义体制总是从贸易的角度去看待农业，而财富学派虽然摒弃这一体制，但并没有采取更开放的观点。让·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精确地阐明了新学派是如何看待农业的。他说：“这是制造农业产品的工厂，应把它同其它工厂一样看待；这是一种交换，拿它所付出的一切生产费用同它所取得的产品来交换。这种交换是有利的，因为付出的东西少，而得到的东西多……因此他认为，每逢农业以相同的费用能取得更多的好处，或得到的好处一样，但费用却减少时，农业就在进步。”

这是一个原则，不单是萨伊先生一个人的，而且是整个财富学派的，所有今天自认为在促进农业的人都积极奉行这个原则。这是个富有成果的原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对其后果感到遗憾，并且设法加以克服。根据这些哲学家的意见，农业的兴旺应该根据它向农业经营者提供产品多少去评定。他可以由于生产得更多或者开支得更少而赚钱。他赚消费者的钱，办法是卖给他更大量的产品，或者卖的价钱更高。他赚他的同伙的钱，赚他的工人的钱，办法是设法得到还是那么多的产品，但无需用他们来进行原来由他们做的工作，或者让他们仍做原来的工作，但减低工钱。这样，他们所说的国家收益，其实是一种私人利润，是从国家的两种灾难中得来的，那就是生活资料昂贵，或者是工人贫困。

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从更为广泛得多的范围来考虑领土财富问题。应该把这一财富看做国家的最大利益，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从这上面取得生活资料的，而在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里，人口的大部分是把自己的劳动用于土地上，并从土地得到自己的酬劳的。正是在这双重的观点下，我们提出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在领土财富的分配上，哪种方法给社会带来最大幸福？

首先有一个疑点。人在土地上劳动，但土地本身不是劳动的产物，这是大自然无偿的馈赠，就同空气、水、火、光亮一样，这好象是给全人类的一种馈赠：那么，为什么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呢？为什么另一部分人却得到专门的特权呢？这种特权难道不是变得特别昂贵吗？因为一个国家所能支配的土地是固定不可更改的和不能伸展的，所以其拥有者对这些土地实际获得了垄

断的权力。

土地的这种公有制并不是一种推想，狩猎民族，畜牧民族，以及过去那些开始在农业方面寻找资源的民族都实行这种土地公有制。他们的经验应该能答复我们的疑问和澄清我们的理论。狩猎民族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原野上漂泊，把土地视为是大家所有，不分彼此；他们不可能想象在他们之间瓜分土地，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东奔西走，追逐总是在他们面前逃跑的猎物。这些猎物是他们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另外，他们无法为将来做些什么准备，他们不能进行积累，他们没有收入。狩猎给他们提供一种很不稳定的收益，也就是他们对野兽进行可怕的赌博的采头，因此，也是同自己进行赌博；因为他们每得到一分好处，就等于减少自己一分资源，任何生产劳动都是进行创造，而他们的生产劳动却是进行毁灭。今天，他们杀了许多猎物，他们生活得富裕了，同时却造成未来的衰落；因此，饥荒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们，很快就会使他们这个种族灭绝；红种人和野兽在森林中愈来愈少了，红种人并不比野兽更能抗拒文明。

畜牧民族形成更强大和更持久的社会。有的国家，如阿拉伯和鞑靼，好象天生注定不会有别的居民似的，而另外一些地方却相反，它们漂泊不定的民族定居下来了，因为人口增加了，而社会也同意给他们以进行农业劳动的保障，阿拉伯人和鞑靼人是不给予任何这种保障的；他们说，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就同空气一样，同水一样；他们不能容忍在他们那里把地圈起来，不能容许有什么最先占有的特权，因此，他们不会让任何人产生这种欲望，增加土地的肥力，在那上面进行劳动而不收取果实。但是，他们承认和保障牧人对他们的畜群的所有权；因此，他们鼓励牧人繁殖牲口；成千上万的牛羊听从牧人的呼唤。它们的奶和每年产崽就成为牧人的收入；畜群的多少同大自然在无人照管下生产的草料多少相适应，狩猎民族所追逐的猎物吃掉的可能还不到大自然 1% 的草料。由此可见，人类最初照管的不是土地，而是依靠土地生活的牲口，人类也对大自然的产品、对作为大自然的儿女的牲畜的所有权给予初步的保障，这种照管和保障无限地增加了人类的资源及其生活资料。

在畜牧民族中，过去在日耳曼，今天在波斯边疆上，都有一些人愿意从事农业，他们容许围上一块地，在上面播上种子。但是，他们最珍视的是平等而不是富足，他们要求在收获后，每个人的那块土地仍交还集体，在需要时再行分配。在美洲的某些狩猎民族中，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红种人在他们的草房周围种上一点玉米，种上一点土豆；但是，在收获以后，他也许随着他的部族到几百里以外去打猎，所以，他不要求占有土地。收获后，他就把那块地抛弃，他不会想到要开荒、种植和从事任何永久性的劳动来增加土地的财富。

但是，保障农业的常年劳动是很不简单的，整个社会都从中得到好处。人类通过驯养家畜已经比通过猎取野兽从土地得到多得多的生活资料，他们又从种植谷物取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要比从谷类的自然生长中取得的多得多。所有权得到了新的保障，已经扩大到更多的大自然无偿的馈赠上，而整个社会都从中得到好处。只要社会的一些成员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所有人就都生活得更舒适，整个国家都得以免除饥荒。

经验证明，占有土地的用处是用不着怀疑的。猎人、牧人在一块地上播了种，就可以不再过那种漂泊的、匮乏和贫困的生活而享受富裕和稳定了。

他清楚地看到，他的圈地和开荒劳动愈是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他得到的好处就愈大。从他播下第一颗麦种那天开始，他就想永久保有那块地。这种欲望之所以未能占上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由于别人分不到土地而嫉妒之故，因为有足够的土地使每人都有份，而是由于野蛮种族固有的掠夺嗜好。每个小小的社会都有那么一些邻人，想在他们没有播种的土地上收割。农业使社会依赖于他们，因为它把社会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使其处于守势。每个小小的社会内部都有一些狂暴的人，他们不服从任何规则，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制服他们。自己人和敌人的双重掠夺使流浪民族长时期不能定居下来，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要是以农业为生，他们就会不再贫困而富裕起来。

田园生活保证大家的福利，这种认识最后占了上风；国家保证每个公民有进行劳动去改良土壤的私有权。由于劳动总是同土地分不开的，所以对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便随之而来。于是，人征服了大自然，使它面貌焕然一新；这样，人们就可以认识，土地可以产生什么财富，而大自然的馈赠是多么贫乏，两者之间差别有多大。不仅这样，人们还可以认识到，是什么因素使人们具有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去劳动，又是什么因素使他们集中力量去为有益于自己同类的目标去奋斗，这就是对土地的永久私有权的认识。最肥沃的土地总是水流冲积而成的土地，但同时又是洪水泛滥所威胁的地方，或者遭到沼泽侵蚀的地方。在得到永久私有权的保障下，人便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使沼泽有一个排水口，建筑堤坝来防洪，利用灌溉渠道来把肥沃的水引到土地上去，而在过去，这些水却使这片土地注定颗粒无收。还是在这种保障下，人们不再满足于每年从土地得到的收成，他们从野生植物中，区分出对他们有用的多年生作物、小树和大树，他们通过栽培，加以改良，可以说改变了它们的本质，并且加以繁殖。事实上，在水果中，可以看得出有一些是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栽培才达到今天的完美程度的，还有一些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引进的。与此同时，人类把土地深深地翻开，更新它的土质，把它的各部分混和起来，加入空气，使它更加肥沃。他们把丘陵上正在流失的土壤固定下来，把原野的全部面积用茂盛的作物覆盖起来，使得无论什么地方都对人类有用。在这些劳动中，有的是他们在10年或20年后才有所收益的，还有的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几个世纪中还可以享受得到的。所有人都同心协力去增加大自然的生产力，使人类得到无限地更加丰富的收入，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由那些没有土地产业的人消费掉的，这些人似乎由于土地瓜分而遭到剥夺，但是如果土地不瓜分，他们本来可能找不到饭吃的。

就这样，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便发明了，并得到了保障，使大家都得到好处。这个起源是不应该忽略的，因为，所有权只有根据它设立时所确定的目的来管理才是正当的。地产交给私人经营，以便使他可以增加生产和社会收入。因此，如果业主滥用交给他的土地去限制生产和为自己谋取收入，不是从土地那里得来的，而是剥削其他人得来的收入，那么，他的作法是不正义的、不正当的。地产交给了他们，是要他们在得到产业的永久权利后，永远为了未来的利益加以管理。如果他把这块土地放弃给一些只关心每天的利益、暂时的利益的人，并因此剥夺了整个社会由于这种永久所有权而应得到的好处，他就是把土地用于不正义的、不正当的用途。因为，他之所以得到这种永久性的保障，本来只是为了让他回过头来保证农业财富得到不断发展。

我们所设想的幸福，莫过于一个民族从事耕种土地，亲自劳动，并且懂

得赋予自己一个相当有力、相当自由的政治组织，保证从事耕作的人能够享有土地的果实。这就是大部分新生的小民族的命运。这些小民族不再过飘泊的生涯而定居下来，向文明迈进。正是由于作出这重大的一步，古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取代了佩拉热派教徒，并从此以后，他们的民事和军事优越性在几代人中不断得到蓬勃发展。在这些社会的始源，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亲自耕种的土地的绝对主人，他用不着向任何人交租，每一个人都有劳动的同等权利，都可以得到同等的好处。劳动在全年均分开来，每天都有要做的活计，每天都有休息的时候，有享受的时候。食物是从土地生长出来的，而且是多样化和丰富的；衣服也是从土地生长出来的，大麻、羊毛、动物的毛皮提供了原料，但是衣服是在家里由妇女缝制的。当时，罗马已经国力强盛，声名大振，但它还没有任何工厂、商店、贸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城市工业都是在自耕农的家庭内部进行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里，已经有一个可怕的制度了，那就是家庭奴隶制；但还只在萌芽状态，只有在更加富有的时候，才可以预见到它可能产生的苦果。当时，奴隶制还不过是一种措施，缓和一下战争的权利。在小部族之间进行的这种战争，并没有留下什么深仇大恨，他们都是同一种族，说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都相同的人。俘虏给叫来同主人一起劳动，同一张桌子吃饭，同他的儿子们结合在一起，因为在罗马的立法中，儿子受父亲的支配，同奴隶的地位是相同的。因负债而被捕的人也受到同等待遇。奴隶制还不过是少数特殊情况，还没有玷污劳动，等到大财产建立起来，就完全改变性质了。

只要古老的欧洲仍然分为自由民和自耕农，它们就以奇妙的速度日趋繁荣；庄稼从平原一直伸展到山巅，增加土地肥力的一切方法都陆续发现了，土地的产品一批接着一批种出来了，满足了人类的各种口味。罗马的大片原野，今天已渺无人烟，但在当时，人丁兴旺，生气勃勃，人口密集。根据估计，5阿尔庞的土地就足够养活一家人了；然而，尽管经常发生战争，人口仍不断增长；就象一窝蜜蜂，每年都生产一巢蜂那样，每个城镇，经过一代人的发展，就要把一批移民送到外面去。这一批移民，还是根据那些原则，重新取得社会进步，成了许多自耕农，设法从农业中得到一切，他们迅速地繁荣起来。就是这个时候，人类分布于全球，他们互不依赖，生活富裕，讲道德，国家从而扩大起来。以后，它们的命运就随着政治和战争而沉浮。

历史上曾在意大利和希腊呈现过的光辉灿烂时代的美景，也就是田园幸福，在我们这个世纪也不是找不到的。凡是可以找到自耕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种富裕生活，安定的环境，对前途的信心和独立性，既保证幸福，又保证各种美德。农民带着他的子女，在他继承的那份产业上，担负起全部工作，上不向任何人交租，下不给任何人发工资，量人为出，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吃自己的麦子，喝自己的酒，穿着用自己的大麻和羊毛织出来的布，用不着关心市场价格，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出售，也没有什么可以买入的，从来不必害怕商业上的革命。他对前途一点也不担心，他充满希望，憧憬着越来越美好的未来。因为，除了一年的劳动外，空下来的每一刻钟，他都可以用在他的儿女身上，都可以为未来的世纪效力。他只需拿出很少的劳动时间，便可以把一颗种子埋在地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一棵大树；他可以挖

佩拉热派，公元五世纪时下列瞩目的异教徒，否认赦免和原罪。——译者

阿尔庞（Arpent），旧土地计量单位，约合20—50公亩。——译者

一条排水沟，使他的田地干燥，可以修建一条管道把活水引来，可以不断地从他的空暇中抽出功夫改良他的牲口和树木。他小小的祖产是一个真正的聚宝盆，储蓄所，准备随时吸收他的一切微小的收益，利用他的所有空余时间。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使这一切开花结果，成百倍地把这一切归还给他。农民深切地感觉到这种幸福是同他的业主地位分不开的，所以他总是热衷于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代价。他出的价钱比土地的价值还要高，也许他自己也无法从土地的收益里再收回来；但是，他是多么有理由高度估价今后的好处啊！他可以从事有利可图的劳动，而用不着贱价出卖劳动；可以需要时就有面包，而用不着高价去购买。

我们应该到瑞士，应该去那里到处走走，研究研究这个国家，以便判断自耕农的幸福，我们应该学会去认识瑞士，从而认清自己耕种自己收获果实的农业，可以使人口十分众多的居民生活富裕，使他们具有独立的性格，这是拥有独立地位的结果；能促成巨大的消费贸易的存在，这是全体居民享有福利的结果。尽管实行这种办法的国家气候是严酷的，土地并不那么肥沃，而晚霜和季节不正常经常使农人的希望破灭。不管是到喜气洋洋的昂默塔尔去观光也好，还是深入到伯尔尼区最偏僻的山沟去也好，看到区区一个小农民的这些木头房子，那么宽敞，那么严实，建筑得那么好，有那么多雕刻，确实无法不欣赏，无不为之赞叹的。在屋子内部，宽阔的过道通在为众口之家而设的各个房间，每个房间只有一张床，都有大量的窗帘、被子和最洁白的被服，室内陈设着精美的家具，橱柜装满了衣服。牛奶场宽广、通风、整洁、雅致。在同一个院子里，还可以看到贮存的大批麦子、成肉、奶酪和木柴；牲口栏里有全欧照料得最好、最美的家畜；院子里种着花草。男人和妇女都穿得既暖和又大方，妇女们还保留旧日的服饰给人以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印象。这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特点，因为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不再受到恶习和贫困的折磨。其他民族可以因富足而自炫，但在他们面前，瑞士总是可以为它的农民而骄傲。

自耕农是庄稼人当中从土地得到最大好处的人，因为他是最为前途着想的，是最富有经验的；他也最善于利用人类劳动，因为他把劳动摊分给家里的每一个人，一年 365 天中每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无活可干；在所有庄稼人当中，他是最幸福的。同时，在一定的空间里，土地要养活那么多人，为他们提供工作，那就只有当这些人都是业主才行；最后，在所有庄稼人当中，是自耕农给予商业和工业以最大的鼓励，因为他们是最富有的。

我们是否得出结论说，所有业主都应该是庄稼汉呢？不，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那里有穷人也有富人，我们认为处境的多样化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在我们看来，富人阶级是必要的，因为精神上和智慧上的才能只有在完全空闲时才会得到发展，因为物质活动使其他的才能变得迟钝，经常不断地关心金钱利益使人的心胸狭窄。人的最美好的精神进步应该超脱个人私心，而不应该是为了私利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平等的，虽然他们都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但要是他们不能把自己提高到美术、高级科学和崇高的哲学的水平，在我们看来，这个国家便被剥夺了上苍赐给人类的最美好的礼物。更有甚者，它就没有能力充分地发展社会科学以保持自己的幸福。我们并不认为，成为人类先锋的人总是出身于富有阶级，但是，只有富有阶级赏识他们和有空暇去享受他们的工作，富人更主要地可以被视为智慧财富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没有他们，那么，除了眼前有用的东西以外，就不

再会有艺术、文学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在人的发展上，一切先验的东西都会遭到抛弃。

在一个国家中，保存富人并不就万事大吉了，富人当中，起码有一部分人应该住在乡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具有这种愿望的。他们中间那些不为社交乐趣所引诱的人，对于我们为穷人要求的大自然的乐趣，他们希望至少也有一份。此外，土地所有权使富人养成的一些品质，是国家应该注意加以保持的。生活在乡下的业主同人民更为息息相关，他们更了解人民，他们同所居住的省、县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和感情，他们对过去的时代有更强烈的怀念，对后代有更真实的热情，他们的产业世代相传使他们对乡土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其它各种事物的日新月异的改革中，他们是保守的，他们不去追求捉摸不定的机会，这种机会刺激那些暴发户一掷千金，沉湎于一朝一夕的淫乐。他们不象这些人那样去冒争权夺利的风险和受到憎恶、仇恨，因为，他们的灾难是来自天上而不是人间的阴谋。最后，他们生活于乡村，促使乡村文明化，传播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众化的温和的风尚、爱好和高雅品质，还引进了高度科学的文化，不仅是这种文化本身，而是使得有可能利用纯理论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只要让人的利益无拘无束地得到发挥，那么在自由和所有权得到保障的每一个社会里，一些家庭就可以康乐和富裕起来。立法者无需去制造有钱或有势的人，但是社会对他们的保护和干预是必要的，以便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保持着公认对社会最有利的那种平衡。毫无疑问，社会上应该有富人，但是不应该让所有的产业都归富人所有，法律可以保障穷人拥有他们的一份土地财富。社会需要有更多有钱的人，而且到处都需要，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富人，使他们有利的影响能扩展到国家所有地方；因此，立法应该注意不要让产业集中在太少的人手里；因为每逢两份祖产合并在一个家庭里，社会就会损失两个富人中的一个，同时也就丧失了它希望由于富人在乡下而得到的好处的一半。

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实施的办法和看看应该对法律作出那些改变；我们只是根据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和财富对一切人的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去寻找指导原则。我们设法去认识一个兴旺的国家应该希望得到什么，然后才放胆给它规划应该做什么。就我们所见，这些指导原则同今天的实践相去甚远。简直可以说，法学家甚至不相信应该探讨一下，哪种分配财富的办法对所有人的进步和幸福最为合适。一些人仍然认为，私人利益是通往公众利益的最好途径。他们要求放任调节分配财产的一切贸易，听其自然，让穷人和富人自己去争夺，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由制度。另一些人则确信民主从四面八方威胁着权力和所有权，他们一心只想保护和增加财富；他们为此发明了长子继承法、代理继承法，以及分配上种种不平等的办法，给予古老的财产以种种特权，他们认为，这些办法最能保证他们的财富万世长存，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保存制度。

然而，人类并非任何时候都看不见这种社会幸福的，我们就是从那里得出指导土地财产立法的原则的。人们曾多次体会到国家主要是由广大农人群众组成的；国家的幸福和力量应该从农民的幸福和安定那里去寻找。于是，人们为农人制订了针对农人本身的保证，使他们不致于企图剥夺富人的所有财富。为此，就应该做到使自耕农永远保持着差不多的数目，使得构成他们小小遗产的土地永远不会为封建主的大财产所兼并。法国曾经做到这一点，

办法是将土地分为两种，即贵族的和平民的两种。蒙洛西埃先生认定这种区分始于高卢共和国时代。他说：“土地是有地位和等级的。封地是给富人的，纳贡地是给穷人的。”这种分类似乎更多地带有中世纪的特点，当时是实行这种办法的。封建主不能购买平民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本身包含有一种卑贱性。同样地，在英国贵族拥有终身产业，农民得到的是法定产业。但是，到了今天，法定产业不再影响业主的身分了，因为所有法定产业都叫富人赎买了，英国再也没有农民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在奥地利，政府是提防智力发展的，但是常常有效地保护物质利益，法律保障农人占有的土地份额不会减少，贵族买了农民的地，必须重新卖给一个农民，并且不得改变土地的性质。

我们比较难以找到更多的法制例子，它保证富人平均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并且是阻止几份祖产合而为一的；因为，虽然由于财产的合并减少了富人的数目，从而削弱了他们那个阶级，但对个人却是有利的，而且，一般来说，因为是他们行使权力和制订法律；因此，他们几乎只是想到如何保住他们一旦得来的东西和不断地予以增加。然而，在人们把土地产业更主要地看成是军事力量而不是财富的时候，大封建主是不容许把他们的府第抛弃掉的。虽然由于继承遗产，把几座府第合并为一个家族，但是，他们坚持每一块战功封地都有一名骑士专门服役。一个社会保障富人的财产，认为这是对所有公民都有好处的，它要使富人分布于它的领土的所有地方，它就一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比过去的封建主关心不抛弃任何府第，更为关心这个小小的文明中心，这个慈善事业基地，这个农村小型贸易市场不要对穷人关闭。

事实上，立法者的眼睛应该经常注视着的是农村的贫苦居民，贫苦农人，其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一般是能比较好地保卫自己的；但是，在各种利益的斗争中，最接近贫困的人总是最易受到压迫的。普遍竞争促使每一个人设法使对手坚持不下去，以便同他达成最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未来贮备较小的人总是最先顶不住；穷人是等不了的，于是，在争夺土地财产的斗争中，穷人遭到了残酷的剥夺。

我们已经看到，贫苦农人由于分享一份财产而多么幸福，例如，在所有这些古代小民族、罗马人的同时代人中，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所有权如何使乡村充满众多而好斗的居民，他们利用丰硕的农业果实，把富裕带到每一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今天在瑞士，农人仍然那么幸福，而在不如那里自由和管理得不如那里好的国家，农人也接近于这种幸福；然而，当专制一旦压迫一个国家，农民就成为最先的受害者。商业财富是流动的，商人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财富藏起来，躲过压迫者的耳目，但是农业财富永远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生产它们的人是不能远离它们的；他们由于生活所迫，在暴君的鞭子下苟延喘息。

在东方的专制制度下，对农人的苛政是由一个主人来施行的，在西方则是由好几个主人来施行的，而后一种苛政可以成为最残暴的。社会上需要建立一定的秩序，有钱人的财产需要得到保障，然后，他们才能精确地算出，只要让穷人得到多么少的一点东西，就可以驱使他们工作。在罗马全盛时期，奴隶们是唯一担负起全部农业劳动的，他们的痛苦和他们所受的压迫，同殖民地的黑奴们一向所遭受的同样可怕。但是，当专制的进展使财产失去一切

保障，当所有疆界都向野蛮民族打开时，就可以看到，唯一承担田间劳动的、被奴役的居民减少了，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在罗马的奴隶中，一部分被野蛮民族征服者抢走，然后在其他市场上再卖出去，另一些人自己在自己的阵营中找个地方躲了起来，还有一些被召去做工，除了做自己那份工作外，还要做逃跑了的人的那份工作，他们由于劳累和贫困而死亡。人类从来都没有那样濒临于灭绝：奴隶制不再能够维持多久了。

在亚洲的君主国中，耕作看来不象完全交给奴隶去做，农民如果不是因为希望得到表面上的所有权而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就会逃到沙漠里去，经过几个星期便死在那里。的确，人家让他们相信他们是自己田地的主人，而每年向政府交纳称作米里（Iemiri）的税款，这个政府对他们进行无法想象的横征暴敛，但却不能保护他们防止政府自己的手下、或各式各样的头头、匪徒轮番地剥夺农人。

在英属印度，亚洲这一套体系受到比较明确的规定所约束，它得到了巩固，这是值得加以认识的，以便估计一下生活在印度公司统治下的 2,400 万农人的命运。这个公司继承了君主的权力，被视为唯一的地主，所有从事耕作的农民，即被叫做“里奥”（ryot）的人都是从公司那里得到土地的，他们缴纳固定的租税，以实物偿付。为了从“里奥”手里征收租税，便使用那些叫做“泽曼代”（Zeminder）的收税人，已经记不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詹明达尔”自己留下十分之一的租税，把其余的交给君主。在伊斯兰君主统治下，“詹明达尔”又是警察法官，负责他们县区里的治安。今天，他们的职责则只限于收税了。但是“里奥”或世代相传的佃农受到保护以防他们勒索。在每一个省，都有一个最高限额，叫做“纳里克”；每个“里奥”的租税不能超过这个限额。只要他交付租税，就不能剥夺他这份小小的遗产，他可以永久把它世代代传下去。这些遗产大小在 6—24 英亩之间。

英国法庭今天保证印度居民的安全，因此，“里奥”的处境并不悲惨，欧洲的好些农民还可能羡慕他们。他们自认为是一份产业的主人，是永远属于他们的，永远不会失去的。因为，即使战争和暴政的灾祸，逃亡的“里奥”经过几代人流亡，他的后代还可以要求得到祖先的遗产，并且往往重新得到这份遗产。“里奥”的租税并不太过分，他在劳动中是独立的，有生活保障，可以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印度的农民就差没有见到富人的遗产同他们的遗产混合在一起了。在印度的土地上，空闲的人、聪明的人、骄傲的人、自由的人，没有一个是同农民混合在一起的，农人就好象是一群牲口，没有牧人，也没有牧犬，受到有权有势的人欺负也不会自卫。

从亚洲返回欧洲，可以遇到斯拉夫人，他们居住在我们大陆上的一大块地方，从最古老的时代开始，他们便似乎从事农业；但另一方面，就我们能够追溯到它的历史时代，那里的农人阶级是受制于战士阶级的，并沦为农奴。也许，同牧民毗邻以及牧民很容易入侵广阔的斯拉夫族平原这种情况，助长了上述两个阶级的对立。庄稼人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而牧人总是骑在马上，热衷于打仗，很容易制服庄稼人。在农奴制下，盘剥是严重的，但并不完全是压迫性质的。贵族就是尚武的战士，自认为是地主，但是他同农人分享土地，他给农人一座房子和土地，使农人有了自己可以世代相传的产业。另一方面，他要求农人用每周一半的时间去耕种战士留给自己的土地。每块

采地都包括两部分：封建主的土地，利用徭役来耕种，还有一份土地是分给许多家农民的，每家农民每周用空下来的3天去耕种。在俄罗斯，农民的徭役一般上是用租金来代替，叫做“阿布罗克”（obroc），就其性质而论，应该总是均等的，但是在一个没有自由、也没有保障的国家里，封建主可以为所欲为，鱼肉他人。

欧洲西部地区，过去是罗马帝国，后来遭到日耳曼人入侵，这些征服者是独立的，为自己的英勇而自豪，他们十分珍视自己的自由，倾向于蔑视他们所打败的被奴役的民族。征服者的枷锁是无情的和沉重的，但并非到处都是清一色的。帝国的土地是由奴隶来耕种的；胜利者往往把主人贬为奴隶，让他同他以前的奴隶一起劳动；另一方面，战争和压迫很快就使自由人消耗殆尽。在查理曼帝国表面上全盛时期，奴隶制这个侵蚀性毒瘤如此迅速地摧残人口，以致高卢的最辽阔的省份居然无力自卫去抗拒两三百名诺曼底人的蹂躏。但是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末年，帝国的霸权给打破了，真正的主权落在封建领主手里，他们拥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他们感到有必要在农民身上培养自己的力量，把农民训练为士兵，于是，他们减轻当初强加于农民身上的枷锁，把几乎已经完全荒芜的土地交给农民，好让他们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从事耕作。于是出现各种类型的农民，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得到。

不论是在贵族当中，还是在农民当中，极大一部分家族消失了，因此，一部分贵族的祖产就变得十分庞大，他们把整个省份据为己有，但是，这是一些荒芜了的地方，无论他们如何贪婪，也无法从农民那里榨取多少租金。一般来说，他们是受到另一种感情支配的：有时是对权力的迷恋，有时是骄傲，有时是任性。他们把封邑的土地分给农奴，放弃了永久占有权，但是强迫他们付出劳务，比付出租金还要多，他们要一些人服兵役，要另一些人承担徭役，要所有人都俯首贴耳，往往还加上一些最侮辱人的规矩，每一个府第都有自己的一套。由于这整套封建规矩，庄稼人便生活在恐惧和屈辱下，这要比贫困还难以忍受。农民每时每刻都会害怕人家把他们的牲口和打下来的粮食抢走；但是土地起码是他们的。土地是农奴制度下的土地，随着土地而来的是永无止境的租税和劳役，但土地可以永无止境地传给后代。甚至在革命前，施加于农奴身上的最可耻的劳役就逐渐废除了，而正是由于这个根源，才产生了许多自耕农，使今天的法国强大兴旺起来。然而，另外有些封建主，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怎么能够肯定得到一份收入而不是权力，他们就把自己继承的土地分出去，条件有以下两种：他们给一部分人一份土地和必需的资本以便开发这块土地，但农民必须承担一切耕作劳动，并同封建主分享收成；对于另一部分人，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他们就光给土地，而农民则必须完全独立地从事耕作，并在一定的年头内用现金缴付相等的租金：这就是地租。上述两种办法，都表现出文明和安全的一种进步；农民不再出卖他的自由人的身分，或出卖他的人格，他差不多平起平坐地拟订纯粹的金钱利益；他进行一桩交易，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对地主则好处更大，因为地主从此以后可以得到有保证的收入，随着农业日臻完善，这笔收入还要增加；但这种交易只是暂时性质的，除此以外，则全部都是永久性质的。事实上，佃农的地位总是那样，而地主绝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同样性质家族，一代一代传下去；相反地，地主有可能醉心于利用佃农所取得的进展，等到租期届满，便向他索取更高的租金，或者把他打发走。

过去，人们为了取得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似乎有好几种途径，今天则好

象只剩下一条了，那就是取得财富；因此，这个目标是更公开地向大家提出来了，更有计划地去设法加以实现。只要有办法挣得更多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满足于自己的财产。在所有各阶层的人当中出现的这种贪得无厌也对农业产生影响；大家认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过去发生了这样的丑事：最善于经商的民族竟然在殖民地恢复奴隶制，并且扩展到拉丁美洲的自由国家。我们的父辈普遍地禁止把这种罪恶的暴行施加于兄弟和平等的人身上，他们废除这种制度，颂扬基督精神，文明进步和日益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我们的同代人竟然变本加厉，恢复奴隶制，其残酷程度为欧洲罗马覆灭后所未见；况且，正是最有远见，最自由，自称最热爱宗教的那些国家继续把这个污点加之于人类身上。

然而，在更接近我们的地方，也许以没有那样丑恶的形式，日益增长的利欲又再动摇了农人的地位，农人的地位在中世纪曾得到慢慢改善。在称作不断兴隆的情况下，利欲使农人怀念被叫做野蛮的时代。这是农人的地位给投机活动打开了新的境界，同时又给财富学派的教义打开新的境界。一方面是新经济学者，另一方面是最灵巧的农学家不断宣扬那些管理着大农场的最有钱和最聪明的庄园主；他们欣赏这些人的高楼大厦，完善的耕作工具，漂亮的牲口。但是在欣赏事物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人，甚至忘记了数一救人数。英国的1平方英里包含有640英亩地，这大约是一个漂亮而富裕的英国农场的面积。一个古老的庄园，一家庄稼人可以亲手劳动，不用外来帮助，也不用雇工，但也不会无事可干，家里每一个人一年到头，天天都有一定的活计，这样的庄园不会超过64亩；因此，需要有10个这样的庄园才能构成一个现代农场。这样，10家农民就得被赶跑，以便把位置让给新体制的农场主，他可不是个农民。这个人只是用他的资本和他的聪明才智去参加生产的，他并不亲手劳动，而是规定种些什么，监视和督促工人，他买入、卖出和管理账目，总之，他在农业上所占的位置等于商人或企业主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位置。事实上，在罗马农村中，人家把他叫做“管理商”，在英国把他叫做“农人老爷”；但是，富有庄园主的地位抬得有多高，为他从事田间劳动的人的地位就贬得有多低。前者为自己保留下决定、选择和用聪明才智去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不让工人和仆役去做这工作。他只要求他们卖力气，并且尽可能把他们贬低为机器。社会应该防止把拥有智慧和财富的人的利益同只有一双手的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前者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可以设法把后者推到愈来愈不稳定的地位。于是这两部分人往往就乞灵于暴力，从而掀起可怕的流血革命，或甚至使社会闹得天翻地覆。如果斗争相反地是在暗中进行的，那么，市场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各种不同的利益则互相对立，这样，总是富人向穷人发号施令。庄园主对雇工发号施令，然后是地主向庄园主发号施令；因为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拥有土地的人则反对那些想掌握完全垄断权去耕种土地的人。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财富学派在农业上只考虑到靠这种垄断力量行事的人的利益；他们所说的利润就是这些人从生产费用中省下来的钱，也就是从维持他们的工人的费用中省下来的钱。在我们看来这些人就是国家，因为农人不仅人数上占绝大多数，而且也是物质生产和保卫国家的基本力量；人们从他们身上要节省的生产费用，就是幸福，就是穷人的盈余，代表着他们的全部物质享受；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这种物质上的富裕同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还有适当休息、空暇，有了这些，生活才能有点乐趣，有点

愉快，才能有点时间用来培养情操，有点时间来培养才智。

但是，人家要消灭的，不仅是人的幸福，它被看做是无益于生产的费用，人家还要消灭人本身。大规模农场的资本雄厚，机器完善，技术高超，人们认为，这种农场的优点就是能够用愈来愈少的农人去做同样多的工作。而事实上，在世界其余的地方，估计农业使用着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人。英国居然把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从田地赶到城市去。那种为了人类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为了财富的经济学家，看到这种发展，不能不感到痛心。农业劳动能保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是什么体力劳动都比不上的，它能训练出更好的士兵去保卫祖国，这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它如此多样化，可以培养出这样多的才智，也是无所匹敌的；如果农人和产业结合起来，那末它就会使靠双手吃饭的人前途得到保证，这同样是什么也比不上它的。一俟全国的土地都种上了，那么，在农村节约多少劳动力，就要把多少个家庭从农村驱赶到城市，这些家庭是注定要遭殃的。即使他们能够在工厂里找到工作，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新鲜的空气、太阳光、体力活动和大自然的景色，田园乐趣、多样化的劳动以及前途的保证：它们的处境就会岌岌可危，仰息他人；他们的道德逐渐沦落，因为放荡是它们能够麻醉自己逃避现实的唯一办法。于是它们很快就会灭亡。

毫无疑问，在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乡村，它的人口不宜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相互之间就不得不进行竞争，贱价出卖劳动力，或者是花费更大一部分劳动，而比以前生产得却少了，因此得不到充分报酬；但是每一个国家，凡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享有一定的幸福、有一定的前途，那么，它的繁荣本身就会对人口的无限度增长筑起一道屏障，这甚至是唯一有效的屏障，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自愿地降低自己的地位，在一个国家里，很少有一个未婚的人，在有把握生活得和他父亲差不多之前就结婚的。事实上，在小农国家里，一个农民，不管是地主，农场主还是对分制佃农，如果不能把妻子带到他将来要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耕地、或者他可以有把握得到的耕地上，他是不会结婚的。但是，短工的儿子，而且是所有的儿子，只要他们得到了锄头或撅头，只要他们知道他们是他们父亲的唯一财产，那么，一俟他们有能力象他们父亲那样劳动，他们就结婚了。然而，社会应该希望人口增多，只要大家都活得体面、有道德和幸福，但是永远不要超过这个限度。

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希望通过引进大农场和彻底科学的耕作方法进行一场革命，因而又从另一方面威胁着全民的幸福；这场革命使农人看不见多么需要在消费需求和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关系；它把每一个农场主的全部收获交给了商业；这样一来，每一个人都必然依赖于全体，每一个人的生存都决定于市场的机会，随着市场所定的价格，一会儿是这一个人注定丰盛过头，而那一个则贫困待毙，一会儿又是那一个注定丰盛过头，而这一个贫困待毙。直到不久前为止，农业财富还能避免市场这种碰运气的摆布。农人只是与土地打交道，从那里取得生活资料，在农民阶级真正兴旺的所有国家，自耕农的经济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他计算着，他和他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多少麦子、酒和各种各样的食物，这是他首先要得到的产品。他无需向地主交租，又无需给工人付工资，如果他需要钱的话，那只是为了得到城市工业生产的几乎是奢侈品的东西。为了购买这些物品，他把一些食物拿到城里去，这是他最有把握出售的一些食品，出售的目的是很有限的，不会引起市场壅塞。如果农民购买了土地，因而负了债，或者要不断地交纳现金去租地，那

么，他在生产中就不可能那么自由了。他就不能只是打下足够自己生活用的粮食，他就必须出售，千方百计出售，以使得他所需要的钱。尽管附近的城市不想买，他也要在那里出售。如果他不能在售卖中赚钱，亏本出售也势在必行。但至少，他自己消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包含着全部收获的生产费用在内的那一部分，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果他的租金是用食物来计算的，他就可以逃脱这种不幸的摆布；他不致象庄园主或欠地租的农人那样，麦价愈低，或者是消费者愈不需要小麦（结果是一样的），就愈是不得不出售他的小麦。

在其他耕作制度下，各种社会等级的农民使土地生长果实，赖以为生，而不拿到市场上去卖。他知道自己需要多少麦子、多少酒、多少油、多少麻；他劳动、收获，用不着计算他一天时间价值多少，也用不着计算他的食物价值多少；他活得富裕时就高兴；除了风雨不调以外，他用不着害怕什么灾祸。他没法想象怎么会因为大自然馈赠太丰富而破产。然而，他并不是把一切都留给自己的：佃农把主人的那一份交给地主；印度的“里奥”把属于君主的那一份交给“詹明达尔”（收税官）；斯拉夫王侯把他的农奴在徭役中打下来的小麦存入他的粮仓。这是用来供应城镇的那一部分，是投放于商业和拿到市场上去的那一部分；但是它完全归有钱人所有，只有他去碰价钱高低的运气，他拿对他来说是纯利润的东西去碰运气。他的收入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视运气而定；他的资本并不投放于农业，所以不会受到损失。

人们在我们面前把大农场描绘成完美无缺的，但是，相反地，这种农场的全部产品却任由市场波动摆布。农场主一家的消费同他拿来进行投机的收成比较起来只是区区之数，他连想都想不到。他一方面用现金交地租，另一方面付工资给所有雇工，因此他必须在取得任何利润之前，就用他的小麦去卖钱。英国农场主是最聪明、最能干的农场主，他从来不问他那一省需要多少麦子。大海、运河、铁路向他提供这样方便的交通条件，他可以把整个英国都看做自己的市场。他从来不想一想，要是生产得比需求得更多就有可能在这样广阔的市场上引起壅塞。然而，当美洲、波罗的海或黑海那边的麦子来同他争夺市场的时候，他便觉得自己受到了侵害，他抱怨，要求禁止进口，他指出，他生产上的损失不仅吞没了他的收入，而且影响到他的资本。的确，他取得了所谓的保护法，但并不总是足以保护他的；因为，他并不能肯定，造成市场充斥而导致破产的并非他自己的过错。总之，这些保护法只保护他自己，因为真正的农人、短工的利益恰恰相反，他只是靠工资为生，所以希望面包价钱便宜。他受农场主雇用，本应同他一起生活，却很快对农场主产生反感，因此最后使社会本身受到威胁。事实上，在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农场主都是他的敌人，农场主设法削减他的工资，使他白费力气，并使他的生活资料更加昂贵。

小麦贸易自由问题多年来引起多少激烈的争论，就象现代政治经济学引起纷争一样，难道就没有人因此想一想，这个问题的由来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吗？大农场出现了，农业日臻完善，使许多人力劳动再也没有用处，许多人也就没有饭吃。在此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需要这种规律：设法让面包涨价，相反地，政府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为了让人民得到更廉价的面包。

此外，财富学派提出抽象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目标，选择了自认为可行的途径，但在实践中却很少不离开这一途径的。同我们一样，他们把劳动看做是社会财富的伟大创造力，但是，他们一方面严格注意从来不让穷人故意

纵乐和怠情荒废时日，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经常使穷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无所事事、肚子空空、心里充满了忧愁。他们奉送给有钱而聪明的农场主双倍的利润，因为这些人包办了一切，在节气最适宜的时候，把最要紧的工作干完。他们使用数以百计的工人，事后就辞退掉，所有无需使用人的智慧和技巧的活，都用机器去完成；然而，自耕农，即为自己而劳动的农民并不把他自己的利益同他所使用的人的利益分开来，他知道一年里有闲时，有下雨和下雪的日子，不能到田里去劳动，他便把不紧急的活，留到那些时间去做。他为一家人安排一年的工作，使大家能均衡地劳动，他并不嫌弃那种得不到应有报酬的活，即那种可以用更经济的办法去完成的活，如果说最经济的办法不是在空闲的时间去干这些活的话。要是用机器打麦，而冬天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他和他的儿女却无事可作，这对他来说，只能是一种损失。有钱的农场主收割完了就把工人打发走了，至于他们冬天怎么过，他是不管的。但是，如果社会把账好好算一算，它就会发现，这个农场主其实是盗窃公共慈善事业，它也会发现，为了算出从机械发明上所取得的真正利润，就必须从中扣除这种发明由于剥夺工人劳动而使工人蒙受的损失，一直算到工人能找到同以前一样有利的工作时为止。

有些人即使眼睛只看到增加财富，认为发挥人民的才智，如果不能转化为金钱，就不屑一顾，但是，当人的才智能够使工作做得更快和更好，他们就不不得不承认才智的重要性了。在工厂里，工作往往一年到头都是一样的；因此，人们发现，比较有利的办法是让每一个人分别去做老是那一道工序，他愈熟练就做得愈快，他可以不动脑子，几乎用不着什么积极性就可以完成。既然完全用不着脑子和积极性，那么机器就可以代替人，而人就只不过是部机器。但是农业不容许人类为了贪婪而牺牲这些最高尚的能力。农业的各种劳动，轻重缓急逐日不同，除了需要大大加强体力以外，还要求不断运用智慧和经久不倦地注意做好工作。农场主如果忽略智慧和工人的兴趣，他就打错算盘了；因为这种智慧和成功的欲望应该指导每一镰刀、每一铲子如何操作。为了种地种得更聪明更用心，从事劳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事先下本钱，然后获得收益的人。任何农人，即使一切条件都一样，在这一点上，都比不上自耕农，因为他把一切经验的回忆和一切长远的希望，同他最直接的利益都溶化在一起了。长期租借契约的受益人或者收地租的地主，得到差不多同样的好处，因为他们得到永久性的保证，其次是对分制佃农；虽然他只得到收益的一半，他同地主一样关心取得好收成和做好他的农活。小农户，即亲自劳动的农人，在租期最初几年，同地主的利益是相同的，但在后几年，他的利益变了，于是他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就象成语所说那样“竭泽而渔”。农奴在封建主土地上做苦工时尽量拆烂污，但自己的地则种得既动脑筋又用心。

长年的雇工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兴趣，但是出于对雇主的感情，仍然设法把活做好。按周计算的短工只图少出力气而又不致被辞退，他们干活既不动脑筋又不用心。奴隶只有仇恨，只想报仇，他们劳动中受尽折磨，要是他们的主人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才高兴呢。因此，一种经营方法愈是提高农人的地位，愈是让农人得到康乐和独立，那就愈能使农人把智慧和感情溶化在他的劳动中，这是成功的保证。

但是，看来应该有一些比利润更为高尚的考虑来指导立法者。他应该设法为农人在其生产的财富中，保留最大的、而又不妨碍他继续生产劳动的一

部分，去造福于人数最多的阶级；他应该把最大多数的公民固定于田地上，让他们从事农业劳动；因为，在收入相等的情况下，穷人在那里要比在城市里能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立法者应该在相当粗重的个体劳动所容许的范围内发挥他们的才智，最后，尤其是应该培养和加强他们的积极性。为此目的，他应该保证农人生活稳定，赞助一切能使他们得到土地永久权的契约，反对威胁他们的地位和前途的契约；因为积极性是同回忆和希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用时间来哺养的，只顾眼前的人无积极性可言。根据相同的道理，立法者要避免农人之间，或农人同国家的其他阶级之间斗争和竞争增多起来，他应该看到，最有利于所有人的团结和幸福的经营方法，不是把最多的收入送给地主，而是最紧密地把地主和农人的利益结合起来。

为进一步了解立法者如何能完成这一任务，怎样能够不仅照顾到抽象地说的财富的增长，而且也照顾到公民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幸福和积极性的增长，我们相信，应该把我们的目光轮番地投向这样一些国家，那里农人的命运将会告诉我们应该为他们寻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

第四篇 论苏格兰盖尔族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被驱逐

我们已探讨并分析两种对立的学说，一种是我们称作理财学，或财富的增长，另一种是政治经济学，或家庭和城市的规范：第一种学说是提出生产更多更廉价物品作为目的，第二种学说是提出劳动与产品的分配要尽可能保证最多的幸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学说的对立，过去，我们仅仅把目光注意到领土财富或农业上；因为领土财富所牵涉的社会利益比较起来不算十分复杂，而它的效果也能判断，不象商业财富那样，需要一览无遗地注目于全世界。

挣得多，支出少，这样财富就会增长，财富学派是把它作为原则提出的；它的信徒们很快得出结论，他们用来创造财富的所有人的一切享受就是支出；珍视享受的人类智慧和为享受提供便利的自由就是支出的原因，最后，国家和人民也都是支出，随着国家削减这些费用，它也就致富。如果人们将毁灭幸福、自由、甚至毁灭国家本身的存在作为进步，作为财富的好处，那是多么荒谬和令人愤慨的事情，虽然这些都来源于财富学的首要原则，但是人们从来也没有说明它的后果。人们不敢说的，干起来却不怕。为了取得财富，人们减少穷人的生活资料，减少到仅够维持生命和能够从事劳动。在理论上，人们把大企业看作此类进步的体现；在农业上是大农庄，在商业上是大手工场，大工厂；巨大资本到处都有，并由一个人掌握，使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但是，要使这些劳动力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摆脱出来，就应该使他们从属于其它的人，听从别人的命令，在别人的资本中劳动；这些人成为短工、无产者后，虽然一无所有，一无所依，只是靠出卖体力对生产作出贡献，但是对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是威胁。一切大型农场或大型企业的成就总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基础上；而人们总是很容易招雇那些只有靠双手劳动而其它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为生活所迫，满足于极为微薄的工资。如果由于竞争暂时提高了工资价格，得到这些钱的人会毫不惋惜地将它吃光喝光；当无产者囊空如洗时，也就更顺从听话了，任何行业都可以把他们牵着走，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富人是参照生产更多更廉价的商品的办法，并不都是依赖无产者的竞争来降低工资的。富人曾要求亲自尝试过，用减少无产者消费的办法是否就不能养活工人，就因此不能从中得到同样多或更多的劳动。富人借发展财富，象使用奴隶一样驱使劳动者，这样就使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而劳动却干的更多，国家就能很容易地在海外市场推销商品。富人断言，黑人过于野蛮，如果不加诸鞭笞，他们就不懂得节约，也不会好好干活，而糖类种植业是所有种植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如果农人挣的钱与无产者一样，其开支也和无产者一样，那糖类种植业也不付这笔费用。如果糖类种植业不付这笔费用，人们也不必问种植业主，为什么这行业是所有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因为人们允许贩卖和役使黑奴；今天，人们终于确信这种立法的残酷与荒谬，被迫承认使用奴隶比雇佣无产者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奴隶干活很少，但是，人们还迟疑不决取缔这种既可耻又罪恶的事情。

文明国家不同意解放奴隶，认为奴隶是与他们相异的人种，对他们毫无同情可言。此外，奴隶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劳动，这些文明国家也很容易忘记奴隶制度的残暴；但是，他们的贪婪也没有放过从事劳动的白人同胞，这些同胞则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受苦受难，政治经济学的讲坛上还流行这样一

种原理，这种原理建议，在争夺相互抵消的个人利益时可听之任之，然而，在生产上花更少的费用，而获得更多的东西，这样国民财富必然增长。财富生产者，那些大型农庄和大型企业的经理，就千方百计地在此处或彼岸，这里用水力，那里用风力，其它地方又用火来代替劳动的人，即无产者；这些实业家在他们的实业中，将所能减少的劳动力都视为赢利，将人们从各种借以谋生的职业中逐走，并认为这些人们在人类社会是过剩了。由于城市工业分成无数的行业，由于它还不断地产生新的行业，由于劳动成果经常是为很远的市场准备的，人们难以估量共需求和限度，也不能马上看到这些进步的效果，而新学派的哲学家们对这些进步是深感庆幸的。它削减了的活的劳动，而从中得到的利润只不过是被认为不再需要的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资料。由于生产价格低廉，工业国家就到很远的地方找寻消费者，直到现在，在那些国家里，由此而产生的出口贸易的发展比活的劳动的节省还要迅速；被某一行业驱逐出来的工人进入另一种行业：因而，这些工业国家不是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多的物品，或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物品，而是用更多的劳动力生产难以计数的劳动成果。那些工业国家认为无用的人或被剥夺生存条件的人不再是他们的同胞，而是一些与他们不相干的人。这些人是感到这一点的，他们不顾财富学派的一切说教，把那些向全世界提供产品的人当作敌人，是这些人使本国工人死于饥饿。

然而，在商业部门，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明显。这种关系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以致人们也不屑将它否认。但是，农业局限性确实是比较多，特别是与城市的工业相比，比较容易估量，就象一个国家的疆土是由邻国的边界所限定一样，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也是同样情况：因此，农业劳动力的节约必须与农民的数目成比例。当城市能够接受时，农民们从田野走向城市，但是，如果城市不能够给他们工作时、国家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多余时，就将他们抛开了。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中，在农业劳动的节约上，英国是走得最快的，不仅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耕种，而且由于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变得富有，并生产了无数的产品；所有这些是由英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完成的，而在欧洲其它国家，农民数字占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英国耕地有 3,425 万英亩，有农业短工 1,055,982 人，100 英亩不到 3 人，或 1 平方英里 21 人。在托斯卡纳的尼埃沃尔，1 平方英里占用了 300—700 人。这么一来，人们就要问，英国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干什么去了呢？

当财富学派为了发财要节约人力时，我们则毫不迟疑地说要为了人类而牺牲财富，人们向我们证明，从经济观点来说，我们拒绝的每一种新发明是很有利可图的，可是这是白费气力，而我们要说，假如这种发明减少了享受幸福生活的人数，即那些生活在特定空间的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那末这种发明也是坏的；正是由于我们抱着这种观点，我们过去进行了斗争，而且将来也永远向把活的劳动降价的工业主义制度作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个制度是多么地错误，它居然采取这种野蛮的设想，只管国家的得失，不管人的幸福和死活。我们的论敌在这一点上是与我们一致的，即只有消费与生产紧密配合，生产才能继续发展，否则就会相互抵消；当产品壅塞市场，财富也就不成其为财富；最后，工业只是工业家本人需要而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工业；然而，工业家诩诩自夸的努力只不过限制了消费者的能力和人数而已。不管是把消费者赶出家园，或者是将他们沦为奴隶，或者给予一份仅能维持苟延喘总的微薄的生活资料，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

的，人们减少或停止消费，这也就搅乱了为社会组织奠定基础的平衡，人们在某一个轮子上按一个制动销，而这个轮子也不比整个社会机构应该停止时更早地停止转动。

财富学派可能否认，他们从来也没有打算把国家的一部分人逐出家园，或使他们陷于一无所有境地，或沦为奴隶。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应该弄清事实，我们应该拿各国和各社会阶层作为例子。在考察引起如此巨大痛苦的严重错误时，我们才能承认什么是使社会组织到处受到威胁的危险，以及什么是医治人们不能不为之战栗的灾祸的药方。

有些读者可能不相信把种地的农民置之不顾、并将他们逐出祖国的作法是农业的试验和改善农业体制的办法。然而，这种试验在大不列颠统治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进行多次了。在戈德史密斯的感人诗篇《荒凉的村庄》中已有描述，并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甚至在今天的报纸上，也经常有“等级清洗”（the clearing of estate）的半军事性质的执行情况的细节。它告诉我们，在选举中被反对党击败后，英格兰或爱尔兰的大地主逐走了所有的佃农，一会儿说是他们没有契约，一会儿又说是他们没有付清欠债；另一个这样的大领主是怎样地坚决地只要求新教徒当佃户，而将所有的天主教徒赶走；但是，这种派别观念再加上上述的指责，而这些指责又由于被派别观念推到第二位，事实也由此被歪曲了，以至很难弄清其真相。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农业的大规模行动、即“等级清洗”所展现的事实，它是有条不紊的、但却是静悄悄的，它是在某种领域的清洗，这种清洗已经在农业上大规模地实行了。

1820年，詹姆斯·洛赫先生在伦敦发表了一本354页、带有39张插图的八开本的书，书名是《斯塔福德侯爵领地所得利润报告》，作者本人是大领主的雇员，亲自主持分红工作，在读者眼看来，他讲的确是事实。但是，我们分析他的著作，并不是由于他具有身分。在我们时代的一次大的革命中，我们要在他的著作中寻找真正的历史，看看苏格兰山区人民由于实行财富学派学说而过着什么生活，而我们乐于相信洛赫先生的话，他作为大家族雇员，在执行他们的命令中，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古代凯尔特人的后裔盖尔民族，如今只剩34万人了，他们几乎都被他们的领主逐出家园，几个世纪以来，盖尔人把这些领主当作他们的领头人，对之无限忠诚。盖尔人世代耕种土地，交纳定额租金，他们的田产如今已被夺走；他们的田园已成为牧场，交给外来的放牧者；他们的住房和村庄已荡然无存或付之一炬。这些被逐走的山民，在山区无处容身，只得在海边搭棚居住，设法以捕渔为业，借以维持生命，要不然就穿洋过海，到美洲的荒漠之地寻找生财之道。

由于这种变革发生在远离伦敦800里之外近于不开化的异乡，其语言也不为帝国其它居民所熟悉，因而这种变革有时不为人知，至少不引人注目；在英国，人们得知苏格兰北部的一些居民等候那些要驱逐他们的士兵，有时用石头痛击之；人们曾听说，他们只求与妻儿老少一起死在祖先的坟墓旁，也不愿被逐往外地，以致在孤立无援与贫困中客死异乡，这种反抗行动引起有恻隐之心的人们的同情。在这些驱使他们背井离乡的苏格兰领主中，萨瑟兰郡的继承人斯塔福德侯爵夫人颇引人注目，因为她领地广阔，资财万贯，

于这种事迫不及待，在改变当地的管理方法上不惜巨资。人们得悉她将 15,000 农民逐往他乡，他们居住的面积相当于法国的一个中等省份；这些不幸的人们是她家族的为数众多的仆从中唯一的后裔，他们世代代为这个家族流血流汗。为了确保强制农民撤离该地，负责这项工作的人竟放火烧房；有人说有一老人，有的人则说是一老媪，因为怕流落他乡挨饿受苦，不愿抛弃茅舍，这样也并不能阻止纵火者，结果在熊熊烈火中被活活烧死。然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公众的责难也不被重视，也没有阻止这种罪恶行径。

人们开始控告斯塔福德侯爵夫人，但是她不信会受到严厉审判。本书披露的详情细节，为的是向公众舆论伸张正义。作者竭力证实，斯塔福德侯爵夫人不仅滥用立法给予的权利，而且在使用这些权利时，也没有保证奴仆能生存下去，她是认识到要对他们的生存负责的。至于我们，也就是在本书要研究的，并不是这位资财万贯的贵妇人举止行为是否干练或慷慨大方，而是研究立法精神本身，这种立法根据惯例，已废除了过去对财产的限制；根据这个原则，土地所有者可根据本身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对他的财产作出最好的抉择；应用这条原则，农业同样会发展，办法是用同样的费用获得更多的效益，或者用更少的费用获得同样的效益；应用这条原则，就能节省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取消有助于工业发展的活的劳动，如果工业停留在同一水平，这种活的劳动的取消就是利润；这也就是实行财富学派学说在农业上的重要经验和成果。

根据她的经纪人写的书，我们知道斯塔福德侯爵夫人的祖先是苏格兰最北部、占有萨瑟兰郡的四分之三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占地 80 万苏格兰亩，按英亩算有 100 万英亩，超过 40 万公顷的面积。这个面积超过上莱茵省，稍少于下莱茵省。当萨瑟兰伯爵夫人继承这些领地、并在嫁给斯塔福德侯爵时，把土地带来作为陪嫁，当时这里的居民不超过 15,000 人，而斯塔福德侯爵是在萨瑟兰公爵时加封的。人们不能精确地说出这个家族的历史要上溯到更古老的年代。人们只知道当叶盖尔人震撼了南苏格兰，人们看到他们的部队从山上下来。今天，这个财源枯竭的国家已供养不起这些人了。萨瑟兰人口虽然减少，自从不服兵役后，对领主来说，人口仍然过多。在过去的国家组织中，实际上人人都是军人。只有 30 多名侍从官直接隶属伯爵，人们称他们为塔克曼，归他们管辖和耕种的地区称作塔克。这些侍从官和他们的部下将这地区分享和统治，各自管辖村落和河谷，他们下面的阶层是农民。在和平时期，塔克曼是他们唯一的仲裁人，在战争时是他们的军官；但是，下属的服从是通过说服办法，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家族的成员，所有的人都是首领的亲属，属同一个姓氏。对于那些受他管辖的人，首领们可以运用特权、随心所欲地给予或收回那份借以活命的土地。但是，每个首领虽然对增加权力感兴趣，在他的管辖区吸引一些新的农民，但是并不想剥夺佃户的生计。此外，萨瑟兰伯爵通过塔克曼和他们的陪臣、以及陪臣的奴仆所征收的所得税微不足道，与其说是交地租，还不如说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感激。洛赫先生举出 1811 年金特威尔家族（租金）收入帐本，人们通过帐本可以看出，直到那时为止，每户每年只交几英镑钱，几只家禽，以及为主人干几天活。

但是，在另一方面，出生于萨瑟兰领地的各个等级的每一个男子，都要

塔克（tack），即苏格兰的租借契约地，管理这种租借契约地的称塔克曼（tack-man），本书按音译。——译者

为维护主权与家族的荣誉流血和牺牲，这被看作应尽的职责。在十世纪以前，丹麦人曾经在海岸登陆，征服了凯思内斯平原，并将盖尔人赶到山上。从那时起，凯思内斯和萨瑟兰这两个过去以同一个名字联合在一起和只有一个政府的地方，从此就分割开了，由于语言和种族不同，经常互相敌视。在盖尔语称作莫耳—费尔·查泰伯（Mhoir-Fhear Chattaibh）的萨瑟兰的大人物总能找到能冒着生命危险、反对一切敌人的保卫自己领土的战友，而敌人是丹麦人、苏格兰人，一些外国人或本地人。

赶走斯图尔特王朝的革命发生后，苏格兰的内战更少，危险性更小，英国国王的统治权力虽没有真正达到这些边远的省份，至少还是想把这些人物的政权成为他们的分支。他们鼓励苏格兰领主征集家族军队，使这种新的军事体制与原有的氏族性的全民体制相配合，使之相辅相成。第九十三团归萨瑟兰伯爵管辖后，从那时起，军饷成为家族的主要收入，而伯爵的贵族则从团长给予的一部分军饷、从所管辖的塔克中，以及与他在团里军衔相称的让与的土地中得到收益。这些贵族以同样的条件招一些新兵，并与其下属分享让与的土地。

因而，租地的转让失去了过去那种恩赐的性质。而且也不再是家族的首领的慷慨行为，而是一种金钱交易，在这个交易中，莫耳—费尔·查泰伯设法挣钱，事实上，他也需要钱，他曾被召到宫廷，萨瑟兰的这位大人物在奢华的伦敦感到很渺小，他的寒酸受到英国人的嘲笑，他觉得这对他的民族也很不体面。在军营里，他的军官，那些塔克曼们也得应付在英国的巨额开支；他们过去不知道摆这种阔气，他们在英国学会了。他们竭力设法从农民那里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但是，他们同时停止鼓励当地工业，他们不再满足苏格兰花呢和家庭生产的花格长中，山区制作的苏格兰剑，代替面包作为食用的燕麦饼；食品、饮料、服装、武器、家具，这一切都由商业部门供给，不再用家庭工业产品。然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与商业交换，他们的产品不值什么钱，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谷物，他们织造粗衣服的羊毛都不能与英国的相媲美，而且也负担不起运输费用。当地严酷的气候不能供应寓人的消费，他们也象穷人一样，在那种气候条件下，富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很简陋的。当首领们和军官们需要钱以取得不能缺少的奢侈品时，耕作就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出口或出售，而产品出售时受到蔑视。所有的地方工业都消失了；在这种两天中就有一天是下雨或下雪、只有一天是干燥天气的地方，人们找不到躲雨地方去干有利可图的工作；穷人的所有家庭成员没有四季都可干的行业，而无所事事又增加了贫困；人口急剧减少，但是，对那些想从这块广阔领地获得收益的人们，他们也还觉得不够。

在萨瑟兰，人口分布比较平均。每个山谷都有村庄；冲积地带种植燕麦和大麦；人们拿燕麦作饼，以大麦酿威士忌酒；山区野草丛生，用来放牧畜群，牲畜提供乳类、肉类，羊毛和皮革。人们对这些粗陋产品很知足，需要也能满足。然而，长角的牲畜也习以为常，长得瘦骨嶙峋，毛皮粗糙；燕麦和大麦地种植也不精心，因为经常是交付妇女经管，男子们生来是为了打仗或是到山上放牧畜群，他们生性勇敢，喜欢冒险，对民族、习惯、种族荣誉、对首领、对山山水水都非常热爱，但并不怎么灵巧聪颖。由于妇女的劳动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所以男人们喜欢无所事事。除了耕耘和放牧外，全国没有别的资源，因为气候酷似瑞士的高山地带，春寒料峭、寒暑不匀，生产不能发展，人民日益贫困；国家没有制造业，没有商业，一贫如洗；那里没有

驿站，没有开辟大道，伯爵领地的各部分没有公共交通线，只有供行人走的小路：大部分居民谈不上服从英国法律，甚至不知道照法律办事。另外，村民家里应有尽有，足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他们不觉得还有什么需求，感到生活很幸福；即使有时流年不利，影响收成，人畜都得忍饥挨饿，但依靠能劳动的双手，也不致备受煎熬，照样能挺过去。

在 1811 年到 1820 年间，为数 15,000 人的 1,000 户居民都被驱赶，按照主持此事的洛赫先生比较婉转的语言，那就是在伯爵的领地内被分割、搬迁。所有村庄都被拆除或烧毁，他们的田地都改为牧场（见洛赫先生著作，第 92 页）。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萨瑟兰伯爵领地内其它 7—8 个领主，他们占地约 25 万英亩，也干着同样的事情；此外，当时苏格兰北部的所有领主也照此办理，或毫不迟疑地学习这种榜样。然而，洛赫先生说，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比她的任何一个邻居更人道；她关心那些搬迁户的命运，她留给他们一份土地，她在取走 794,000 亩自古就属于这些搬迁户的土地时，慷慨地将 6,000 亩留给他们，每户约 2 亩左右。

留给佃户作避难所的这 6,000 亩土地，从前是不毛之地，对地主毫无收益可言。然而，地主也不是白白地给予他们；平均租金还得交 2.5 英镑，土地契约为期七年，如果土地耕种得好，还答应可再延长七年。

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收归已有的这 794,000 亩土地，由她的代理人洛赫先生划分为 29 个农场，其面积大小不等。其中最大的比塞纳省面积还大，占地 46,191 公顷，因为塞纳省也不超过萨瑟兰伯爵领地的九分之一。这些农场仅用于放牧羊群，每个农场只有 1 户居民，由于引进的技艺是新式的，这些农场不用苏格兰人，而使用来自英国的雇工。然而，有 17 位贵族、或萨瑟兰的塔克曼，不顾对这种行业传统的偏见，掌管了与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同样数量的农庄，其它 12 个是由英国人掌管的。1820 年，13 万只羊替代了那些保卫莫尔—费尔·查泰伯流血流汗的勇敢的人们（同书，第 147 页），也许，羊只数目已大大增加了。这些群山的峡谷，过去以古老种族鏖战的沙场著称，如今已杳无人迹，也没有人回想光荣的往事；山谷中没有村落，既听不见欢乐的歌声，也听不到痛苦的呻吟；萨瑟兰伯爵的继承人，已定居在离祖先居住的故园几百英里之遥的英国，靠他以前的陪臣过日子，尽情享受和玩乐；他可以在特伦特姆城堡摆阔气，象王族那样富丽堂皇，并用他的奢侈生活支持英国的厂家。

这个小民族在财产上、习俗上、爱好上、整个生活方式上的翻天覆地的剧变，奇迹般地使已经家财万贯的萨瑟兰伯爵夫人增加财产，我们对这些丝毫也不怀疑。但是，洛赫先生接着指出它也增加了国家的财富；洛赫先生指出，这样一来，钱更多了，市场活跃了，工业发展了，奢侈的享受也更多了，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停滞不前后，整个萨瑟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确实，我们也相信，根据财富学派的原则来判断这个地方，用繁荣来称呼也名副其实，萨瑟兰正在进步。几条长达 40 英里、45 英里、50 英里的大道已经横贯全境；在大河上，伯爵夫人、也就是今天的公爵夫人投资修造了几座石桥和铁桥，其中有几条颇为雄伟壮观；防波堤与坝堰阻止了洪水的泛滥，港口向商业开放；驿车通向全境，直达边远的城市；斯塔福德侯爵还修建了驿站、客栈，从 1820 年起，萨瑟兰出口细羊毛达 415,000 磅，这就向人们预示，它有朝一日能向遥远的地方输送财富，这是因为有了令人赞叹的经济，居民用劳动创造了幸福，人们成功地开发了这个地方。

有人对我们说，就让他们干吧，比起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在管理自己产业的产业主来，立法者也并不认为，他们比这些人更为高明。如果产业主富有、聪明、能干，他将能使贫穷落后的国家繁荣，他的财产越多，在执行有利可图的计划时，他碰到的困难将更少。这一片荒凉不毛之地，过去养洁那些不拿铁锹锄头耕地而挥舞着古老刀枪、过着贫困生活、成天惶恐不安的陪臣和奴仆，今天养活的是羊群，它们身上的毛供应工场，并给遥远的市场提供原料。但是，居民又怎样了呢？洛赫先生告诉我们，成千上万被逐出家园的家庭，境况并不象当初他们担心的那样悲惨。确实，有些家庭不愿从驱赶他们的伯爵夫人那里取得任何东西。冈氏族，或麦克—哈米什人，离开了基尔多南山、纳瓦尔山谷和赫尔姆斯达山谷，全部出走，而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后来他们怎样了。1818年和1819年间，除去这个氏族外，斯特拉思布罗雷家族有32户到美洲，作者说，其它各户都接受了斯塔福德侯爵夫人赠予的那份土地。这些人被扔在这块介于大海与高山的广阔土地上，在找寻适合耕种的土地。洛赫先生说，令人奇怪的是，在这块荒芜的、宽度只有半英里的海滨，萨瑟兰居然能从种植谷类得到利润。这些被称为小佃户的流放者，从地主那里得到援助，帮助他们建造新房，并鼓励他们开垦新的土地：因此他们借以活命的田园很快地得到开发。

在这些家庭中，年轻人富于大胆冒险精神，与苏格兰山民性格极为相称。他们在海上完全是外行，与原来的习惯也大相径庭，他们却购买了或制造了船只，在受斯塔福德夫人托付的船失指导下，他们很快地勇敢地学习技术，而他们也曾经等待在鲜鱼和鳕鱼群旁，在不同的季节，交替轮流巡查海域，在赫尔姆斯达尔和布罗拉建立了一些大货栈用来加工制造鱼类食品；苏格兰和英国的商店也曾经派过经纪人。自1814年到1819年，渔业日益发展，成为财富的重要来源，这些财富不是供当地消费，而是全部出口（同上书，第125页）。

对以上论及的问题，洛赫先生的结论是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在萨瑟兰郡的土地上所制订的计划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她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益，而且还使那个属于他的地区很快地从不开化状态走向文明。作者说，如果这些给以侯爵夫人命运所系的这个小民族带来极端的痛苦和不安，相反，她也给工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场所，为了竭力减轻负疚心情，她将来要给这个小民族更多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推进文明的方式，与穆罕默德·阿里在同一时期，在埃及所干的相似；穆罕默德·阿里被财富学派当作商业和工业的奠基人广为颂扬；在他身上，君主的法律与产业主的法规混为一体；他在判断国家的繁荣时，不是从居民的安全与美满生活出发，而是看商业活动，出口价值和食利者的利润；他也是修道路、开运河、筑桥垒坝。他使埃及布满桥梁隧道工程。他在埃及请来了学者、工程师、实业家；他要在埃及各地建立工场；最后，他在干好事的同时，特别是想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在他的算盘中，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些数字，是与棉花包一样计算的；而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是把人的生命与羊毛包一样来计算的。穆罕默德·阿里精打细算，但是，受她所支配的那些不幸的人们的爱好、回忆与希望等等，他是置之度外的。

萨瑟兰公爵夫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妇女，人们对这一点是肯定的；她非常巧妙地管理她的万贯家财；她增加了资产，而这份资产也为未来新的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她在认为必需时发展她的事业，而且也把这些看作为国家

增加财富，任何人和任何股份公司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资金，但是，谁能预言她的继承人会怎样，他们能象她那样乐善好施、富于同情心和聪明能干吗？英国许多贵族虽有巨额家产，却负债累累。于是，他们毁了他们的领地，对佃户十分贪婪，土地也被债主占有了。因而，在七年或十四年后，萨瑟兰那些背井离乡的家庭，又将深受地主的谬误、差错、挥霍，贪婪、放荡和不公正的祸害，地主们掌握他们的命运，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指使洛赫先生执行她的计划时，侯爵夫人既谨慎小心又富有人道主义。英国的法律允许地主逐走他的佃户，既可以不必管他们的死活也不问他们未来的命运，法律的这种精神难道不使人感到不寒而栗吗；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借助武力驱赶佃户，这种事情实际上已经干了不少一次了，最后，根据洛赫先生的说法，这个郡的其它地主没有一点人道精神。他写道：“辛湖的格伦德人为数众多；1818年冬，当他们被撵走时，没有得到任何土地份额，或者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盖尔人被逐出故园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谁敢说这是正义的？如同贩卖黑奴和驱赶白人这样奇怪的对比一样，这样的事实难道没有惊人的联系吗？把非洲不幸的黑人运到马提尼克去种外乡的土地的人，与那些把不幸的苏格兰人赶到远离欧洲的彼岸的人可以与之媲美，这些人不也是不让苏格兰不幸的人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吗？盖尔人，这个古老的凯尔特人的民族，它过去不仅是不列颠岛的主人，而且也是高卢的主人，西班牙、意大利部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悬崖峭壁从未被征服过，当其它地方失去独立时，他们屹然挺立，今天，难道他们将被法律逐出故园了吗？这些欧洲最古老的主人应该被流放吗？

无论是萨瑟兰郡的塔克曼和佃农，或者是苏格兰的其它人，他们几世纪来就占用的土地都被认为是没有所有权的。而他们过去的总管们被授权，破坏几个世纪以来在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契约，这是滥用合法的形式和极不公平的越权行为。

英国的法学家经常把政治权利和财产权等同起来，并且以财产权来捍卫政治权利。他们认为，领主的纯属政治的权力要看财产，就如同他们认为，在当选国会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这种专有权利时要看某些市民的财产、在选举神职时要看地位高低和收入多寡。他们忘记了这些职务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他们得到的报酬也是属于人民的资财。英国的法学家勉强地承认，社会发展进步了，成为人民负担的权力就有权取消；无论如何，法学家们愿意在取消这些职务时，人们还保留其报酬。同时，他们不致力去了解各种机构的设立是为了照顾那些委派他们担任职务的人的利益，他们从来也不认为，只有一个人从职务中得到了经济利益而他们把这种利益看成同那些占有一片田地和一所房屋情况相同。

领主占有大面积领地并不是英国的特殊情况。在整个查理曼帝国，在整个西方，一个省一个省地被那些黠武的头领们所侵占，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土地分给被征服者、奴隶，有时也给自己的战友。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对曼恩、普瓦图、昂儒这三个省的伯爵来说，与其说这三个公国还不如说是三个农场；瑞士是一个多山、多湖泊的国家，气候使农民感到沮丧，老百姓的性格、习俗等都与苏格兰颇为相似，在当时，这个国家也被少数领主所瓜分。如果吉堡、伦茨堡、哈普斯堡，格鲁那雷的伯爵们也受英国法律的保护，他们今天的状况也会与二十年来萨瑟兰伯爵们所处境地完全一样：他们中间有

些人也许还会对修缮感兴趣，而另外一些共和国的人可能已被赶出阿尔卑斯山而代之以羊群。但是，不管伯爵权利的起源如何，八个世纪来，在整个欧洲大陆立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保障诸侯的臣属、陪臣和属于他们的农奴的利益；以法律条文作保护来加强农民的独立地位，把习惯作法改成法律条文，使之免受领主们的敲榨勒索，从而逐步将农民的土地收入水平提高到地主收入水平。瑞士的法律使农民保证能永远生存下去，而在大英帝国给领主们的保证是让农民处于不稳定境地。人们可以对这两个国家和这两种制度作个比较。

在法国，佃户的生活条件也经常得到改善。法国的陪臣原先是被征服者，或者是奴隶，说得好听一点，是自由人，他们放弃自由成为侍臣，他们为领主尽一些封建义务，封建领主赠予一块土地作为报答。但是，原来权利中缺少的东西，已根据惯例不断授与：不但产权被承认，他与产业赠与人地位也平等；相反，盖尔人的佃农却从来没有获得这种地位；他从来也没有从领主的恩赐中得到过土地，但是，他与总管原来都是土地的共同所有者，或者说还是他部族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然而，在战争时期，他随同总管、并为共同的利益服从总管的命令，首先，总管把他当成朋友和亲属，尔后是士兵、臣属，最后是佃农，被雇用的农民，为了共同的祖国的土地，他们愿意受苦受累，但是，总管一旦觉得养活他们没有用处时，可以自己作主，将佃农解雇。

确实，不应该忘记苏格兰的高原地带，即盖尔族居住的山区，从来也没有受过外来侵略的桎梏；封建制度从来也没有成为国家的法律；虽然，人们也将古时就遵循的民族习惯与邻国的封建制度相结合；就名称来讲，英语中的称呼在当地语言中也找不到，如萨瑟兰伯爵一词，在盖尔语中是凯思内斯南部的大人物。

在一个没有开化的、甚至连文字也没有的民族里，人们不能指望得到在苏格兰称作氏族的、那些大的家庭组合形式的真正资料，更没有几个部族合并成象萨瑟兰郡那样唯一的至高无上权力的资料。在盖尔语中，克朗(klaan)一词的意思是子女。确实，所有的惯例，相互关系、感情等等，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自己是家族子女；确实，对共同产业的权利就象同一个父亲的子女那样。除了共同保卫这种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隶属关系外，他们不服从其它的隶属关系。土地分配的不稳定也不削弱大家族的财产权；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就是属于大家庭的；这方面是和日耳曼人一样，也是凯尔特人的公法；日耳曼人的组织形式，不仅是为了耕作，更多的是为了打仗，为了怕把家庭过分地束缚在他们耕种的那块土地上，这些家庭经常地、甚至每年都改变地块。苏格兰人的每个成员对一切都有权利，但是，每人的土地也可以给他的邻居，有时是因为机会凑巧，有时是由于家庭耕种力量的扩大或缩小，有时是作为为国效劳的报酬。此外，在欧洲的任何国家，人们都找不到这样一种可以暂时的、或可变的分配共同组合体土地的即使是最新的记载。在苏格兰，人们希望土地的划分或细分能指明或维持军官和士兵的隶属关系；每个氏族的大人物在分配共同组合体的土地时，甚至可能独揽分配大权；根据战争时作用大小，将不同的租借契约的土地分配给军官；但是，尽管他在军事上对氏族成员进行奖励或惩罚，氏族的财产一点也没有减少。受惠者虽然不同，但是服役的义务还是一样的，只要萨瑟兰全部属于萨瑟兰人，为全民利益设立的军事长官，在这块属于全民的土地上总是会或多或少得到或失去部分土地，土地隶属关系是相同的。为公共防务交的捐税、向那

些带他们战斗、维持秩序的贵族们交纳的地租从来也没有增加。

当文明开始取得进步，贵族们讲英国话，穿英国服饰，他们的习惯与思想方式也学英国的样子，他们再也不了解、也不想再去了解克尔特人的民族约法；而且，为了给约法一种文明国家常用的形式，他们将它编撰成文。贵族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陪臣们塔克，即一份土地。他们好象对这些陪臣作了很大的让步，因为在过去，他们能随意驱逐陪臣。相反，这对共同组合体是一种侵占行为，因为过去他们总是以社会身分相仿佛的人来代替他们；而且，每当他们开始出租土地，在重订合同时，在合同中巧妙地加些新的条件，或增加佃农的租金。

由于这种暗中进行的侵占行为，盖尔族的土地贵族，确切地说，也就是那些对氏族的财产只有固定不变的收益的贵族，现在他们将这种收益变成付给他们地租的领地的无止境的财产所有权。然而，这些贵族没有料想到，而陪臣们当时也没有担心，他们利用更新合同，这样不是增加农民的地租，而是有一天会将农民逐走。在干出这种野蛮的勾当前，这些贵族要完全不去考虑同胞的意见，不顾情谊、不顾荣誉体面；他们不仅不去想想他们彼此是父老兄弟，甚至彼此是苏格兰人；当他们将同胞的命运置之脑后时，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扼杀了他们共同祖先世代相系的血缘感情。不久，社会不同成员采取的立场、舆论，也产生了类似的变化，认为立法者应该进行干预，使整个民族不致被一小撮贪婪与冒失之徒控制支配祈求贵族们的恻隐之心是无济干事的，而是应该建立盖尔人的法律；照此办理，贵族们就不能搬出财富学派的原则，说什么扣除国家所得后，在人类社会，会节省更多人力，会有更多进步，也会更加繁荣等等；还有说什么不是根据推理行动，而是根据这些原则经常推理。如果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有权利用 29 个外来户和几十万只绵羊代之以全省农户，那对她和其它人来说，应该赶快废除这种罪恶的法律。

对一个国家来说，允许领土财富集中在为数很少的人的手中，这已经是很大的不幸。当一个人占有足够几百户的领土，原来富裕生活就代之以奢侈豪华，而原来培育道德的收入也被挥霍浪费殆尽。如果一个省的产权所有者的利益是和该省居民利益相对立，用牛羊来代替人，那国家会成什么样子？土地财产不是为这种目的建立，却为法律所保护。人们承认财产所有权是因为相信对那些一无所有或只有极少财产的人有利；但是，当财产所有权与国家的权利相对立时，社会就会动摇了。一个伯爵不能再有这种驱逐他领地内居民的权利，国王也不能再有驱逐他的王国的居民的权利。一个最专横君主，如果今天试图超越他的权力很快就会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英国的领主们应引以为戒！领主们人数越少，国内反对他们人数越多，喜欢他们的人就越少，对他们也就更危险！

虽然他们什么也没说，在利益攸关时，正象斯塔福德侯爵夫人的代理人所写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们采用不同于别国都遵循的规定？为什么产业主不为公众的利益抛弃或牺牲他们对产业的绝对权力？”（洛赫：笔记，第 41 页）。有一天，如果产业主认为他们不需要人民，反之，人们认为也不需要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为了他们的利润，可以用 400 万只绵羊来代替 34 万英勇的山民，那末，山民们对那些不配作他们同胞的 30—40，也可能是 300—400 领主，可能更容易地找到对付他们的有效的办法。

第五篇 论爱尔兰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穷困的原因

在汇集、编撰和出版本书时，我们打算着重探讨现代社会的创伤。穷人的贫困、过去不引人注目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惊人增长已殃及文明的存在，这是多么地触目惊心。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国家里，商业活动越是发展，财富积累得越快，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他们既没有财富，也没有生存的保障，他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靠双手劳动来养活自己，以他们的努力，有时也能得到充分的报酬，但是，在今后的生活中，既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也不是行为失检，他们就可能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财富本身的发展，加之财富学派原则的配合，各种职业、各种社会地位的人接连产生了，他们背井离乡，堕入无产者的行列，历尽艰辛挫折，陷于赤贫，在这种无可救药的困境中，社会只得给予这些人救济，或者宣布无力承担责任来减轻这种状况。

很大一部分居民，有时甚至是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他们成为与祖国土地毫不相干，对国家制度漠不关心，甚至成为压迫他们的公共秩序的敌人，这时，政治思想运动促使最文明的国家在它的国家机构中加强民主的权力。我们竭力揭示，如果坚持把智慧、经验、道德和意志力等方面如此不可思议地不平等的人的投票当作平等的话，在大多数人参加的选举中，那是不会有真正的全民的选举的。我们已指出，在制造一大批无产者以后，如果从人数上看待这种最高权力，那末，人们既不能保证国家的利益，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总之，我们设法在政治方面能为这些人作些什么，通过哪种机构来唤起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府的理性。

今天，我们研究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从事体力劳动的是那些生活毫无保障和对前途没有指望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过着穷困的生活，而他们看到的尽是奢侈豪华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秩序总是处于危险中。我们已要求财富学派、或曰财富形成的理论考虑他们的生存问题，我们同样也寻找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能否通过分配财富的办法，使这种混乱现象不致殃及家庭和城市。我们看到的财富的普遍倾向是将资本的作用与劳动力的作用分开；在每种职业、每种行业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们称作发展的东西，也就是用科学和高级智慧帮助领导者的意志，把巨大的资本汇集在一个机构中，另外，使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从属于领导者意志、并为这种独自掌管思考、组织、付酬的领导者的意志而劳动；简而言之，财富学派所推崇的发展，也就是造成金钱至上和产生无产者。

但是，要弄清这种普遍倾向，只认识以上情况还是不够的，还应该研究不同职业的人们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拿事实来说明财富学派的作法，他们使小企业失去独立性并剥夺他们的生活保障，迫使师傅降为雇工，将财富积累、或者说想把它聚集于几个人手中，并借口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使所有的劳动者陷于最困苦的生活境地。在研究不同职业时，我们的目光不能只是盯住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职业；要深入了解各地的详情，并经那些我们信得住的证人的证实，他们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长期以来，财富学派总是用概念或抽象的东西使我们产生幻觉，财富学派认定的只是用事实和数字表明的那种具体的学问，长期以来，他们使我们的目光转向无边际的海角天涯。相反，我们认为，应该把目光盯住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种职业。首先，我们应该研究农民阶级，因为它一般总是人数最多；

也因为在人类生存中，它是最需要的，也是最容易使他们生活得到幸福的阶级；他们的爱好秩序固然是国内和平的保证，而他们的尚武禀性也是国家的独立和权力最好保障。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农民阶级，总是以某种方式与财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出于古来沿袭的情感，或是出于本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与他们土生土长的田地紧密相连的；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子孙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他们把未来的命运系于永久的权利的保障。然而，被人们看作是繁荣的那种国家，沦为无产者的农民为数很少：这种无产者就是短工，他们只有锄头和铁铲，在农忙的时节，被其它农民招去干活，帮助那些靠土地生活的、而自己没法劳动的家庭耕种收割。短工每个星期都可以解雇，谁也没有承担维持他们生活的义务；他们既对未来生活没有指望，对过去也不留恋；他们总是感到处于接近最穷困的境地，对他们干的工作毫无兴趣；收成的好坏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的利益与雇用他们的人截然相反；他们希望劳动力价格高而谷物价格低廉。确实，短工的存在对社会来说是造成混乱和危险的因素；但是，当他们人数很少时，人们可以把它看作那一种社会秩序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弊病，甚至在找到某些坏处时，还有某种好处。然而，很久以来，财富学派的作家们想要我们确信短工们的状况是农民的正常状况；如果人们要在农业生产上使用资本、智慧或科学时达到高效率，那土地就应该划分成大农场，并由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人来经营，这个人自己不劳动，但是，他发明、或使别人发明最先进的工具，他预付资金、管理市场，只有他一个人是他使用的数千名劳动力的意志和智慧，财富学派正是把这种理论用在工业技术上。今天，在整个欧洲，这种学派的说教到处传播；虽然它还没有通过实践，但公众舆论在理论上已接受它；土地所有者和资产者相信这种说教符合他们的利益，规模宏大的农业以及它所产生的无产者，已经危及那些至今还过着幸福生活的农民的国家。在已经普遍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里，去研究这种制度效果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列颠帝国就是那种被财富学派已经完全控制舆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财富学派在立法上也有最强大的影响，它把几乎整个劳动阶级处于财富学派认为正常状况的唯一的国家。在一个全国都已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里考虑这种制度的效果，对整个欧洲文明，对人类的幸福都是有很大好处的。财富学派曾对农业企业家说：“生产的更多，价格就更便宜。”我们刚才谈到，农业企业家们为了符合以上要求，认为工人的劳动抵不上他们的生活资料，决定甩掉他们，并认为苏格兰人的劳动是多余的。我们将谈到，那些农业企业家如果不把工人的生活降低到他勉强维持生活的最贫困境地，从爱尔兰人的劳动中也就无利可图了。我们还看到，这些农业企业家在取得世界上最富庶、最肥沃，气候最好的安的列斯群岛的土地后，只有将当地的短工沦为奴隶才能找到有利可图的劳动；为了利用黑人的体力，这些企业家将黑人当作牲口，既不管他们的智力发展，也不管他们的品德教育，甚至连人类最起码的享受也没有。

有人可能会感到吃惊，我们举的主要例子都是英国的，而我们还宣称这个国家是一个最文明、最开明、最自由、最富有宗教传统、最富有同情心的，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国家。它可能也是这样的国家，它产生了优秀的观察家，他们的证明使我们更能弄清事实。此外，并非这些观察家缺乏道德观念，而是受有害的理论的毒害，这种理论使他们只见物而不见人，当英国贫困日益加剧，而努力寻找减轻这种弊病的药方时，这种理论使他们迷失方向。

在从事实中得出结论、以及找出弥补办法之前，重要的事情是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事实。我们要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事实。我们要让读者认识爱尔兰，它在全世界也算得上是一个穷人最多，而他们的生活也是最贫困、处境也是最糟糕的国家。为了说明这一点，正好有一位值得我们信任的、也是英国人信任的观察家 H.D. 英格利斯先生的见证，他在 1834 年最好的季节在爱尔兰旅行，他的证词是这个不幸的国家最全面、最忠实、最感人的一幅图画。在我们看来，这本书的分析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对这种错误制度的有害效果的第一千的证明。

确实，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的人们确实没有忽视爱尔兰的既痛苦又可怕的事实。总的来说，人们知道爱尔兰人民生活悲惨并深受压迫；派别观念同样也利用人们的不幸，这样与对手斗争时尽力使对方面目可憎。在大陆上，有些人装作是爱国主义者，竭力煽起对英国人的仇恨，把爱尔兰人的痛苦归罪于压迫者的妒忌、残酷和贪婪。而英国人则说爱尔兰人难以统治，在工作中和理财中既没有章法又没有恒心，既不勤劳也不会休息。爱国的基督教徒还指责说爱尔兰的苦难来自天主教和教士们的本性，而天主教徒则把爱尔兰的贫困归罪于没收了教堂的大批财产，而把财产让与没有羊群的敌对的教士，他们还归罪于基督教徒没有尽向教士交纳什一税的义务，基督教徒把教士们看作异端分子，他们只愿自动纳税，出于宗教信仰的道德良心来交税。这些相互的指责虽然也有些根据，但都没有找出弊病的根源。然而，他们的冲突还加剧痛苦：因此，各个派别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致这种接连不断的仇恨导致动武的地步。人民不管政府，政府不管人民，在如此激烈的仇恨中，建立与维持公共秩序已经是不可能了。

这些灾祸不仅十分真实，而且使这个不幸的人民生活条件恶化，并使纠正现状更为困难。但是，这些灾祸不过是征兆，它是更深刻更严重的灾祸的后果，而不是原因。爱尔兰已陷入极端可怕的贫困境地，因为爱尔兰这个国家，民众几乎都没有土地，也因为爱尔兰整个民族都是无产者。确实，爱尔兰所有的土地属于少数家族，所有的资本也属于少数富人，除去这两个为数甚少的阶级外，整个民族，这个真正的民族都是靠双手劳动过活的。每天早晨，他们要求劳动以换取一片面包，但是，如果富人不把土地租给农民，不把资本借给企业主，那末人们就无法从事劳动了。

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折磨由不幸的工人构成的民族；为了从工人劳动中获得最舒服的生活条件，富人们展开了全面的竞争，任何法律，任何章程，任何荣誉观念都不能阻止这些富人利用他们的土地获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穷人的生命也属于这种乱喊高价的拍卖的对象。土地经常以小块出租，租约期很短，甚至没有租约，谁付的租金最高就肚过他的所有对手，即使在收成最好的年份里，租户也仅够勉强维持可怜的生活。同样，无论在城市或农村，短工的劳动也跌价，谁同意拿最少的工资，拿一份仅够维持粗菜淡饭生活的工资的人才被雇用。这种美其名曰工业中的无限制自由的普遍竞争，至今还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美好理想。这种竞争是致人于死地的，而现代欧洲各国人民中，那些干重体力劳动的社会组织正走向这种死地，这不仅是由于好奇心与同情心促使我们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英格利斯先生描绘的爱尔兰的贫困写

《H.D. 英格利斯于 1834 年春天、夏天、秋天在爱尔兰的旅行》。（全书两册，惠特克公司出版，1835 年第 2 版。）

照；同样也想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这是与民族的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攸关的事；这是现在需要我们去解决的社会科学中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不管看到这种写照是多么痛苦，我们也应毫不迟疑地去看、去了解和去听。

英格利斯先生对爱尔兰的描述在英国赢得了无可争辩的声誉，他的探讨是和和其它所有的目光敏锐观察家一样有其优点的。他已经出版了《西班牙旅行》、另一本是关于蒂罗尔的，还有一本是描写关于英国海峡岛屿的书。但是，在1834年春天，他对爱尔兰毫无了解；他到爱尔兰时并没有带偏见，确实，当乱党造反，人民深受其迷惑时，他在人民中间访问，人们几乎难以认出他属于哪一个党、哪一个派。他决定亲自去看看，决定亲自去判断一切。他给有不同看法的人，给不同阶层的人，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看他的介绍信。

他说：“从都柏林出发时（第1册，第11章，第21页），我带了130封介绍信，这些信是给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从王国议员到佃户（我向农民作自我介绍）；同样也给持各种政见的人，从当市或德里的橙带党的治安法官直到基尔肯尼或蒂珀雷尼（那个愿意给予爱尔兰过去那种独立的人）的天主教取消联合派；从新教教会的显要人物到农村的副本堂神甫，从天主教主教到堂区教士。我不需要告诉那些熟悉爱尔兰的人，这种介绍信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在回到都柏林前，我已递交的介绍信数字至少是出发时的3倍。”

1834年春天的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这位旅客到达都柏林，稍事休息后，中午又上路，沿着圣乔治海峡直到韦克福德；从该城又向西，沿着岛的南部海岸，后来又沿着西部海岸向北，他不但走遍了该岛的大部分，而且还沿着整个漂亮的香农海岸，他还从西到东走遍北海岸；最后从贝尔法斯特到都柏林，就这样结束了该岛的全部旅行。一路上有时坐轿车或当地的马车，有时则乘船或骑马，有时甚至步行，几乎都是由他的妻子陪伴，然而只有一次称呼过她的名字，那是为了解释以取得当地农人对她的照顾。

他说：“我有一个有利的条件（第2册，第16章，第290页）。在我整个探险旅行中，无论跋山涉水，无论是在农村或城市，我都由我妻子陪伴。有人也许会发笑，但是了解爱尔兰农民的人就很容易理解，这对我这次旅行目的是多么有用。爱尔兰干苦力的农民生活悲惨，他们见识很少，上层人物也很少见到，一旦有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近茅舍的门口，或农庄的围墙内时，立刻使他们产生怀疑，但是一个女人出现时，这些怀疑就顿时消失了，当地地方官吏、警察、收消费税或什一税的收税官、以及一切官方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他们的妻子从来不陪伴他们。此外，爱尔兰贵族与平民交往甚少，一位贵妇人进入茅舍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并给予相应的信任。此外，谁都知道爱尔兰母亲的爱、她对孩子们的爱护是很容易取得好感的。给一个人以爱抚，给另一个人土地，也容易被人开诚相待；一个女人面带笑容走进茅舍，并说：‘上帝保佑你们全家。’这就容易取得以心比心的效果，这种感情不正是那些政府官吏所办不到的吗？”

一般说来，爱尔兰是一个风景美丽而雅致的国家，土地资源丰富，森林茂密，山川壮丽，海湾根深，湖泊很多，尽管地域不大，却具有大自然之美，

蒂罗尔（Tyrol）、地名，奥地利西部山区。——译者

橙带党（orangiste）：爱尔兰新教徒在1785年组织的政党，因用橙色带作该党徽章而得名。——译者

取消联合派（repealer）：十九世纪初，爱尔兰独立领袖奥康诺等组织的派别，反对与英国合并成立联合王国的主张。——译者

十分吸引游人。英格利斯先生并不想描写旅途风景，并与读者共赏景色。他很想观赏拉苏伊尔海滨，那里香农河流经一个又一个的湖泊，呈现数不尽的秀丽景色。从克利夫登到基尔利，到处都是迷人的风光美景。离开都柏林后，他就走向以油画《美丽的阿沃卡山谷》著称的风景区。作者说，“我走过狭窄的河谷与群山，与人民在一起并与他们交谈，我对人民生活状况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美丽的和富有浪漫色彩的风景的欣赏。这种欣赏并不令人愉快。因为，虽然我离都柏林郡很近，到处有装饰得很漂亮的大地主别墅和府邸；尽管威克洛郡的矿山在这里雇用近2,000名职工，我也难以对人民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威克洛郡的地租几乎都高于土地所能生产的能力，小佃户和短工一样，也很难维持勉强过活的生存条件。新教徒也和天主教徒一样，地租十分昂贵，都过着悲惨的生活。当人们问他们明明知道地租很重，又为什么同意这种地租时，他们都一致回答：不租地，那靠什么活着？那又能干什么呢？确实，在爱尔兰，土地的竞争也象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一样，是一种乱喊高价的拍卖。”

“至于短工们的生活条件，和我的都柏林的朋友们讲的完全不符合，我的那些朋友很可能了解威克洛郡。他们向我保证，所有的短工都找到了工作，他们的生活是很幸福的。有一次饭后，为了判断这种情况，我上山访问，我信步走到一个狭窄的谷地，那里散落着几户棚户。我访问了其中3家。我访问的第一家棚户住的是上房；只有一间房间，既不遮风也不能挡雨；房间很潮湿，家里作为陈设的家具只有很薄的铺盖和床，一张木橇和一只铁罐。既没有烟囱也没有窗户，地上看到的只是烧过的茅柴。住户为这间房子和房子周围的一小片土地付出2英镑租金。我访问的第二家住在小山坡旁，房屋的造法与第一家相似。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妇女和她的4个孩子，家里有两张没有装饰品的木床，一张板橇，一张长橇和一只铁罐，这就是全部家具摆设。家里也烧茅柴，这是穷人在这个省唯一能够取得的燃料。孩子们衣服褴褛，母亲因为这个原因不能送他们上学而感到伤心。父亲是短工，每天挣6便士，为了租这间房子，得花80个挣6便士的劳动日；这样，每天余下的4.5便士来维持他妻子和4个孩子的生活，他们吃的土豆每要4便士。”人们注意到英格利斯先生把爱尔兰的妇女与儿童的劳动都不计算在内，因为这个国家，有一半男人找不到工作，体力更弱的妇女儿童就更不可能找到有报酬的工作了。

“接着，我访问了第三家，这一家比前两家更穷困。房子既不挡风也不遮雨，除去一张橇子和一个罐子以外，什么家具也没有，连木床也没有。在这间可怜的风雨里，有一位带着5个孩子、穿着整齐的妇女。她的丈夫是短工，每天挣6便士。他家本来有头猪，前不久，为了付房租，把这头猪作抵押了。这些穷人原来指望猪养肥后卖掉以还清债务，因为维持生活的6便士钱已经花完了；但是，土豆价格很贵，迫使他们拖欠了款项，在猪没有养肥、不等有利可图时就抵押了；可能，使他们抵押的人也不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也是山区小佃户，每公顷地要付20先令，他付的租金很高，过的日子也和这位靠他过活的短工一样艰难。”（第1册，第2章，第27—32页）

在整个旅行期间，英格利斯先生用这种方式研究人民；就这样，由此及彼，他描述了他们的家具陈设，核实他们的工资数目和食品。当时居住在那里的威克洛伯爵，是爱尔兰南部最富裕的地主，宫人和他们漂亮的农舍在那

里为数甚多，那里土地肥沃，农业技术也得到改进，农产品很丰富。然而，我们刚才描述的3家农户，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不仅是在威克洛郡是这样，在整个爱尔兰也是如此，这种描述很精确，一点也不夸张。确实，在富裕的城市附近，在一些得天独厚的地方，或者是由于那些富有和慷慨的地主的节制，他们不要更有利可图的条件，还维持过去租金价格。在这些地区，短工的房子条件比较好；有时候住两间房；有时这些人家有家具，也有些陶土餐具，除烧土豆外，短工们还添加一些其它食物。譬如，在福斯男爵领地，那里住着高卢族，在南方是很有名的，他们生活比较好，这些人勤劳、谨慎，生活安定，住宅干净，不狂饮暴食，在维持良好秩序和舒适生活方面感到自豪。

英格利斯先生说，“一清早，我就坐着当地的马车，离开了威克洛，想亲眼看一看人们告诉我的那种新鲜事。我找到了一个地方，该地风景并不秀丽，但土地精耕细作，比较起来，居民生活比较安逸，农户和那些茅舍（我不把它称作小屋）为数颇多。颇为特殊的是，农庄生活安逸，茅舍至少比较干净。我访问了许多农户和茅舍，因为我打算找一些农户，事实上总是象爱尔兰一样，我能得到农户们的盛情接待。我离开马车，穿过田野，毫不迟疑地敲农户的门。我愈向这个地区走去，就愈感到它的特色，不仅房屋内部比较舒适，还有几盆花，小花坛，这都表示穷人想布置他的住处；农业很值得称赞，耕作也很好，土地很干净。这里大量种植的小麦和蚕豆的长势也很好，一个男子熟练地驾驶两匹马拉的犁在耕地，很节省劳力。但是，根据我刚才所说的，不能够相信这块男爵领地丰衣足食，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本岛其它地方不同。如果说他们比较干净、整齐，表面上生活比较舒适，这与其说是位置不同，倒不如说性格不一样：他们传统习惯是以干净和礼貌感到骄傲，他们的孩子，比起父辈来处境较差，他们一点也没有忘记这种传统。工艺技术要求及远见卓识使他们能改进农业，并使佃户们投入较多的资金，这样，比起一般正常情况，短工要干更多的劳动，以致有的短工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的工钱并不比别的地方更高，因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上豆并不是唯一的食品，他们还吃大麦面包，对女人来说，茶是一种奢侈品，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事。

“在男爵的领地里，农户的土地面积一般是30—40英亩，每英亩地租是2镑到50先令，就粮食的现价计算，这笔钱是农户借以活命的生活费和付租金的款项的总和。我到一位种40英亩土地的佃农家时，正好全家即将就餐。这顿饭有上豆，全脂牛奶，脱脂牛奶，大麦面包和黄油。他们种的地已经4代相传。他们曾祖父每亩付租金6先令，祖父付10先令，父亲付20先令，他付40先令。他说，就象我们看到的那样，靠他和儿子的劳动，他还能生活，付地租，还能节省一点钱给他的女儿们。”（第1册，第2章，第46—49页）。

这种朴实的繁荣景象也象贫困景象一样刺痛人们的心灵，因为人们感到这种景象也将完结。这些本来就仅够维持生活的诚朴的人们，当他们想重订租约时，就象世代传统作法、也象整个爱尔兰的作法一样，那些地主就要增加地租（第2册，第8章，第140页）；那时，他们就得放弃全脂牛奶、脱脂牛奶、大麦面包和黄油了，也将没有比物质生活更为宝贵的干净、体面的房舍了。

我们称作地租的款项，按英国惯例，每英亩要交纳2镑，虽然这数字远

远高于英国的地租平均数，但却大大低于爱尔兰地主们从其佃户得到的收益，虽然这个国家的产品几乎全部出口，而农民从这些产品中却受益很少。英格利斯先生说，“在沃特福德旅行期间，我经常到附近地区访问，因而我确信较小的地主的租金是过高的，在一些小农庄里，每英亩地租高达4镑10先令、5镑、甚至7镑。在这个地区，土豆是佃户唯一的食品，有时仅掺杂吃些腌猪肉，确实，在沃特福德，有一个地方叫阿伦德尔广场，那里出售猪脊骨及不能出口的一些部位的肉，因为每磅只售1.5便士或2便士，所以每星期六晚上，顾客蜂拥。佃户们要付这样高的租金，简直没法生活：有些佃户告诉我，他们付不起拖欠的地租，完全由于饥饿所迫，所以只好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这就是胡乱抬高租金的普遍后果。有些人，除了干农活外没有别的本事，而他们中为数颇多的还没有工作，所以只好应允干那种自寻死路的工作。”（第1册，第3章，第64页。）那些被赶出家园的佃户们，从抬高地租的地主那里租地耕种，但是对这种使他和他的家属沦为乞丐或置于死地的贪婪行为，他们没有任何抗争余地；但是，谁如果取代他们种地，他们会烧那个人的房屋或庄稼来威胁，这种情况是否会使人们吃惊呢？英格利斯先生说，“有一个人，给我看了一封刚收到的恐吓信。他来自沃特福德，想把他在新罗斯的土地租金提得更高，直到现在，人们每英亩付3镑5先令，但是，自从有人发出恐吓以后，他再也找不到佃户了。”作者在下面（第4章，第117页）谈到，“所有的折磨爱尔兰的残暴行为或凶杀案，产生原因有两个，一是土地竞争，二是收什一税。”

“在我离开沃特福德前，我参观了这座城市几个最坏的地区，我发现那里的贫困确实令人毛骨悚然。我看到有些半开半掩的棚户，每间都住三、四户人家，每家都睡在草上，各占房子一角；这些家庭既无家具也无器皿。住房周围到处是污泥和垃圾。这些家庭的家长都不在家，都到附近的乡村乞讨土豆去了。”（第1册，第3章，第67页。）

不应忘记的是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贫困，它的产生并不是天不赐福，相反，这块土地十分肥沃，气候也很适合植物的生长；这里没有霜冻，也没有长期干旱，没有洪灾和冰雹；提供出口的庄稼收成都很好，农业技术是最先进的，可是田地上的产品，无论是短工或佃户都从来不能分享，作者在旅行期间所走过的地方，与英国的土地相比较也毫不逊色。就在这种简陋的贫民窟旁，却竖立着高级贵族的别墅。英格利斯先生访问的地区紧邻沃特福德侯爵豪华的领地，其牧场占地达4,600英亩，在3个王国中是最漂亮，最大的。紧邻沃特福德庄园的贝斯巴勒勋爵庄园，就富丽豪华相比就略逊一筹了。在庄园周围有很多贵族的府邸，在他们的艺术大厅里陈列着很多伟大的艺术大师的作品。最后，在附近还有梅菲尔德棉厂，这是公谊会的宫翁马尔科松家族兴办的，他们不顾沃特福德侯爵和贝斯巴勒家族的坚决反对，在这里建立了工厂。这个工厂支持曼彻斯特、甚至英国市场的竞争，领工资工人的人数约有900人。这里既不缺少财富、也不缺少知识、工艺，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也不是没有大地主的鼓励，更不是没有高度的文明和法律的保障。看到这些事物的旅行家因看到这些事物而深为赞叹，那些关心人们的命运的人为此而感到愤慨或深切的同情。

在托马森，在基尔肯尼郡，英格利斯先生在谈到附近那些令人愉快的漂

亮的艺术品陈列室后，讽喻了这种鲜明的对比。“在爱尔兰，漂亮的庄园主的享受不和别人的痛苦联系在一起，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人们寄希望于别墅中的阔人，有时甚至希望附近村庄中的好心肠的地主大发慈悲以求得温饱和生活，但是，对更远的地方，这种慰藉也就没有了。某人的解囊相助和人道精神，其影响是极有限的，离开这个地区，人们看到的只是衣服褴褛的人群。富有的地主宅邸云集，乐善好施受到称颂，然而人们生活普遍穷困，这就引起我的深思。在我外出散步时，经常碰到一些在农村乞讨的妇女和母亲，他们篮子里装着土豆，腋下夹几根沿途捡拾的柴禾回到家里。我确信无疑，这不是普通的乞丐，而是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农夫们的妻女。有些人没有种子来播种他们小块土豆地。他们的住处非常悲惨，有些家甚至连猪也没有。当初，当我在茅舍门口看到猪的长嘴时，心中感到很不舒服，我觉得猪与人混杂在一起，这里的住户生活一定很穷困。后来，在我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后，对这种景象感到欢欣，并且对那些没有猪的农户寄予更大的同情。当然，最好是有一间小猪舍，但是，如果没有单独的猪舍，我也很乐于看到爱尔兰农民的那种作法，因为养猪可以偿还租金，就让猪也有权在房舍里活下去吧！让猪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听任猪在屋子里嗷嗷作声。托马森的这种情况，是穷人们能得到的繁荣生活的例子；那里有的家庭养3只猪，应当说明的是，我进行考察时正是播种土豆季节，劳动是很值钱的。”（第1册，第4章，第79页。）

英格利斯先生不遗余力地揭发庄园主的压榨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在基尔肯尼郡，卡伦城附近的领主克利夫顿就是这种人。这位庄园主每年收入有1万到12,000英镑，不仅使他领地的居民一贫如洗，用极苛刻的手段榨取高额地租，从不考虑减轻领地居民的负担，而且还火上添油，额外加税，他在卡伦城城门口收城门税，凡是土豆、煤炭、牛奶等生活必需品都得抽税，这种税给他带来250英镑；这个城市有4,000—5,000居民，其中有1,000人经常没有工作，有600—700人毫无收入，还有100—200人由于残疾不能劳动而沦为乞丐。征收城门税的借口好象是为了维修道路，但是，从来也没有为修路花过1分钱，这个城市的道路是如此崎岖不平，以致人们坐驿车经过城市也得花12分钟，因此哪位旅客也不愿坐车而只好步行。在居民住宅区，那些棚户、或者说是巢穴，那是在地里挖的洞穴，上面铺的是草，在这里，丝毫也找不到舒适和文明的任何迹象。（第1册，第4章，第99页。）

在爱尔兰，人们应该特别注意到，穷人阶级的命运在依靠富人阶级方面已达到何种程度。事实上，在这个国家，人们看不到较穷的人逐步上升为较富的人，这种进展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中间建立了联系；人们在一无所有和什么都有的中间找不到中间阶层的人，没有富足的资财就没有宽裕的生活。因此，只有一个地主和他的家庭成员来消费所有那些不是提供出口的农产品，这些产品比起穷人的粗劣食物高级得多。而这个地主的家庭也就是五谷杂粮、奶油、黄油、鸡蛋、水果等产品的唯一市场；因此，土地也就不必生产那些不供出口的物品了。这样，只有地主单独一个人要求和需要各种劳动，而这些劳动也不是直接用于增加农业产品。只有这个地主能为大家都有用的劳动操心，只有他关心未来，注意改善劳动条件。在欧洲其它地方，农夫、工业家、苦力的生活富裕或贫困与否，基本上是看是勤俭持家还是挥霍无度。一个人如果好好劳动，勤俭节约，奉公守法，要提高生活也就不需要求助别人。但是，在爱尔兰，在某种程度上，在英国某些地方也是如此，由

于富人们掌握一切财产，他们对穷人的命运应负有责任；这不仅是掌握着许多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富人的劣迹，同时也是富人们任性所为而犯的错误。富人们在事业上的失败，他们的幼稚无知，以及各种疾病，加之富人又不在本地生活，这都是过去繁荣地区的人们沦为乞丐的原因。

爱尔兰人喜欢排场，爱出风头和享受；一般说来，爱尔兰领主们的讲究吃穿和挥霍无度与他们的财产是不相称的。在该岛的最西部，最不开化的康诺特地方；此地的民族是透支成性，地主们个个负债累累。英格利斯先生说，“在高尔韦，我有机会和几位地主交谈，我非常遗憾地看到，他们对穷人生活很少同情，而对针对他们的法律条文却极为憎恶。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以及整个爱尔兰西部地主的压榨行为呢？那就是他们的缺乏远见：这个地区大部分商业乱七八糟，这种困境就迫使地主对佃户们十分苛刻，竭力征收他们能给予的最高额地租。因此，每一个靠土地生活的阶级都一样穷极潦倒；佃户们交纳地租后身无分文；领主们清偿债务后也囊空如洗，什么事也干不成；农夫为了找到工作，要付很高的地租，短工们同意一天干 14 小时、挣 6 个甚至 5 个便士，这个价格只够买 14 镑土豆。”（第 2 册，第 2 条，第 24 页。）

但是，当富人的债主掌握富人的财产，并把这份财产按他们意志使用时，穷人的地位就变得更难以忍受了。于是，地主管家既没有选择余地，也不能手软；他要收地租，收获那些还没有到家的庄稼，还要到圈地去牵走牲口，在因此造成的损失和收到的银钱中，他是无法计算其得失的。所有那些束缚于土地的人们，即佃户、转租佃户、短工等都是缺乏远见的地主的牺牲者。（第 2 册，第 3 章，第 39 页。）

有一个政治经济学新学派，它好象想证明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能得到补偿，耗费掉的一切会自然恢复，它还想证明慈善是毫无价值的，奢侈也毫无危险，挥霍也不会产生麻烦，这个新学派还用抽象的论证，企图证明，富人们身居别处，靠远方生产得来的收入过活，在爱尔兰，这种办法被称为不在地主制，对收地租的地方不会带来不便。这个学派从来不从整体来考虑事实，观察那些报告中所呈现的事实；但是，他们企图进行分析，凭空找出一些原因，并由此得出结果；然后，他们得出一些实践中从未证实的方程式。可是，编造这种荒唐的幻想世界，对简单的推理粗暴地践踏，为的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消费者离开生产者跑到几百里外消费别的生产者的产品时，生产者也不会感到任何不方便。这里，人们忘记这类产品只能在本地消费，富人走了，生产也就停止了。人们还忘记所有的慈善活动，人们还要把计算当作人类活动的唯一动力。我们的这位旅行家用事实摧毁了这种理论。作者说，“米切尔斯敦及其郊区已深深感到金斯敦伯爵一家最近遭到的失败，他已经停止花费每年在这里得到的 4 万镑先令的收入。目前，整个省受到这样的损失，以致富有的地主无法居住，这在爱尔兰还没有先例。所有的城市及其郊区的下层阶级同样都深受其害。我在米切尔斯敦访问期间，人们穷极潦倒，郡议会为了使几千人不致于死于饥饿，已开始调查，并同时征募捐款……。在一个只有 5,000 居民的城市里，人们能相信 1,800 人没有饭吃？在这些人中，有 1,200 人是没有固定工作的短工及其家属，另外 600 人是老人，残废人，寡妇和儿童。除去这 1,800 人以外，在它的郊区，还有 1,200 人没有生活来源。”（第 1 册，第 6 章，第 142 页。）

我们已经谈到爱尔兰农民的贫困境况，还应该了解城市居民的贫困境况。我们以利默里克市为例。这个城市是爱尔兰比较大的城市，商业发达，

发展也比较快。确实，这个城市所占土地的大部分及其郊区都是属于利默里克伯爵。英格利斯先生谈到这么一件事，这里的人，无论老幼，无论贫富，没有人说过这位老爷的一句好话。（第1册，第13章，第311页。）

“有人告诉我，在我访问的城市中，利默里克市比其它任何城市更穷困。我竭尽全力、仔细地进行调查，我不得不说，这些调查证实了那些以前的那些报告。我花了一整天时间访问了那些一贫如洗的几个区。我到过40多个穷人住宅，这一天所见到的悲惨痛苦、绝望的情景，我终生也不能忘怀。这里有些人住宅是阁楼，地窖，有些人是住在狭窄过道或院落的小茅棚里。这些住宅其脏无比，可以说是垃圾堆一样；不用说多么叫人恶心，我说的话一点也不过分。我访问过的四分之三的住宅中，除去一个铁罐以外，屋里没有家具也没有器皿：屋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凳子，没有木床，只有2捆、3捆或4捆草和一、二个又破又烂的草席，这是作床用的，不用时捆起来放在墙角以少占地方。在住户中，有些是受疾病折磨的、弯腰曲背的老人，还有一些苍白、消瘦的年轻人，身边围着挨饿的孩子们；有些人坐在潮湿的地上，有些人站着，有些人已不能从草堆里站立起来。在这些住户中，我仅仅发现一个土豆。有一户，我发现有一个窟窿通向里屋。我点燃一张纸片想看个究竟，这是一个黑洞洞的地窖，有12英尺见方；两个角落有两堆草；一个草堆上坐着一位站立不起来的妇女，另一堆草上躺着2个赤身裸体的孩子，旁边扔着充当被子的一块破布。但是，我还看到了更糟糕的情况：在一个几乎是完全黑暗的地窖里，地面潮湿，我几乎要滑倒，我看到有一个人坐在木屑上；他一丝不挂，连件衬衫也没有，身上围着破烂的、沾满污泥粪便的草席；他瘦的象骷髅，骨头都历历可见，他快饿死了。我很想访问几百家，而不是40家，我也想访问几千个而不是几百个处于极度贫困和一无所有的男子、妇女和儿童。我确信我经过他们门口的那几百户的家庭情况可能比我在街上、棚户里、谷仓里倡而碰到的这些家庭的情况还要悲惨。”

“我还看到另一种贫困。我以上谈到的是上了年纪的，残废人或者是病人。我还看到另一种人，这些人还有力气，还想挣钱养家；然而，他们也很快成为病人或没有力气干活的人。这些人是纺织工人，他们从早上5点开始干活，到晚上8点下班，每周只挣2.5或4个先令。这些人中有的有妻室和子女；他们每天只吃一顿烧土豆。憋闷的空气、沉重的劳动、不果腹的饭食、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些我也不必多加解释，象我说过的那些人的情况一样，他们很快也会到精疲力竭和无法劳动的地步。”（第1册，第13章，第302—305页。）

作者抓住这种可怕现象，坚持要用法律手段，坚持要给穷人合法的款项；对政府要有强制义务，使老百姓在这种令人失望的制度保护下，也不致于饿死，政府也不应使布施的重担都落到几个财力有限的善人身上，而那些家财万贯、贪婪吝啬、造成人类可怕的贫困的阔老，如利默里克勋爵却逃之夭夭。我们撇开他不谈，我们说爱尔兰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不好的，应该来个彻底改变。我们说的不仅是给饥民施舍面包，而且要保证生存条件，保证作为人们唯一财产的劳动权利，并使人人能得到这种财富。我们将在社会契约论中讲财富是什么构成的，谁来保护财富，财富使某些人在生活中得到极大好处，但是这种获得财富的权利并没有被所有的人承认，也没有受到警察的保护，因为最好的办法是使所有的人都阔绰或富裕起来，因而也就能保证生活的必需品，即使对最穷的人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契约是双方的：一方面保证富

人宽裕的舒服的享受或奢侈的享受，根据契约的明文规定，通过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穷人，对劳动所得也要得到全部报酬。这种报酬不仅要包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而且还要给予好处，使社会生活更好一些、即使是对最穷的人，也要使他们的生活要比野人好一些。因此，穷人通过劳动和对别人财产的尊重，获得居住权，获得穿著干净和卫生的衣服的权利；获得为维持体力和健康所需要的充足的、品种多样的食品；此外，在某些方面获得生活享受的权利，满足各种的乐趣，对现在放心，对将来充满希望，劳动轻松愉快，身体得到休息，智慧和敏感性也得以施展。在作为劳动的果实的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保证后，才谈得上富人的权利。在提供所有的人的生活需要后，多余下来的才是富人的收入。过去富人掠夺和抢劫穷人，富人从肥沃的和精心耕作的土地上得到收益并因此资财万贯，而生产这些收入的种地的农人虽然流血流汗，他们生产的产品什么也得不到，只好忍饥挨饿。

我们不继续跟随英格利斯先生周游爱尔兰其它地方，简而言之，农民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是那些道路最崎岖不平、最荒凉的不毛之地，那里的文明和资本还未渗入，竞争也还没有使地租抬高多少。（第2册，第3章，第41页；第4章，第61页。）相反，在其它一些地区，由于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刚被引入，耕作技术迅速发展，人们认为他们只看到对物的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人的条件没有任何改善，因为剩余的产品只是增加了地租。（第2册，第7章，第120页。）总之，在北爱尔兰的基督教省份，那里的苏格兰族的居民很节俭与勤劳，一些城市十分繁荣发达，但是穷人的生存条件，穷人的真正财产仍没有任何保障；相反，在十五年间，农民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第2册，第7章，第120页。）如果人们找不出弥补办法，过不了多少年，由于同样的原因会造成贫困，北爱尔兰农民的条件将和南部农民一样可悲。

弥补的办法是什么？在英格利斯先生书中每一页都为之高声疾呼。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另一篇中来研究。因为任何一个人，尽管他在爱尔兰或在整个不列颠帝国是外国人，他也热诚地希望将千百万生灵从贫困、痛苦、堕落中摆脱出来，因为这是文明和基督教的耻辱。此外，爱尔兰移民大量涌向苏格兰和英国海岸，这种瘟疫每天都在扩展，它已染及大不列颠，不久将波及整个大陆，因为产生于爱尔兰的那些造成贫困的原因，影响颇大，现在已开始对我们起作用。

想到为穷人作出法律上的预防措施，想到为了使穷人摆脱困境，社会应该作出贡献，这些事情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办一些收容所、托儿所、医疗所，这些也是应该的；办一些储蓄所、当铺也是合适的；建立学校、支持宗教信仰，使宗教救济成为人人力所能及的事，这也是合适的。但是，当人们病人膏肓，慈善措施也只不过是治标办法。那些没有时间上学的人，学校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对那些乞求最繁重的体力劳动都办不到的人，教育对他们有什么用？对于那些连烧土豆都吃不饱、什么钱也剩不下的人，储蓄所又有什么用？对那些没有珠宝作抵押品、甚至连板凳也没有可坐、没有木碗用来盛汤的人，连块遮羞布也没有的人，当铺又有什么用？不，这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深入研究，要触及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地主与农民间的契约，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契约，应该使它建立在实在的基础上，农民用他的劳动养活整个国家，他的生活权利不应被剥夺；要保证农民生活幸福，在国家里能够生存；现在文明进步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总不应该比声名狼藉的封建制度更坏吧！

第六篇 论托斯卡纳农民的生活状况

要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领土财富的发展对其生活的影响，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推理，也不能局限于就其后果提出原则，而应该研究具体的事例，考察那些在文明和财富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向那些头脑不怎么刻板，较为公允的观察家了解他们国家农民的真实情况，并从中找出其原因。确实，我们希望见到更多的象英格利斯先生的《爱尔兰旅行》那样的著作，希望了解劳动阶级在欧洲各国不同的经济和农村管理制度下极其真实而又详尽的生活情况。实际上，对所有那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并不是没有数字统计表，也不缺乏关于各个地区和城市的进出口额的粗略统计数字。我们不乏有关商业活动和制造业活动的报告。同样，我们也不缺乏那些描述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描写豪富的享受和堕落的书刊。但是，在这些书刊中，没有一本向我们揭示过人民的家庭生活和各国的特点，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却找不到。这些家庭有多少财产，日常吃的是什么食品，他们的生活享受和劳动怎样，这些在书中并没有提到。然而，从财富增长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正是了解大多数人的家庭生活，因为它决定国内消费。富人与穷人的比例、各种不同生活状况的人们之间的比例、每一种生活状况的人的年消费额，这些数字在统计中应该是首要的资料，因为它们最直接影响财富的再生产。

我们所提供的爱尔兰人的生活景象，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痛苦，人们会迫切地希望找到补救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参考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那就会有更多的比较使我们认清问题，那就更容易找到补救的办法。在一些国家，我们曾多次通过亲眼目睹来研究农民的现状。但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旅行中观察到的一切还不足以深入了解穷人家庭的内情。要深入研究，就应该长期生活在他们中间，每天与他们接触，甚至相互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对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托斯卡纳农民的生活情况、或者是对尼埃沃尔山谷的农民情况都会因此得到补充。确实，在托斯卡纳，我们有一笔小小的遗产；然而，与萨瓦或瑞士相比，这就使我们对农民情况了解得更广泛一些。在托斯卡纳，当我们与农民来往时，他们对我们毫无隐饰；而在瑞士或萨瓦，那些佃农和短工看见地主时如临大敌，必须巧妙对付。此外，我们描绘托斯卡纳农民生活情景的概貌还有另外的动机，我们对爱尔兰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深为震惊；同时，我们觉得，爱尔兰农民也想享受托斯卡纳农民享受到的幸福；相反，人们不要假借科学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增加净收入等，使托斯卡纳农民也沦入爱尔兰人的悲惨可怖境地。因为，象整个欧洲一样，在托斯卡纳目前的经济体系中，也受到一些令人震惊和捉摸不定的事物的影响。在二十年全面战争中，由于异乎寻常地鼓励生产，消费与生产之间已失去平衡，市场都因此受到壅塞的威胁。地主都感到不安。大家都对目前实行的制度极为不满，并将一切损失归罪于这种制度。在托斯卡纳，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在农业上引进了先进的方法，但是，他们也同样谈到要改革那种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契约制度。而在我们看来，今天所推行的、虽然是制度上的微小变更，却足以剥夺惯常给予托斯卡纳农民的一切保障，同时使他们失去安居乐业的生活乐趣。

象爱尔兰人一样，托斯卡纳人富于想象，天性聪颖开朗，思路敏捷。这两个国家的种族都是非常优秀的。无论是在托斯卡纳或爱尔兰的市场上，人们会碰到许多男人和女人，雕塑家和画家都乐于把他们当作模特儿。这两个

国家的居民生性开朗，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讨人喜欢，对别人体贴温柔，慷慨大方，尤其是穷人的行为更令人钦佩，他们把仅有的生活必需品分给受苦的人或比他更困苦的人，对教堂也慷慨解囊相助。两国人民都笃信天主教；但是，托斯卡纳天主教堂很富有，而爱尔兰教会的财产都被剥夺了。但是，托斯卡纳教士所得的自愿捐款不比爱尔兰少，因为托斯卡纳教士为数众多，还包括托钵修会，除了平时的酬金和弥撒外，为了装饰教堂和节日开支外，还要收一笔巨额款项。在这两个国家中，人们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当教士们强制信徒出钱支持教会时，人们对教士的看法就比较暧昧，这也就降低了宗教的道义影响。实际上，在这两个国家，一些没有背弃宗教感情的人也犯重罪；尤其是犯杀人罪者也并不少见；但是，人们对狂热行为是惧怕的，对别人的愤怒是容忍的，所以对杀人者不是同情而是憎恶。

在托斯卡纳和爱尔兰，还有其它一些报告材料，一些目光短浅的观察家可能相信这两个国家已沦于同样境地。实际上，这两个国家不仅人口多，而且可以说是过剩了。人们只有在某些县里开办商业和制造业，而在其它地方，除了在地里干活外，没有其它工作可做。人们断言，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工人从来不想明天，一个星期挣来的钱在星期天就都花光了。无论是托斯卡纳或爱尔兰，在穷极潦倒时，都没有法律上的储备金保证人们的生活。因此，衣服褴褛的乞丐成群结队地在广场上乞求布施，他们肯定已经饥寒交迫。然而，在托斯卡纳，对碰到意外不幸的人，对病人、对孤儿、对精神病人，收容所都是慷慨相助，而收容所的人数并没有增加。

这两个国家有根本的区别：在爱尔兰，贫困层出不穷，男子得靠劳动过活，在托斯卡纳，唯一的真正贫困的是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安居乐业，过着小康生活，劳动能得到相应的报酬，穷人生活也能得到保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人们生活富裕，环境安逸，这种美不胜收的情景，真令人心旷神怡。

托斯卡纳农民分三个阶级，他们是佃户，永佃户和对分制佃户。象法国、英国和其它国家一样，佃农订有若干年租约，在此期间，他们给地主付固定租金，他们是农作物的主人；在重新续订租约时，为了不增加或减少租金，他们得和地主讨价还价。每当临近这种周期性的争执时，佃户们对经营土地兴趣极为淡薄，甚至希望人们不承认兴旺发达的迹象，因为兴旺发达会增加租金，再则，建立在果木园林产品的基础上的农业体制的农业契约也因此被屏弃了。种橄榄和葡萄的地产无疑会毁于佃户之手。托斯卡纳是丘陵地带，适合种植橄榄树、桑树和葡萄；在所有丘陵地带，农业很发达，人们看不到佃户；但是，在尼埃沃尔谷地的富饶平川地带，特别是在皮斯托亚，人们可以经常碰到佃户，虽然这些地方也种植桑树和橄榄树，因为它土地潮湿，果树产品量虽多，质量却不高，对地主和佃户来说，收益不如种植谷物。在托斯卡纳人烟稀少地区，人们也同样可以碰到佃户；佃户们通过改进耕作工具或屏弃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通过人的劳动获得经济利益。托斯卡纳与其它地方一样，土地租约与大面积耕作发展一致。这种土地租约将小农从土地上赶走，甚至同时将佃户作为装饰和浮财的果树和灌木都剥夺了。土地租约使托斯卡纳某些地方的农民产生了第四个阶级，即短工，这种人在托斯卡纳很普通，而在别的地方却很罕见。他们租一间茅舍，自己没有土地，在农忙时帮佃户们种地，在其它时间则靠掠夺为生，这样就迫使佃户得经常用枪支武装来保卫农作物、果树和桑园。贫困、不稳定的生活状况、伤风败俗和对社

会秩序的对立情绪，这些情况在大不列颠帝国村民中经常见到，在托斯卡纳的短工中也能找到，其产生原因也相同。

托斯卡纳农民的第二个阶级是永佃户，这是持有长期地租的业主，永佃租约只不过是土地租约的修改；它们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长期性。这种长期租赁契约将财产担保费、收益权、主人对土地的热爱等从业主转移到农民，并使掌握土地耕种权的人能努力耕种，能保证土地收益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皮埃尔·利奥波德大公大量地增加了永佃户的数比在这种条件下，迫使教会出让所有的财产。确实，这种条件能使宗教团体有固定的收入，也是这些团体能指望得到的一切；这种条件使主人能关怀和爱护由他永久管理的财产，如果没有这种关怀和爱护，这种土地占有办法对社会就没有好处。

在实行这种占有办法时，人们指责它的唯一弊病是在大面积土地上实行这种措施，长期租赁契约制应该产生农民，即自耕农，这是它的目的和最大用处，这些承担长期租赁契约的农民，与他家庭所能承担的劳动相适应，他们得到的果实也与消费成比例，生活是幸福和富裕的。他们以汗水灌溉土地，为自己耕种收割：他们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以其收入支付地租，在农业繁荣兴旺年代，农产品价格相当于今天的3倍到4倍，这样，他们的劳动就变成了资本，他们也可以开垦荒地，把分得的地块改造为园日，这样就能增加土地的价值；一块交长期地租的、被认为与全部地租价值相等的土地，出售时比未订过租约的地值钱，价格甚至高一半。当农产品难以脱手，价格大幅度下跌时，那时，永佃户就得倒霉，他们得把大部分产品出售以交地租；但是地租总是要付的，而宗教团体不会失去什么，而永佃户也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威胁，他们靠劳动生活，所以能保持独立地位。

不幸的是除了农民以外，其它人并没有采用长期租约制，食品价值的迅速涨价使投机者有利可图，资本家贪婪地抓住时机获得一块土地，其价值远远超过他们具有的资本。得到永佃租约的永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及相当于土地价值15%、或相当于每年地租5倍的保证金。毫无疑问，这对自耕农来说有很大利益，不会使他们失去一切经济收益，也不会从农业中转移资本，有了这种资本就能开发土地。相反，在有些地方，人们卖掉大量国家资财，从农业中真正地榨取了全部价值，这些人是为了此项目的，卖掉这些地产的。实际上，佃农、地主或投机商们从一些有用企业中抽出的资本都用来做生意，并将资本转到政府手中，用于战争或供行政机关挥霍浪费。但是，在托斯卡纳，为永佃租约提供的廉价的土地，使资本家进入为农民准备的投机市场，资本家对他们承担的土地面积、耕种土地的农户的力量、靠土地产品养活人口的数字，他们对其中相互的比例关系是毫不考虑的。土地能得多少产品，资本家就花多少劳动，地里得到的愈多，他们就愈高兴。当食品维持高价时，他们的投机就成功了。他们雇用短工或帮工来种地，把尽可能多的食品投入市场，不仅打算用这些产品付每年的租金，同时还要用它来付每年的生产费用；资本家使所有的工业从属于商业；由于这些资本家竭尽全力使市场壅塞，所以消费并不随着生产一起增长，他们很快地只好拖欠每年应支付的租金，每年要支付的投资也很拮据。他们的处境比贵族更为困难。那些不是农民的永佃户都是负债累累的业主，他们不靠土地生活，为食品的跌价感到痛苦万分，但土地产品出售的收入减少时，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减少开支，直到最后陷入破产境地。

很多永佃户、投机商、或贵族，他们把土地给对分制佃户耕种，这就是

托斯卡纳的第三个阶级，对这个阶级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对分制佃户的契约极为普遍，而其它的契约在本地被认为是很特殊的。地主给对分制佃户一间房屋和一块可以得到收益的对分制土地，还有生产上必需的农业资本和牲畜。在农业上实行精耕细作的地区，特别是在尼埃沃尔山谷地区，他们的土地一般不超过 10 阿尔庞，对分制佃农和他的家属从事耕作劳动时不负担费用，他们不要工资，只要收获物的一半，而把另外一半交给地主，这种协议经常是契约的内容，并指明对分制佃户要交纳的租金和应从事的劳动项目；然而，这些人的义务与另外一些人的义务，它们的差别极微小；日常惯例同样能处理所有的契约；它可以补充条款中没有表明的项目，土地主人如果要排斥惯例，想比邻近的地主取得更多的地租，不想对半分，那就会引起别人的憎恨，他确信我不到忠诚老实的佃户，至少在每个省份，佃户的契约都是一样的，这种契约也从来没有给寻找职业的农民提供哪种竞争机会，对谁也没有提供过低廉的价格来耕种土地。

对这些对半分制佃户的命运和欧洲的其他农民命运要作一个比较。对半分制不仅保证了那些从事艰苦劳动的人，而且也保证了既没有地产、也几乎没有动产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的幸福和安全，这些自耕农生活极为富裕，看到这种事实，人们可能以为这些人会成为产业主；佃农本身就很兴旺发达，我们也不必因此大惊小怪，因为租佃土地就需要资本，而对半分制佃农没有资本；但是，希望对半分制佃户更富有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谁也不想分享他们的财产；重要的问题是要知道，他们的唯一财富是什么，那就是劳动，与那些和他们一样只有一双手作为全部财富的人相比较，他们的唯一财富，即创造了幸福的劳动。

托斯卡纳对分制佃农从大自然得到全部生活资料，他们几乎不需要钱，也不需要付款：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税收的存在，因为税收都由地主负担；由于他们与政府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总的来说，对政府也很热爱；他们也无意与教会发生纠纷，因为交纳给教会的捐款都出于自愿。在托斯卡纳，什一税已经取消很久了，虽然名义还存在，但只是为地产支付少量的固定的税款而已。教会的所有财产都是地产，或者可以说是永久性地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总之，对分制佃农与地主几乎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他们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伙伴；根据惯例制定了权利和义务；确实，如果佃户行为不端，契约每年都可能中断，但是根据经验，地主解雇佃户总是得不偿失，因为新的佃户也决不会超过对半分，对任何人也不可能要的更多。因此，对分制佃农把租地看成祖传的土地一样，精心爱护，不断改良土地，希望能够传于子孙，世代耕种。确实，不少对分制佃农世代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他们很详细也很精确地认识到爱护土地能给予人们什么。尼埃沃尔山谷的丘陵上种植着橄榄树葡萄、桑树、无花果树以及各种果树，在这些树下种植小麦，这样种植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小麦生产的利润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持土地的洁净与疏松。层层的梯日往往不超过 4 英尺宽，但是分成制佃户对每块土地都研究过它的特点。这块地比较干燥，那块地比较潮湿；这块地上层比较厚，那块地是地盖住岩石的地层；小麦在这块地长得好，而黑麦在那块地长得茁壮；这里种玉米是白费气力，那里不能种蚕豆和扁豆；远处亚麻长得好，沟沿适合种黄麻；因而，人们很吃惊，对分制佃农在一块 10 阿尔庞的地面上、斜坡上种的庄稼品种，比一个富裕的佃户在 500 英亩的土地上种的还多。因为富裕的佃户觉得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按常规办事，不注意零星地块。但是，对分

制佃农由于受过去经验的启发，热切想成为行家里手，由于对前途的信心，他不仅想到自己，而且想到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当他栽培橄榄树这种生长百年的树木时，在低洼处修一条流水沟，以防止积水的危害，他也研究应该如何深翻地层。

幸福的生活条件将对分制佃农与土地紧密相连，他们热爱土地，对它寄予希望并精耕细作，这种幸福的生活条件使佃农与他人几乎不会引起冲突。在托斯卡纳，在今天的改革以前，转让财产的法律很坏；由于没有确实的保证，人们对购买土地都不放心，向来也不能防止第三者夺去所有权；妇女、儿童、债主、教会都有各自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互相抵触的，各自按照不同的规则来规定自己的权利，而且还不断地受到君主、有否决权的评议会（类似议会和法庭的组织）的恩赐所推翻。评议会可以剥夺某人行使财产继承权，而让别人替代他的孩子继承财产；配偶给予自己的完整的作为陪嫁的财产，法庭可以判给第三者作赡养费，而且总是用“出于自愿”这句话来代替法律，武断地作出决定。因此，地主们总是打官司，有些人无理取闹，乱提要求也毫不脸红。但是，对分制佃农因为有了财产权，维护这份财产也就毫不费事。地主们因土地发生纠纷，对分制佃农却和睦相处，对他们来说，相互之间没有对立情绪和猜疑；佃户和地主、税务机关、教会都很和睦：佃户们卖的少，买的也少，他们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人向他们要钱。人们经常谈起，托斯卡纳人性格温和宽厚，但是，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所以能维持这种性格的原因，由于这种性格，构成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几乎没有造成纠纷的机会。

当人们远离城市和大路登上尼埃沃尔谷地的丘陵时，到处都会见到在橄榄丛和葡萄树丛中的蜿蜒的羊肠小道，这些小道没有车辙，只有背负驮鞍的山区马匹才能进入。沿着这些小道，每隔 100 步左右，人们可以在鲜花盛开的小山丘后看到一座小房子，它呈现一副甜蜜的情景，人们热爱土地，安居乐业，住房十分精巧。这种房子用灰与混凝土筑成坚固的墙，至少是两层楼，有时底上层上还有两层，底层一般是厨房，还有为两头带角牲畜准备的牲口圈，以及取名蒂纳尼亚（Tinaia）的仓库，称作蒂尼（Tini）的酿酒用的槽池，酿这种酒不必用压榨机；在这层房子中，还锁着一些盛油和小麦的桶。在房子旁还有一个棚子，在那里修理工具。铡牲口草料时可以不风吹日晒。在第二层或第三层，有四间带床的房间，房间有百叶窗，可是没有玻璃，但是，应该想到冬天没有霜冻。最宽敞和通风最好的房子，在 5、6 月间，人们用来养蚕；大柜子是用来装衣物的，木椅子是房间里主要的家具，但是，新娘总会带一只桃木衣柜来，床没有幔帐，也没有床围；每张床上除了装有富有弹性秸杆的褥套外，还有一、两床羊毛垫子，在穷人家里是废麻脚垫子，还有绣花被子，结实的麻布褥单，在家庭里最好的床上有丝垫料的毯子，只是在节日才拿出来作摆设。只有在厨房里有烟囱：在这间房子里还有供家庭就餐的大桌子，还有几张凳子；大柜子同时充当碗橱，用来保存面包和食物，还有面缸；以及一套很完备的、但不值钱的用陶土做的瓶、盆、碟等，一、两盏铜灯，罗马式秤，至少有两个用来提水的铜罐。

家庭所有的内衣和外衣都是家庭主妇自己制作的。厚衣服是半毛织品的梅扎拉那（MezzaLana），薄布服是布制的莫拉（Mola），纬线是麻或麻头，里面垫的是羊毛或棉花；衣服也是由纺织的妇女染色。农妇们为积累布匹和梅扎拉那，人们很难想象她们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库房里又有多少褥子，

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又有多少衬衫、上衣、裤子、裙子和袍子。为了了解情况，我们记下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清单：这个家庭不是最穷的、也不是最富的，它靠种 10 阿尔庞土地，通过对半分成制，靠自己的劳动过着幸福的生活。人们告诉我们，所有的麻布和棉布都将送到成衣费便宜、有先进机器的裁缝铺。那么我们看看，农家妇女干什么呢？而爱尔兰的妇女现在又干什么呢？英国短工的妻女们又干什么？没有，这些国家的妇女什么也没有干。短工们靠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妻子和女儿们的生活：一半居民被迫无工作可干而闲呆着，人们可能指出，这是无产者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托斯卡纳的妇女并非只从事手工纺纱：大家都在托斯卡纳式的家庭里劳动，大家都是在没有监工、没有检查员、没有任何监视的情况下劳动，因为大家都是为他自己，为他的亲人劳动，大家对劳动都充满热爱，并为劳动竭尽一切聪明才智。在尼埃沃尔谷地，每一家分成制佃户牲口圈里都饲养两头牝牛。然而，人们看不到草地，也没有人工饲料，没有放牧场。饲养牝牛的草料都是田地里清除的杂草，还有从沟里以及从保护丘陵的几乎垂直的草坡上刈割来的。家里的妇女和儿童每天都在庄稼地里除草，并将这些草和稻草一起铡后饲养牲口。在我面前就有一个家庭，他们和我住在同一所房子，父亲和母亲还年轻，他们有 3 个孩子，分别是 10 岁、7 岁和 15 个月。因此，他们不得不从乡下雇了一个女佣人。女佣人和女主人一起劳动，并因此感到骄傲。大儿子才 10 岁，已经很聪明能干。他从父亲那里学会怎样劳动，虽然年岁小，已经是一个好帮手。他干各种活计都很乐意和自在，他相信靠自己的力气和才智，凭自己的劳动，他们的生活能过得很舒服。

确实，丰富多采、自由自在和充满希望的生活，无论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支持他们从事田间劳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富有诱惑的力量。他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但是，劳动出于自愿，才智又来自劳动，劳动成果是与他自己及他的孩子紧密相关。他干的农活每天都有变化，有时一天改变几次。毫无疑问，手有某种熟练性，同一种劳动有一种规律性和舒适感，它产生于习惯，而轮流干多种劳动时就消失了；但是这种体力上的长处往往由于聪明才智发展而得到平衡，因为所有体力的活动是注意力和意志的结果。每天干一种农活，接连几天干同一种农活，容易使人疲劳，而变换工种对身体健康、体魄和强健筋骨都有很大好处。人们认为，一种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另一种劳动的疲劳，几乎和休息一样。总之，工作的多样性使对分制农民对生活产生了经常性的兴趣和乐趣。在其它的国家，千苦力活的人被笨重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别人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人是喜欢或者是讨厌他的工作，而他们甚至不敢公开承认厌恶单调乏味的工作。然而，讨厌还是喜欢决定于

1835 年 4 月 29 日，佩夏附近的波尔塔韦希亚地方，瓦朗特·帕皮尼的女儿让娜与吉奥瓦希努·兰迪结婚，嫁妆清单如下：28 件衬衣。3 件彩色丝袍，4 件彩色绢丝袍，2 件冬天劳动服（梅扎拉那），3 套夏天劳动服和劳动衬裙（莫拉），3 条白裙子，5 条染色布围裙，1 条黑色丝围裙，9 条彩色劳动围裙（莫拉），4 条白手巾，8 条彩色手巾，3 条丝手巾，2 条绣花面纱和 1 条罗纱巾，3 条手绢，14 双长袜，2 顶帽子，一顶是毡帽，另一顶是细草帽。2 件金浮雕，2 个金耳环，1 串带有两个罗马皮阿斯特的念珠，1 个带有金十字架的珊瑚项圈。这位新娘有 50 埃居的嫁资，其中 20 个埃居付的是现款，其余的是赊欠的，每年付 2 埃居。托斯卡纳埃居值 6 法郎。所有比较富有的新娘有一件丝织节日盛装。在一生中，她们只穿四、五次。在托斯卡纳其它土地面积较大的对分制农户的姑娘，她们的嫁资一般是 100 埃居，即 600 法郎。男子没有聘礼，新郎结婚时只有 14 件衬衫，还有一些其它衣物。他只有 13 床被褥，而新娘有 30 床。

生活是享受还是劳累；而我们估量穷人的幸福时，既要看看他们吃什么，也要看看他们享受乐趣还是感到厌恶。

根据托斯卡纳对分制佃农的劳动安排日程表，我们可以判断，一年四季中他们是如何分配重活与轻活，有时用体力，有时需要技巧，干完这些劳动到干另一种劳动，干苦力劳动的人会得到休息。在每年第一季度，即1月、2月、3月，托斯卡纳农民的主要劳动是整翻和修剪葡萄，这是需要技巧和动脑筋的活，每一剪都要认真思考，每一剪都不能为贪利而胡乱从事，否则很快会毁了葡萄。对分制佃农还得收获橄榄，无论是摇树枝、拣果实，或者是从地上扶起树枝，都要谨慎，要讲究技术，否则会影响下次收成；这是一种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活，同时也是累活，因为要在浸着冰水的草丛中寻找橄榄，最后，还要将橄榄放到压榨机中粉碎，这种劳动日以继夜，是很费体力的活茬。

4、5月间，农民要锄地，并在地里播种玉米、高粱、鹰嘴豆、青豆、扁豆。他们还犁耕葡萄和橄榄树，同时上肥。这种农活需要消耗很大体力，所以夹杂一些轻活，如整修橄榄树，去掉死树，清理树枝，使新的嫩芽能从受损害的枝杆中重新长出来；与此同时，对满山遍野的栗树进行剪枝。

6、7月间，农民主要从事收割牧草和小麦，同时，农家养的蚕已长大，很需要吃食。白天黑夜都需要细心照料，小心翼翼地将蚕从这个蚕席移到另一蚕席，当蚕沙发热时，得一条一条地用手把蚕挪开；最后，还要从桑树上摘下桑叶而不损害树干。与此同时，开始收获庄稼；随着庄稼的收获，就要将这些产品送到市场上去卖，或者留下储备过冬。然而，从7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一俟收获季节结束，就要开始耕耘土地准备重新播种麦子。7、8月间，佃农们相互帮忙，轮流在各家的露天打谷场收打刚收获的谷物。天亮前几小时，他们切断秸秆并堆成垛，只保留麦穗以供连枷打麦，在8月灼热的阳光下，他们集中在一起，用足够的人力以保证佃户的麦子能够在一天之内打完，扬完，并过秤完毕。但是，打场是一年中愉快的日子，它是农村的节日。劳动者的欢乐带来了勇气与力量；佃户们互相帮助并互相款待；他们的食品很丰富，菜肴很可口；在露天的桌子上，酒肉满席，晚上经常有歌舞，直到尽欢而散。在相互邀请的间隙日子里，他们耕耘土地，这是不怎么愉快和相当劳累的活茬。这时，佃户每天只有在中午休息1小时。

9月，农民收获玉米及春天播种的庄稼，他们收获黄麻；两个月以来，他们已收获亚麻，加工纤维作物，脱粒，把一些不必出门的活计留在雨天完成。本月份，他们清理地里沟渠，并将清理出来的土给葡萄培根施肥，同时，再次检查栗树，在植物生长的旺季8月以后，剪掉赘芽。10月，人们忙于收葡萄和酿酒；这个月开始收栗子，此项工作要继续到下个月份，并将栗子文火烤干后研成粉末以便常年保存。同时，农民开始收小麦，这项工作继续到12月底。

我们在上面谈到过，托斯卡纳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消费自己生产的收获物一半；至多也不过是把一些收获物与地主作交换，佃户将留下一半的油和酒和地主交换粮食以作祭祀用；因此，他们买和卖都很少，一年所需要的一切也足够自给，也不必花钱。然而，果品、青菜、蚕丝、优质酒、油的大部分都是准备出售的；他们购买支葡萄架的木料，他们圈里养肥的带角牲畜也是商品。因而，他们也经常上集；一个星期上一次集的情况很少；当然，如果人们把用于与商人打交道的的时间称作浪费的话，在那里要浪费很多时间，

这种时间是用于了解这些商人并联系感情的。

另外一些休息日，那是宗教节日：所有不十分急需的活茬在星期天和节日都暂时搁起。大家知道，意大利有很多宗教节日：人们不要将这些节日与希伯来人的安息日相混同。基督教的慈爱精神，要求保证穷人的休息，在艰苦生活中掺入快乐。因此，有一部分节日是用于宗教仪式，虽然宗教对其余的时间安排也有影响，但是大部分节日是自由参加的，虽然，每个教堂有圣像和时行的风尚，但是城乡居民蜂拥而至，与其说是接受祝福还不如说是集会。青年人长途跋涉，到很远的乡村参观教堂，这也是别有一番闲情雅意。在这些节日里，人们炫耀阔气。农民希望炎夏提前来到，脱去罩着呢料上衣的大衣，因为，让邻居看到自己既有大衣又有呢上衣，这是很惬意的事。妇女们头裹白纱，身穿丝棉袄或纯丝的连衣裙，艺术家都要瞧这种种热闹，并为到处可遇到的窈窕美丽而惊叹：而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对这里居民呈现的幸福惊叹！

托斯卡纳农民饮食是节制的，但食品很讲卫生，品种也多种多样：基本食品是小麦粉做的棕色面包，但不掺和麸子和其它东西。尽管麦子比其它谷物昂贵，但丘陵地区的农民认为最合算，因为同样的价格的东西，麦子营养比较丰富，所以是农民的习惯食品；因此，农民喜欢种麦子以供食用。但是，当他们的土地种其它谷物时，他们也食用土地上收获的谷物：因而，平原的农民也食用混合麦、黑麦、玉米、青豆、鹰嘴豆、黍子（Le Kouskoussou des Arabes）；丘陵地的农民偶而也食用这些谷物，还有栗子面。栗子面和玉米，一般是留作冬天食用的。他们把这两种面和成面团或糊糊的热食，不加任何调料，名叫“波仑达”

（Pollenta）。确实，在天气不好的季节里，农夫特别需要热的食品。那时，农夫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点吃“波仑达”，到傍晚时分再吃面包、汤，还加一些小菜肴。夏天，农夫吃3顿饭，早上8点，下午1点，还有晚上一顿，但是，他们只是在晚上才生火作饭，晚餐包括汤、一盘腌肉或干鱼，还有夹着面包一起吃的豆类或青菜。肉类的量很少，因为对普通家庭来说，他们认为每人每年吃40磅也就足够了：每个星期，他们在汤里放两次腌肉。星期天桌子上总有一盘新鲜肉，这块肉大约是1磅或1.5磅，不管家庭人数多寡，这块肉也就够一家吃的了。一般来说，托斯卡纳农民一般都有橄榄油使用，它不仅用于照明，而且用来炒菜，用这种油炒的菜，滋味鲜美，富于营养。午餐时，他们吃面包，再加奶油和水果；晚餐时吃面包再加生菜。他们喝当地的质量不高的葡萄酒、用葡萄渣发酵后加水制成劣等带酸味的酒。然而，他们也为打场、或为过节准备一些质量很好的葡萄酒。对一个成年男子来说，每年大约要消费10桶葡萄酸酒，10袋面粉。

现在概括一下对分制佃农通过分成制契约得到的享受吧。他们的劳动是多种多样的，人身是自由的、对生活充满兴趣，对未来充满希望，并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他们的住宅是卫生的、干燥的、通风的，很宽敞和舒服。睡觉很干净舒服，衣服很适用于劳动，还有些漂亮的服装，节日穿戴也很时髦，他们的食物也是很卫生和丰富多样的，因此托斯卡纳人相貌堂堂，风度翩翩，

法国、瑞士、萨瓦的农民收获核桃油。如果下列颠诸岛也有真正的农民，他们也会种橄榄树，并拿来作同样的用途。

而邻近只有数里之遥的生活贫困的农民就没有这些特点。这就是穷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劳动者的权利，在整个国家剥夺这种权利是既不合理又很失策。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进行脑力劳动的权利，这是造物主赋予的天赋本能。托斯卡纳农民没有被剥夺这种本能。他们对艺术的享受、对美感都十分敏感。首先，他们对故乡的美丽景致感到愉快。在尼埃沃尔地带，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打麦场，面积很少超过 25 到 30 图瓦兹 见方。在对分制佃户中，大致都是这个水平。这种场院俯视山谷和平原，令人心旷神怡。我几乎向来不注意欣赏风景，除非是佃户们来与我分赏景色，用手指着秀丽河山，生怕我放过这种美的享受。场院和房屋周围，种植了桔树、柠檬树、茉莉花和槐树（*mimosa nilotica*），并散发扑鼻芳香。青年农民在帽沿上扎上花束，路旁小教堂也围以花环，如果他们正在谈情说爱，每天都送一束鲜花给他们的情人。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是否会拒绝发展智力？确实，识字的农民很少，一般说来，书本教育对他们是无缘的。然而，别匆忙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读书才是沟通思想和启发思路的唯一方式。同样，也不要忘记，思考实践很少，语言符号一般表达方式引起的疲劳，这些似乎也会增加思维迟钝和不愿动脑筋。让我们不要带偏见，听听作为社会中坚的农民，从语调来判断，他们在朗读中能否启发他们的思想和唤起内心的激情，再设法核实农民对它能否提出批评，如果情况相反，那对农民来说，书籍也不是高级动物的启示，而理智是应该服从于这种启示的。阅读的能力可以判断教学法的好坏，毫无疑问，好的教学法在今天还是占优势的，阅读可能对感觉和想象起作用，但对智力的作用很少。此外，托斯卡纳农民在这方面是见诸于行动的。很少的家庭中没有担任教士或准备担任教士的人，或由于偶然的机会有受到教育的人。在冬天的夜晚，托斯卡纳农家围坐一堂，识字的就带读。全家背诵玫瑰经后，识字的就拿起书；经常阅读的是福音书，圣经节录或圣徒行传；当读完一遍后，又重新开始，因为农民和孩子一样，喜欢那些已经知道的故事，他们不懂得这些故事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新鲜东西。

此外，托斯卡纳农民习惯于受宗教仪式的熏陶：虽然仪式并不严格、审慎，但至少是有规律的；每天，在家长带领下，全家虔诚地作祈祷；每个礼拜日，所有到了懂事年龄的人都做弥撒，经常听讲道，接受关于尽责的训言；在将临期和封斋期，每人差不多都要听讲道，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都是宗教的基础课；每年要到教堂神堂作二、三次忏悔。即使教士并不怎么称职、道理也不讲得很清楚，道德说教也不尽善尽美，但是每人仍然得定期作道德和思想上的反省，这种经常性的行动会给人精神安慰。走不很远，人们就可以找到全体居民，对他们来说，肉眼看不见的世界的观念从来也没有在脑海中涌现过，也从来没有给予重视。什么是最高贵的造物，是那些只认识人作为物质存在的人呢还是那些只想到物的人，或者是那些知道这些高贵的造物是有灵魂的人，这倒是很容易决定的。

托斯卡纳农民的语言与上流社会人们的语言几乎是一样的，在各个社会身分的人们中间，没有方言土语设置障碍，人们思想的沟通很快，也很习惯，人民大众也能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了解民族诗歌，很多旅行者注意到，

卢卡地方农民分成较少，因而外貌就不大漂亮。

图瓦兹（Toise），法国旧长度单位，约 1.949 公尺。——译者

在意大利享有盛誉的诗人的诗篇，也被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所熟悉、背诵和歌唱。此外，老百姓普遍喜欢编顺口溜。我无法回答那些我在街上听到的顺口溜在语法上是否正确，但是我要承认，我不大注意词义而是比较注意朗诵节奏是否押韵，然而，普遍喜爱编顺口溜的民族，谁又能否认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呢？最后，对托斯卡纳人来说，看戏是学习诗歌、语言和神话的学校。在节日，尼埃沃尔山谷的居民喜欢在夏夜 9 点到 11 点看戏。阿尔菲里是他们特别喜爱的演员，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对阿特里德斯的故事也很熟悉，在艰苦的劳动后，他们要求这位严肃的诗人演唱节目。

但是，人们也许会说这些娱乐是精神上的奢侈品，在享受娱乐之前，应该了解一下这些农民是否知道，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是学习农业科学。如果我们去问托斯卡纳的农学家，他们会谈到农民的偏见和无知。农民的偏见往往是社会安全的保证。这种偏见推迟改革，因为理论家是难以预料改革的所有后果。对书本上写的东西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主人也许是一种好处。理论家们在口头上赞赏山那一边的改革的农业，这种农业只存在于某些模范农场里；但是，托斯卡纳共同的、普遍性的高级水平的农业，比世界任何国家要优越得多。尤其使我赞赏的是尼埃沃尔山谷普遍推行的农业，这个地方虽然气候很好，但是土地并不肥沃；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很少能找到人口如此稠密的地方，但是人民生活富裕和安居乐业。这些勤劳的人们，创造了这个地区迦南式的农业，象空中花园似的层层梯田，从平原直上高山之巅，种满了橄榄树、无花果树或葡萄。创造这样奇迹般的劳动成果的人，就智慧和毅力来说，可以和最能干的人相媲美。

这些梯田建在陡坡上，土壤受侵蚀达 4 英尺，如果换另一种耕作方法，一下暴雨就会被洪水冲走。在托斯卡纳的另外一些地方，人们只看到光秃秃的荒凉岩石。这些梯田不仅为当地增添了美丽的风景，有益于健康的环境，还增加了财富。那末，人们从哪里找来这么多的资本来建造巨大的工程，哪里来的智慧来构思这副图景，哪里来的时刻保持的警惕性以弥补大自然的灾祸？这些都是来自对分制契约，对农民命运的保证，对养育他们的对分制土地的爱，以及农民及他们的子孙能世世代代收获他们勤劳、节约、兢兢业业操持家业的果实的保证。尼埃沃尔山谷的农民的劳动量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的劳动都结了硕果。在从事这种田间劳动的国家中，他们在吃、穿、住方面可能是属于最好的了，劳动也是很愉快的。在辛勤劳动之余还能得到充分的和愉快的休息。同时，使用体力丝毫不会损害智力，体力劳动经常与动脑筋相结合，由于几乎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和勾心斗角，道德情操就保持得比较完好，某种程度上作为人类本性的想象力、爱美观点等也受到珍视，老百姓也同样享有艺术家的对音乐、诗歌、绘画等爱好和感情。

人们还有什么需求？政治经济学的目的难道不是用人们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资料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幸福吗？当这个目的达到了，人们是否还会说，这种农业体制是否把最大的纯收入作为结果，是否很好地促进了商业，是否给政府提供可征税的物资呢！是的，可能人们会这么问，而我们准备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使国家达到人类结社的目的，为了使国家在文明的基础上成长，为

阿特里德斯 (Atrides) 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译者

迦南是巴勒斯坦的旧名。——译者

了使人们的思想和天赋得到发展能和身体的功能发展一样，最后，为了使国家完美无缺，它应该包括富人、中等生活状况的人和穷人。为了国家的进步，还应该有闲暇的人以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一些人要从事人类最高级的脑力劳动，并因此得到相应的报酬，而另一些人从事体力劳动。但是，托斯卡纳确实呈现了人类不同生活状况的人可庆幸的逐渐演变过程：在那里，人们几乎看不到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是不受思想家和享有闲暇的人的影响，也不受这些人的榜样所激励。在法国，从这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的路程，相当于托斯卡纳从这个镇到另一个镇、从这个文化中心到另一个文化中心的距离。在法国，城堡里住着一个靠土地收入为生的贵族，他与其它城堡的贵族相距甚远，目的是限制社会效果，这样做，与其说是要在思想上影响别人，倒不如说为了打猎和体育活动。在托斯卡纳，每一个小镇包括二、三十户，他们也享有法国乡村贵族的独立性，并在这种基础上，结社思想更起着促进文明的作用。在英国，就人口和土地面积相比，富裕户和托斯卡纳一样多；但是，大部分富裕家庭不靠土地生活；他们靠工业或商业发财致富，他们的资本买了公债，或靠国家或教会给予官吏的优厚待遇生活，所以，这些家庭和农业是没有关系的。英国的土地都被万贯家财的领主所占有，他们穷极极欲，与种地的庄稼人有天壤之别。

然而，我们说过，在托斯卡纳生活了三、四百年的、过着幸福的小康之家生活的居民，他们的人数在过去比今天还多。我们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在每个村庄中消灭这种家庭，并引进一些阔气舒服和大方的新享受，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幸。我们把这些变化归于政治上的原因，归于专制思想代替共和思想，归于政府的集权以及富人由于羡慕宫廷的豪华奢侈生活而将财富匆忙转移到首府和宫廷。同样，我们也很痛心地看着，最近三十年来，在地产方面有一种新的改革。有些人经营商业迅速发了大财，他们千方百计把过去的地主家产买过来，在有地产的地方，它的行善的影响消失了，而代替过去三、四十户的唯一的新富户也很快地离开当地去首都了。但是，当这家富户发大财时，当地的大部分家庭，甚至首都的家庭却衰落了。在这里，贪婪和爱国精神相结合，为的是改进一切物品的生产手段，给所有的市场带来更多的、不可能卖出去的工业和农业产品。战争很快地消耗了各种物品，在战争中，通过借贷和国家资本，发展起来的生产与收入仅能相抵消，这种生产人为地鼓励产品的增加：农业很快地积累财富；人们似乎不能给市场带来较多的麦子、油和酒。虽然收成很好，粮价抬得很高。因此，四面八方都扩大种植，到处开荒地，产业主因为购买过多和开荒过多而借款负债；为了嫁女儿或妹妹出阁，他们也得借款负债，因为法国立法的影响，对妇女来说处境比过去更为有利，同时，业主对出让他们的祖传产业深为厌恶。因此，当战争消费突然停止，国家资金不再购买每年出产的产品，虽然农业极为兴旺繁荣，业主们仍然负债累累。当农业产品的需求大量过剩时，人们就指责贸易自由，长期以来，特别是当人们不得不指责贸易自由时，托斯卡纳政府是受到赞扬的；这里食品跌价一半，有时跌三分之一。那些没有负债的业主可以减少开支以摆脱困境。这种对策不能挽救那些需要付巨额利息的业主。为了应付契约上并没有丝毫改变的义务，业主得卖掉比原来多 3 倍的食品；他们只好重新借钱，总是负债累累。

还有一个促使加速破产的原因，那就是业主们对旅行的狂热，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在英国，人人都想享受欧洲的田园乐趣。这些旅客在托斯卡纳

人面前摆阔气、讲排场，欧洲的名门望族客不得外国人在他们面前炫耀奢侈豪华。在富丽堂皇、具有王家派头的宫殿式建筑面前，贵族们对客人们的胜过他们的阔气和排场感到羞惭。意大利旧式贵族的排场已过时了，豪华的摆设虽然世代相传，使人眼花缭乱，但是比起今天讲究的时髦玩意却相形见绌，也不值钱，然而，时髦的玩意只能供一时的享受，它会象花香一样烟消云散，象乐曲的和音一样遁之夭夭。为了用今天最时髦的、明天也不会过时的摆设布置厅堂，托斯卡纳那些自己还感到富有、认为农业的危机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贵族不动用他们的财产。因此，那些名门望族几乎全部负债累累，一部分宫殿已不再属于那些使他们出名的家族了。整个地区富人都负债和破产，这样就引起农民的破产。对于对分制佃户来说，这种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的；但是，由于这种原因，托斯卡纳人也谈起改变对分制这种制度，那些由于经营商业而感到经济拮据的业主，只有指望农业上的新发展以求得到补偿。但是，这种办法是欺人之谈；因为目前的苦难是由于食品的过剩和跌价。然而，他们的一切努力只不过使价格更为下跌。他们抱怨对分制佃户反对引进经过改良的方法。但是，他们可能最希望这种反对会有效果，农业会停滞不前，直到消费也达到生产水平，从而使价格回升。确实，对分制佃户反对挖掉葡萄和橄榄而将土地进行大面积耕作；他们排斥改良犁和除草机；他们排斥一切置人的劳动于无用的东西；他们排斥有可能要他们作出牺牲的纯收入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也捉弄业主本人，因为他在农业中引进的经济管理制度赶走了吃粮食的工人，那时，生产那么多粮食又有什么用？然而，这就是今天使无产者骚动的因素。这种经济管理制度使我们心惊胆战，我们以上谈到的值得赞赏的体制是建立在习惯传统上的，而且只是受到公众舆论保护的。如果，一旦有人自以为可以要求农民拿出比他们祖辈更多的东西，自以为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并强加予苛捐杂税，那末，他就会乱出高价，象爱尔兰那样拍卖所有土地，今天地球上最幸福的耕种者的种族很快将会变成最不幸的种族。

对分制契约使耕作者所处的条件不仅对业主起作用，同时对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也有影响。人们可能会说，根据我们的介绍，大部分居民自给自足，既没有商业，也没有交换；农民吃自己烤的面包，喝自己酿造的酒，穿着自纺自织的羊毛和麻布的衣服。总之，他们与人类社会漠不相关，只是靠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援。确实，交换的是剩余产品，但是他们终究还有剩余产品；人民群众的大部分、人数众多的耕种者阶级都享有剩余产品，有这种保证的民族该是多么幸福！同时，这对商业也有多么大的好处啊！因为真正的商业是建立在国内消费和全体人民的富裕的基础上。确实，托斯卡纳的农民只购买节日服装，而且要穿六年或八年。但是，如果将他们的衣服总数、用具、家具列一个清单，由此人们可以推断，那些不是买来而是由家庭制作的东西，它们对商业的促进，不仅远远超过爱尔兰的短工，同时也超过英国的短工。然后，人们观察一下托斯卡纳小城镇的市场和它们的店铺，那时，人们就会确信那些由于当地真正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然集市为数颇多，而且还会确信，工业的真正的持久的繁荣只有建立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幸福和富裕基础上。

经济学家、尤其是金融家考虑国家问题却是另外一种观点：他们对每一个家庭、给予每一个公民丰衣足食的生活想得很少，他们想的只是从他们身上抽税，弄一笔可观的收入供王公贵族们挥霍，或者用作社会管理费、以及用予国防费用。国防费用虽比其它费用更为巨大，但对托斯卡纳人来说，要

求付出的牺牲却比其它各项费用为少。今天，弱小民族自己已不能自卫；它们的独立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由条约和公法来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欧洲各国来维护。托斯卡纳的面积和国力与瑞士相仿佛，只供养 6,000 兵士，与其说是为了国防还不如说是为了治安，就这样，人们还可能说是无用的奢侈品。但是，如果说托斯卡纳没有军队，那末瑞士也就没有宫廷。托斯卡纳的军队只是在宫殿里养着，为的是显示阔气，欧洲大国的君主都为之侧目；军队待遇很高；同时，政府精心维护所有的公共工程。政府预付很大一笔钱，将整个希雅那省从水底下挽救出来。今天，又花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钱，整治马雷姆省，种植庄稼，以利居民安家。道路修整一新，在这里旅行花钱少，速度快，任何国家无可比拟。蜿蜒于山间的、只有役畜才能到达的山间小道，公众也维修得很好，而且大部分已铺上石子。法庭也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居民中为数很少、至多也不过 6,000 人在初审法庭出庭，而且大部分都是移民。到镇公所也不需走很多路；因为每个市、每个镇、几乎在每一个城堡都有市镇组织。在所有市镇中，有一、二个由公家负担费用的医生，有义务给穷人免费治病，因为当局把维护公共卫生视为自己职责。在所有的城市，人们用大量捐款办了大医院，学校也遍布各地。不仅在每个教区有为数很多的教士主持的教堂和礼拜堂，在城市里，不到一里之遥就有富丽堂皇的宗教建筑。在这个时刻，问题并不在于检查这些基金是否很好使用，所有公职人员是否很完满地向社会尽职。我们只愿意证实一件事，国家组织已如上所述，它大力补助公共费用，国家这样做并不因此加重捐税，也没有损害工业和商业，也没有因此负债。我们相信，在托斯卡纳也一样，也还有一些弊病要纠正；人民不仅有权得到幸福，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会幸福，以及要掌握幸福的保证。因此，我们根本不是给改革精神或改良精神泼冷水。但是，这个我热爱的、作为我的第二祖国的国家，我希望把它作为范例介绍给其它国家的人民。我们把这个国家情况介绍给其它各国人民，为的是要确信模仿并不一定是改进措施，其它国家的进步对本国来说，经常是一种倒退。

然而，是否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托斯卡纳幸福的生活条件，漫山遍野的财富，丰衣足食的生活，维持这种或那种秩序的、托斯卡纳人为之劳动的契约制，因而在这个地方已经无事可干了，哲学家的愿望、管理人员的工作也可以就此停步了？不，托斯卡纳还大有可为，土地还可以扩大种植，人民生活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和消费也可以增长。在托斯卡纳，我们不仅可以研究使广大民众幸福的手段，还可以逐步改善上苍给予的条件。生产发展、财富增加，各种生活状况的人都得到利益，而且并不因此失去平衡，无论在什么地方，众人的利益不靠某些人痛苦来获得。这种将来的进步现在已经开始了，它是爱国主义与忠诚相联系的高贵典范，并且值得详细地加以阐述。

亚平宁山脉环抱着托斯卡纳的北面 and 东面，西面与南面是大海，中间有一段既不是高山、又不是平原的起伏不平的丘陵。只有亚平宁山的坡地才有可能接受迦南文化和修筑这些梯田，它构成了尼埃沃尔山谷和卢卡那样美丽的景色和财富。远处是冲积平原造成的富裕的河谷盆地，只有这里物产丰富；但是，托斯卡纳大部分土地是覆盖着凝灰岩和粘土的丘陵。凝灰岩由石灰质砂土构成，稍受压力或雨水冲洗就会毁坏，而表层的粘土却相反，雨水不易渗透。这两种土地都是不毛之地；因此，河流和水流两旁的丘陵景象十分凄惨，从 300 英尺到 1,000 英尺高度的地方，尖峰突起，乱石鳞峋，有一部分是灰白色，有一部分是深黄色，什么植物也不能生长。然而，长期的经验告

诉人们，由于水流冲洗，石灰质砂土和粘土混合成泥灰岩土层的河谷，种植庄稼可以获得很好收成。但是，人力无法进行这种混合；河床很厚，凝灰岩丘陵与粘土丘陵相距甚远，想把两种土质搬来运去也确非易事。

然而，托斯卡纳人发明了一种办法，借水的力量在山谷底层利用这种混合土。人们称这种办法为“填地”，人们将被水冲成荒滩地的四周筑堤；然后，在大雨季节，把带着河泥的水引来，在水流走后，沃泥也就留下了。过去被洪水冲过的地方逐渐成为土地，其中也包括希雅那省的那些土地。不久以后，他们付出的劳动得到报偿，土地都十分肥沃。

后来，爱尔莎山谷的利多菲侯爵土地上的一个普通农民，一个名叫塔斯泰费拉塔的能工巧匠，用类似的方法肥沃丘陵的土壤。他发明“山区填地法”，或填土术，这就是通过水流在陡坡上的活动，从比较高的山峰流下，肥沃的土壤也随水流冲下。有一天，荒地也将成为人们的用武之地。为了使这项工程获得成功，那就需要找出办法，用雨水分解布满丘陵的荒凉小丘，使带沃土的水流冲到需要肥沃的山丘，并使石灰质砂土与粘土以合适比例配合，最后使水流停住，沃土留下，在水流没有澄清以前，不让水流走。此外，设计者脑子里应该有消除隆起丘陵地块后的形状，就象雕塑家在一整块大理石上雕刻时，事先就有一个雕像；随着土地覆盖沃土，从平地到山顶应该协调地种植各种庄稼；这些处女地在作为对分制租地以前，应该种能种植的作物，使预支的费用不致浪费，使这个农业大工程得到的收益能与开支相抵。“山区填地法”的第一个发明者塔斯泰费拉塔大约在十年前因年老逝世了，但是，伟大的公民利多菲侯爵改进和补充了他的创造发明。在迈莱多，人们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到，在那些最陡的山坡上，在凝灰岩和粘土的山包上，每年都在新的方向挖沟渠，在下大雨时，这些沟渠带来的周围的土壤就象很厚的熔岩一样，象千百只臂膀不停地往里扔东西，水流在山丘旁的沟渠里蜿蜒曲折地流来流去，并被一道道的闸门切断，为的是象人的手那样让带来的沃土扔在两边，以便用来肥沃土地。然后，在沟渠两边狭窄的地里种上一排排葡萄，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工程，看到修造了一块块能养活人类的土地，它召唤一些新的劳力来从事有益的劳动。利多菲侯爵为了加速水利工程，敲开土块，挖蓄水池来蓄积引来的水流，他使用了有力的工具，即一些经过他改进的机械，这些机械并不谴责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而是召唤新的劳动力。这些机械创造了新农村，安排了新的居民。确实，一旦水流冲平了坡面上蜿蜒曲折的凝灰岩和粘土的山丘，由于得到沃土的肥力，驴食草就生长出来了，使土壤得到松动；种植在沟里的葡萄蔓藤充当堤堰，新的房子盖起来了，新的家庭搬来了，在新的土地上种植庄稼和水果，而利多菲侯爵却到新的荒地上继续他的工作了。因此，人口增长了，但是，这是与土地种植要求成恰当的比例的；农产品增多了，但是，这是与应该消费这些产品的农民的收入成恰当的比例的；食品贸易也接踵而来，但是不超过新的幸福家庭的需要量，在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里，新的移民点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但是，这是按照古老的精神组成的、为移民幸福安排的移民点。

长期以来，利多菲侯爵设法使托斯卡纳其它的农场主了解荒丘变良田的措施；虽然，“山区填地法”发明已有四十年了，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得到推广。确实，它要求广泛的、多种多样的实践知识，只有通过文字和绘图才能使人们了解。最后，在三年前，这位明智之士决定在迈莱多开办农业实验学校，他与出身于吉西雅尔迪尼家族的夫人不遗余力地从事农业教育，使

他们的技艺改造每一块丘陵。这个学校有 18 个年轻学员，他的 3 个儿子和搬运工、佃户的儿子坐在一起学习，利多菲侯爵本人教授能使土地增产的精确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他的儿子和农民一起，每天拿着锄头和铁铤劳动几个小时，侯爵夫人教他们绘画，其它老师负责教育。家庭每个成员都是友爱、仁慈，都是道德和宗教的崇高的榜样，对他们来说，宗教是守护神。

第七篇 论君主对爱尔兰农民的义务，以及使他们摆脱穷困的方法

在本书的第五篇里，我们根据英格利斯先生的材料，主要介绍爱尔兰的广大民众陷入的悲惨境地。他那次旅行的风景描写、有助于刻画爱尔兰人性格的见闻，以及有关各城市贸易和兴衰的统计表的研究，我们均没有引用。我们致力研究干苦力活儿的人，即担负城乡全部劳动的人的生活条件。我们正是从这位旅行者的话中，摘录了关于一种社会状况的描述，那种社会状况几乎既令人恐惧，又使人怜悯。我们可以描述爱尔兰完整的画面，并指出在这个不幸的国家里，把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割裂开的宗教仇恨有多深；天主教徒紧衣缩食交纳什一税，却用来维持他们视为异端的神职人员与宗教信仰，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痛苦；小佃农对有人来向他主人提出愿意多纳地租，从而把他从土地上赶走，并使他家濒于饿死，又感到多么恼火，多么疑惧重重；在完成这类驱逐，将佃农或一座茅屋的房客赶走的行动中，主人或他们雇佣的法官表现得多么凶残，他们为了换一家房客，将茅屋房顶捣毁的事真是屡见不鲜；而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多么凶猛地自卫，往往奋起杀掉夺了他们位置的那一家人。还有那些殊死搏斗，夤夜谋杀，纵火，劫持少女等种种暴虐场面，甚至在法庭上无视司法，为了使朋友获释或判处仇人而立伪誓；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最野蛮民族中绝无仅有的、在爱尔兰尤其令人惊奇的一种社会状况，更加完整地摆在读者的面前。这种社会状况在爱尔兰之所以令人惊奇，是因为它同那里无数的古堡、苑林、花园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民当中，豪富贵族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荣华，占有了所有的艺术珍品。不但看到今天有人受苦，而且有人享福，怎能不令人发指？他们不是好象酩于美酒，头戴花冠，在悬崖边上散步吗？对于等待他们的命运，我们还能够存幻想吗？他们自己还能存幻想吗？他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个民族暗暗痛恨他们，准备报仇的时刻来临，这个民族虽然隐忍，但是不时也放出愤怒的闪电。

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人们把地主的巨大收入，把地租称为名副其实的地租，而爱尔兰产业主从穷苦农民盘剥的这种高额地租，就是 rackrent，就是搜刮勒索来的地租，巧取豪夺来的地租，用压榨出来的地租。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称太生动，太有预言性了；实际上，rackrent 就是压榨的果实、压榨的种子。这种地租曾使爱尔兰农民遭受的，现在还每天使他们遭受的所有残酷折磨，谁能一一列举出来呢？爱尔兰贵族在加快步伐走向报应，当复仇的一天来临，威胁这些贵族的所有酷刑，谁能一一列举出来呢？可是，如果使 rack rent 制度无法实施，如果使整个农民阶级完全摆脱产业主的桎梏，民族会免遭多少苦难，多少罪孽，谁又能一一列举出来呢？

我们毫不犹豫地说，只有限定了产权，只有正面抨击英格兰产业主所热衷的原则，即人人应当随意支配“属于他的东西”，主人和奴隶双方都解脱才有可能实现。他们的原则是错误的：产权是法律特许的权力，即得到法律的保障，又应该受法律的约束。产权发明是为了全体人的最大利益，如果使全体人都陷入贫困，它就不能应用了。如果立法者使业主感到永久与独立支配产业，那就是一个好主意了。有了独立与永久支配产业的感觉，无疑大大促使业主产生维持与改进产业的意识，但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到了

万不得已的时候，立法者就出面干预，使这两种目的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如保障土地所有权，就是要保证农业最大限度的发展，使农业给全体人带来丰富的食粮。土地所有者无权这样讲：“我不愿意让人们靠我土地的产品生活；我不愿意让我的土地出产品。”他也没有权利这样讲：“我不愿意让生长在我的土地上的劳动者继续住在这里，我不愿意让贸易公路穿过我的土地，我也不愿意让人越过我的世界。”然而，一般来说，权力机构根本不出面干涉，以便制止这样一种滥用产权的行为；权力机构期望在土地所有者中，极少数人才会这样恣意妄为，无视自己的利益，它宁愿听任他们滥用权利，也不愿给公共安全造成混乱。不过，分管一个国家土地的四、五百名所有者，如果被野心或报复的念头迷住了眼睛，沆瀣一气，企图把整个民族赶出它的家园，使它的土地荒芜，封闭它的所有通衢，既禁止在那里经商，又禁止在那里办工业，立法者肯定要对他们说：“你们掌管土地是以契约为保证，你们违反了契约；你们之中有几个人将耕地改为苑林，辞退农民，封锁交通，本来应该使国家富裕，却使它穷困，我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是你们滥用了我的宽容，你们本来无权这样干，即使孤立地干也不行，我更不能允许联合起来这样干。”

我们上面假设的这种危害整体富裕的行为，除非用政治狂热才可能解释得通。只有一些小国人民，才会小心防范这类危害。其实，rack rents 制，压榨地租制，同样是滥用产权，对施行这种制度的民族同样有害，也同样与土地所有者本身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它的荒谬性却不是一目了然的，它施行之初，反能满足土地所有者的直接利益，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使他赢得高收入的名声，而这种收入比他实际应得的大得多；那些一心只顾本身利益的人，拚命从土地上夺走他们能向农夫攫取的一切产品，这样做既出于贪得无厌，又经过深思熟虑。

立法者调整耕种契约的条件，并为这种条件限制产权，在我们看来，这种作法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只要经验证明现行的契约对整个社会有害，土地所有者的私利根本不能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立法者的这种权利就应该执行。但是，在大不列颠王国中，仅仅确立这项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服土地所有者相信，他们主动来限制自己的特权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归根结底，制定法律的权力最终属于他们。但愿他们能想到，对他们来说，确保自己的安全还为时不晚！在爱尔兰，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富人，散居在数百万的穷人中间。特权阶级的每个人都可以计算出来，他面对500个非特权阶级的人；双方对立得很，以致富人对穷人说：“我们生存，你们就得死亡。”穷人则回答他说：“你们死亡，我们就能生存。”频繁的动乱，毁坏庄稼和产业，纵火，谋杀，这是深刻敌视的日常的迹象。不过，一般来讲，爱尔兰贵族素以勇敢著称，他们在恫吓威胁面前绝不肯退让，而是武装起来保卫他们自认为的权利；我们几次听到过他们讨战，喊出重新征服爱尔兰的口号，他们甚至胆大包天，常常挑战；直到目前为止，穷苦阶级并没有应战。富人指责穷人怯懦，声称只要放几枪，准能驱散任何在爱尔兰聚众闹事的人，他们恐怕错打了算盘：对待等级与社会地位，爱尔兰全体民众仍抱着不可思议的崇敬态度，但是，他们也具备贵族今天在其两三个成员守卫古堡，抵挡数百人攻击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勇猛，激愤，以及无论杀人还是受死，总是坦然面对死亡；然而，一当贵族的鲜血开始流淌，将导致这个阶级的灭亡。直到今天，爱尔兰农民只向什一税征税员、司法官吏、

领主的仆从进行报复，尤其向与他竞争的农民进行报复。当贵族在窗口露头开枪，农民并不向他反击，他因此才得以保全性命。然而，对等级与名望的崇敬正在锐减；等级之间的仇恨日益强烈；不讲正义的情绪深入了所有人的心，奉公守法的思想不复存在，而且，在罪恶的道路上，宗教再也起不了遏制作用，或者宗教狂们自己通过曲解教义，便可以心安理得了。诚然，农民没有武装，但是，他们拿起嫩槲，就能很快把他们敌人的武器夺过来。他们一旦用武力攻占一座古堡，将住在古堡里的人全部杀光，所有其他的古堡不久就要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样一来，爱尔兰就要毁掉，因为愤怒的人民能够破坏一切，却不能重建任何东西。

这种对等级的崇敬，今天成为爱尔兰贵族的唯一保障，它阻止农民使用同样的武器同他的领主较量，这是完全不同的世情的残迹，而那种世情曾保证领主享有权力和荣誉，同时也保障了农民生活富足，安定，对未来抱有信心，但是农民今天失去了这些保障。领主破坏了土地所有者与自由租地保有者之间的那种父子式的、友爱的、顺从的古朴关系，他把支配人心的权力换成了支配英镑的权力；但是，他一旦丧失了友爱与长期习惯的保障，就不该指望能保住被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金钱。

爱尔兰同英格兰，同整个西欧一样，经历了废除奴隶制的革命，并代之以农奴制；在罗马帝国崩溃，野蛮人入侵与破坏之后，土地所有者在他们的奴隶中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不可能维持很久了。对于当时的那种变革，换句话说，就是对于那种改变土地所有者与农夫关系的私下契约，我们还不掌握任何具体情况。在那种没有文字的极其蒙昧的时期，邻国之间毫无交往，人们既没有考虑统一各省的立法，也没有打算将立法的详细情况传之后世。立法，就是习俗，主要是小城堡的习俗，而不是王国的习俗；但是，这种改变成文的宪章的习俗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人企图违背它。当时的习俗尽管千差万别，但总是对人有益的；正是在这种习俗的保护下，濒临灭绝的人民才又猛然得到巨大的发展，侵占了整个国土的森林和沼泽又重新让位于庄稼和居民点。当初，领主或者继承，或者夺取了荒原，他尽管自称是那些土地的所有者，但从中收不到一点果实。当他为了让人敬良，想到了一个妙主意，把许多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下的时候，他便分给能被吸引到身边来的每个农民一块土地，让农民在那里建造茅舍，耕种林间空地，在欧石南树丛生地上放牧，让农民终于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果生活。他给农民的土地是荒漠，不出产任何东西，因此，他也只要求农民给他服役。此外，他要求农民每年交纳一点东西，作为农民对他感激和敬意的表示，有时是一粒胡椒，有时是一枚钱币，有时是一点小麦，有时是一头牲畜，而更经常的也许是一定天数的劳动。不管怎么说，租金与土地的价值是完全不能成比例的：因此，农夫一家的生活非常富足。不过，从表面上看，农民的生活非常简陋，几乎是原始的；他的全部服装、全部家具、全部工具，都是由他和家庭成员制作的，但是，造房和取暖所需的木材草料，他可以随意采刈，他的餐桌上从来不缺少面包和肉食，也不缺啤酒、蜂蜜水，或者他自己酿制的其他饮料。在领主看来，人，才是他土地的真正收入，人为他打仗，对他唯命是从，对他永远效忠。除了他的领主，这个人承认其他的主人，其他的法官，其他的立法者，其他的统帅，其他的保护人。

同一切无限的权力一样，领主的权力运用起来经常是随心所欲的，有时是残忍无道的；他的见解有时极不公正，他的情欲也毫无节制：他的农奴的女儿如果有姿色，能逃脱他的肉欲的运气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违抗他的意志，冒犯他，有时会遭到惨绝人寰的惩罚。然而，同所有其他领主一样，他所感到的需要，就是要他的农奴对他爱戴，同他合作，他们的赤诚忠心，才是他的力量与骄傲。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已成为天生高贵的人；他们在顺从中，还掺杂对领主的崇拜成分。在中世纪，小民对老爷的崇敬、爱戴和信赖，都是在什么情势中产生的，我们全然不了解。农民对领主的忠诚程度，实在象公民只应该忠于祖国一样：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没有一方要压倒另一方的丝毫愿望。领主的情欲和胡作非为，可能会突然伤害并毁掉农民；但是，他的情欲很少发作，而且为时很短，只有贪财图利才是持久的。如今，这种贪财图利成为社会的巨大推动力，不过，它也就几乎不能归属于任何契约了。

在爱尔兰，纯粹的封建性社会组织消亡不久，人们还记忆犹新。爱尔兰的农业人口，足够它领土的需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过剩。他们的土地耕作法缺乏科学，很不完善，不过，也使土地生产出足量的成果，能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也能让领主在由他的农奴轮流耕种庄园土地所获的产品中，得到充足的东西维持中世纪的那种简陋的好客局面。根据法律，根据他拥有的法定产权，这位领主是他整个庄园土地的唯一所有人，但是，按照庄园的习俗，这块土地的大部分租佃给了农民，只收一点名义上的地租。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的产品明确看成是属于他的，但是，产品就是农民，就是永远效忠于他的人，他们除了领主的意志，根本不知道还有更高的法律，只要领主一声号令，他们准备践踏任何社会秩序。在亨利二世统治之初（1172），英格兰人就征服了爱尔兰，但是从来没有达到真正征服这个国家，因为农民从来没有脱离领主，或者说，除了他们的领主，他不承认别的主人，他们还遵从领主的号令，从来没有停止过激烈抵制来自英格兰的法令。这些在爱尔兰国土的每个角落天天发生的斗争，是英格兰人血腥法律的起因，用以对付这个国家的土著的野蛮人，the wild Irishmen，这些斗争也是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仇视的起因，这种仇视到了改革时期，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

通过改革，才终于猛烈地打乱了这种社会现状；爱尔兰人反对改革，英格兰人要用武力强加给他们，因而导致爱尔兰的大叛乱，以及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就这样，爱尔兰领主的大部分土地被没收，分配给新教徒的英格兰人掌管。而且，不仅仅是领主的庄田被剥夺，转到新的土地所有者的手中，他的农奴租佃的全部土地也必须遵从新章程。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并且根据法定的全部产权，这些土地应当属于领主；然而，根据庄园的习俗，土地实际上属于农民，他们只需交纳一份名义上的租金：这种习俗毫不足虑；农民对一个敌对的、被剥夺产业的家庭的愛戴，不过是他们反对变革的一种借口；中央政权企望割断领主与农民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建立了国中之国。英格兰人只不过打算把他们新农奴的徭役、忠诚和服从，改变成为现金地租。他们向情绪对立的农民的要求，根本不是愛戴与勇敢，他们根本不可能抱这种

英语，意为野蛮的爱尔兰人。——译者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曾镇压过爱尔兰的民族起义。——译者

期望，而是要求压榨的地租（rack rents），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叛的领主的产权，而且全体农民的产权也被剥夺了。所以说，现在的土地所有者的产权是虚假的，土地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他们的农民。因此应当看到，爱尔兰农民以多么虔诚的眷恋之情，怀念国家过去的割据局面，怀念过去的土地所有者、丧失地位的天主教贵族；还应当看到，爱尔兰农民知道或者以为知道得多么清楚，真正属于他们每个人的遗产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随时准备谋反，以便加速每个人恢复权利的时刻来临。英格利斯先生暗示了这种普遍的情绪（第2卷，第2章第19页）；但是，在一位爱尔兰新教徒大臣的著作中，陈述这种情绪的调子要激烈得多；由于一种离奇的组合，人们发现最狂热的崇拜，同最敏锐的洞察力、最感人的戏剧才能，都在那位大臣的身上体现出来。（Irish mothers and sons； Irish-men and Irishwomen。）

克伦威尔施行的改革，仅仅始于一百八十年前；况且，那仅仅是开端。新的土地所有者既不能让一批新居民突然在爱尔兰降生，也不能突然把他们迁移到那里去。他们需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就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要求耕种的农民。这些农民为数不多，他们的习惯已经形成，除了他们同从前的领主所订的契约，他们不了解别的契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交纳一份 quit rent，一份同土地的产品根本不成比例的租金。对于他们的新主人，他们虽然没有保留他们对从前主人的那种爱戴，却保留了他们对从前主人的那种敬畏。不过，他们基本上赞赏他们本来完全有权否认的情况，即他们仅仅是 tenants at will，是取决于主人意志的佃农，主人可以随意辞退他们，将他们小小的产业交给一个愿意多出地租的新来的农民。

这样一来，农民的状况便丧失了远古传统习俗的依托，变得不稳固，并且从此不断地恶化。由于引种马铃薯所必然带来的不幸后果，农民的破产加速了，因为马铃薯比小麦产量高得多，价钱便宜得多，正好供给穷人食用，而面包却成了穷苦工人不能奢望的生活多余品；由于天主教神职人员不得不靠谢礼生活，对农民进行诈取，也加速了农民的破产。现在，婚丧嫁娶，添人进口，是教士的主要收入；他的教区的所有年轻人都结婚，同他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在这方面施展了他的全部影响，也许他对此并没有意识到。起码有一点肯定无疑，人们再也看不到在任何国家象在爱尔兰那样早婚了。爱尔兰农民保存下来的半原始的习惯，同样也加速了穷人的破产。他们既不讲究衣着住房的奢侈，也不讲究漂亮，甚至连清洁都不讲究。他们只要能生存就行，在生活中千方百计地节俭；然而，他们从生活费用中每节省一文，他们的工资便紧接着减少一文。这样，他们渐渐沦落到人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在一百八十年间，据信爱尔兰人口起码增长了3倍；然而，人口超过了工业的需要，还是今天的现象，完全是近年的事；现在可以看到他们饿红了眼，争抢着找活干，有些人愿意献出他们的整个时间、全副精力、全部才干，仅仅要求能象猪一样地勉强活着。

英文，意为“爱尔兰的母亲与儿子；爱尔兰男人与爱尔兰女人”。——译者

英文，意为豁免地租。——译者

英文，意为可随时令其退租的租赁者。——译者

人口的迅速增长，几乎总是穷困的征兆，而不是繁荣的征兆：这表明无产者不会计算他的收入或者他家庭的收入，只求粗茶淡饭，填饱肚子就行，对将来不抱期望，或者不去担心。这种愚昧的结果，使爱尔兰

据说，爱尔兰随着人口增长，它的财富和繁荣的程度也增加了，证据就是这个岛国贸易使用的船只数目不断地增加。它的贸易几乎是单一出口食品；正当爱尔兰人民濒于饿死的时候，却见每年从爱尔兰各港口运出越来越多的小麦、各种谷物、咸猪肉和黄油。

仅就出口小麦一项来说：

利默里克的小麦出口量，1822 年为 102,258 桶，1833 年为 218,915 桶。（英格利斯：第 1 卷，第 295 页。）

高尔韦的小麦出口量，1834 年比十五年前增加了两倍。（同上，第 2 卷，第 32 页。）

斯莱戈的小麦出口量在最近三年中翻了两番。（同上，第 2 卷，第 123 页。）

伦敦德里的出口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同上，第 2 卷，第 200 页。）

贝尔法斯特出口量的增长扩展到所有的商品。（同上，第 2 卷，第 253 页。）

沃特福德在最近九年中出口额翻了一番。（同上，第 1 卷，第 61 页。）

科克：唯独咸猪肉的出口量增加了。（同上，第 1 卷，第 189 页。）

但是，仅仅以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来显示的繁荣，是一种非常虚假的繁荣。每年，人们可以用爱尔兰食品装满更多的船只，可是，爱尔兰人民更难吃到他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小麦，乃至燕麦做的面包，更难吃到他们制作的黄油，他们养的猪，而他们养的猪同他们家吃的是一样食物，有些东西宁肯给猪吃，也舍不得给孩子吃。只有当爱尔兰的消费同它的生产一样，都得到相应的增长，只有当它的农业能供给孩子们吃饱饭，它的工厂能让孩子们穿暖衣服，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把残羹剩饭留给国内，到那时爱尔兰才是真正的繁荣。

人民住的是茅屋草棚，睡的是草铺，穿的是从英格兰运来的旧衣裳，吃的是马铃薯，这样的人民对各行各业、工厂、农业都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他们的穷困阻止了旨在为他们服务的整个工业的发展，同时对他们本身是一种痛苦，对他们所包围的富人也是一种时刻存在的危险；他们的穷困既是不正义的后果，也是敲骨吸髓的后果，这应当由立法者出来纠正。毫无疑问，若想恢复农民的权利，我们绝不是要求为他们重设他们曾用剑效力的封建小公国，而是要求把他们父辈在生活中享受过的富裕、丰盛和安全还给他们，并且为达到此目的，我们要求保护他们，使他们避免相互竞争，还要求保证他们作为耕作费所应得的那部分收成，永远不被人剥夺。

为了使他们摆脱现在的悲惨处境，防止他们因为走投无路可能给整个王国造成可怕的灾难，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必须把爱尔兰从它的过剩人口中解救出来，或者通过移民，或者通过开垦荒凉的县份的方法来实现；二是必须象一切繁荣国家所施行的那样，把土地的产权交给留在那里的农业人口。应当向他们展示产权永久不变的前景，以保证他们耐心和坚持不懈地改良土地，并使之增产的成果，从今以后能使他们本身受益，而不是象今天这样，只能使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爱尔兰现在人口不仅大大超过了它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它的人口还

人口激增，这在人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一家英国报纸（《观察家报》1836 年 8 月 7 日号）上看到在爱尔兰 3 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无产者全部，或者几乎全部信奉天主教。在最近十二年中，移民补贴费几乎全发给穷苦的新教徒。因此，这两部分居民背道而驰。

在以最惊人的速度增长。爱尔兰人由于生活困苦，除了性欲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享乐；他们根本不算计，也根本不瞻念将来；他们无论男女，几乎都不满 20 岁就结婚了。据信，这个岛上的人口每年以 30 万人递增。因此，采取任何局部的措施，仅仅来应付每年增长的 30 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不管拿出多大款数，也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维持现状而已：必须大规模地同时行动起来。

为使爱尔兰摆脱它的过剩人口，移民与开垦内地就要双管齐下；移民见效比较慢，暂时把一部分劳动力用于垦荒，就可以缓冲一步。英国拥有辽阔的地区可以殖民；仅仅它在加拿大的属地，就不仅能接收 3 个王国的过剩人口，而且能接收它们的全部人口；再说，爱尔兰的殖民到了那里，只能促进那些辽阔地区的繁荣，并使那些地区同宗主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从爱尔兰到圣劳伦斯河以北的地区，距离不算太远；那里河流密布，通过内河航运，就能把移民送至最偏僻的地方，比到任何别的殖民地的花费都小。他们越是往北去，就会发现空气越新鲜，未开垦的土地越多。哈得孙湾周围的广阔地区，同芬兰湾周围地区的气候相同，认为那里不会有一天也象芬兰湾地区那样，移满居民，垦殖起土地，是毫无道理的。切不可小看如此广阔的出路；爱尔兰人过惯了艰难困苦的生活，英格兰殖民可能因穷困忧烦致死的一些地方，他们可以去移民。在那整个地区，无论在哪儿选个地点，只要给爱尔兰农民 10 英亩免租地，他就能造起一座比他离开的旧居好的房子，开头就能收获马铃薯，养猪，这些全归他自己，而且不久，他就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过上他今天不敢想的生活。

然而不要忘记，大量移民需要巨额贷款。不是将移民运送到魁北克，而是必须运送到要他们定居的地方。那个爱尔兰移民离开家的时候，身上一无所有，必须给他准备一小份东西，不管东西多么有限，总得包括衣服、劳动工具、家庭用具和种子；最后，必须及时把他送至产权交给他的土地上，让他开荒下种，还必须供给他食物，一直到他下一次的收获。这些最初的贷款，估计每个家庭不大可能低于 50 或 60 英镑。当然，一旦提供了贷款，就可以认为移民的全家生活有了保障，而祖国也就把这一家人变成了真正的公民。

近来的移民与殖民，根本不是按照这种办法进行的；人们首先要把更先进的殖民地组织引进新的地区，而其实，那种组织也许根本不适合殖民地本身，尤其是根本不利于最初的发展。人们一开始就要大量投资，建立大规模的农场，并且指望商业部门收购产品，远销别的国家：他们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资本家享受惯了，在殖民地则找不到那些享受的东西；他们越是进行新的投机，越是要迅速大量地回收，而这在农业上是根本办不到的。他们本想供应市场，却很快壅塞了市场；他们对殖民地的繁荣毫无贡献，殖民地是靠增加消费，而不是靠增加出口才能繁荣起来；他们不久便厌倦和离开了，他们的工程也就弃置不办了。资本家如果联合组成公司，那就更糟了；那样的话，领导班子组织起来，肥缺派给他们主要的代理人之后，他们就一心想抽走他们的资本，卖掉他们的股份，想从受骗者的轻信中渔利，而不是从发展垦殖中获利。

新生的民族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才繁荣起来的：创业者们考虑的是他们本身，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自己的消费，而不是贸易。用不着他们到市场上去碰运气，开发一个自然区有重重阻力，再加上节气反复无常，要战胜

这些困难就够他们施展的了。他们要求土地出产的，恰好是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于是他们生存下来；他们的工业每发展一步，不是向他们提供出口商品，而是向他们提供新的享受、新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限制享受，只享用他们的双手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绝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市场，绝不要考虑贸易，但必须使他们种植的小麦，生产的全部食品，始终同他们不断增长的家庭人口的消费量平衡。他们必须自己建造住房，自己织布做衣服，自己制造劳动工具。如果事后有人问我们，一个殖民地只生产它所消费的东西，既不出口任何产品，也不购买任何产品，那它还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将回答说，它生养了幸福的人，就是完成了它的使命。希腊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建立的所有殖民地，起初全是如此，古代所有的小民族，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然而，现代的殖民地，是在唯利是图的思想指导下，出于如何迅速收回资本的考虑设想的，因此，几乎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只有当资本家停止在那些地方投机了，它们才开始繁荣起来，比如加拿大和新英格兰就是这种情况。

在文明程度发达的情况下，向农业大量投资，农产品当然能迅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速度往往与市场的需求不成比例；不过，一般来说，用于土地的资本，应该永远地投在土地上，从土地抽出资本而使土地不受损失是永远办不到的；因此，这种投资根本不适于投机家。一个人只有把他的全部资本和劳动投进去，为他和全家人建立永久的收益，才能实现一块地产的真正改良；他根本不希望立即收回成本，而是为了他和全家人高瞻远瞩；他栽植百年成材的树木，豢养牲畜，改良品种，为的是让他的孩子将来受益；他为排涝，或为灌溉搞水利工程，子孙后代才能收到成果。办农业，必须始终立足于长久的观点，这就是农业区别于其他工业的地方。

要殖民的地区不管幅员有多辽阔，不管吃苦耐劳的赤贫人民可望在那里得到多大幸福，也不应该期望只依靠移民，就能减轻爱尔兰的苦难，情况远非如此。当人们拿这个岛屿的人口同它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或者同它能提供他们的工资比较，它的人口也许有三分之一过剩，必须给 200 多万人寻找生活的出路。只要计算一下就会大惊失色，若想把他们安置到一个新的地区，需要有多少艘船只运载他们，需要有多少食品店向他们供应啊。而且，还应该想到，类似这样的一项事业，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发生混乱，毫无秩序，就越容易有人混水摸鱼盗用公款；移殖人数越大，万一碰到意想不到的阻碍，他们的悲惨境地就越是不堪设想。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关心照顾这一大批移民，因为，一个饱受苦难的种族将来的最大幸福和安定，正是要通过他们来得到保障。但是，永远也不要期望通过往外移民，就能够减轻在爱尔兰忍饥挨饿的人的痛苦。

在爱尔兰的腹地，幸亏还有一片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发利用，这立时就需要一大批劳动力，在几年当中，全部过剩人口就可以有活干。那些未开垦的土地面积最大的是泥沼地，即所谓 bogs。那些泥沼地面积极大，有的简直占整个省份，可不是沼泽地，而是无底的泥潭。泥沼地表层覆盖深褐色草丛，间或有一块块晒干了的泥炭。实际上，那些泥沼地也都逐渐演变成泥炭沼。行人或马匹不慎走进去，就会陷下去，很快被吞没，象沉到流沙里一样。在黑泥中有时就好象发了酵：只见黑泥膨胀升高，如同熔岩似的向周围漫溢。那些泥沼地中最大最著名的是阿伦泥沼地，它覆盖爱尔兰中部的大部分地

区，仅仅那一片泥沼地就有数百万英亩。（关于阿伦泥沼地，请看英格利斯著作，第1卷，第105页。关于乔伊斯地区的几片泥沼地，请看同一著作，第2卷，第44页。关于肯纳马拉的泥沼地，请看同一著作，第2卷，第55页与64页，等等。）

众所周知，那些泥沼地不管现在有多荒芜贫瘠，不仅能够开发种植，而且还能改造成高产田。改造泥沼地主要使用石灰，也可以用各种海产废渣，具体程序不属于这篇文章论述范围；我们只要了解下列情况就够了：改造泥沼地的方法，在全爱尔兰都知道，所需的物质到处都有，剩下就是一个招工问题，这正是那些劳动力求之不得的，总之，使泥沼地干涸，不但永远适于耕种，而且有益于人的健康，每英亩花费合计要7英镑，设使每户达到10英亩地产，造价总和就是70英镑；出让每份地产，如果征收5英镑的定额地租，或者每英亩征收10先令，算起来，不仅可以补偿资金的利息，而且还能补偿管理费和利润。尽管如此，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上，新的所有者会过上小康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还会逐年改善，国家也因此扩充了一个新的省份，也许有犯万幸福的农户居住在那里。

无论是向加拿大移民和殖民的计划，还是改造泥沼地的计划，都需要一笔巨额资金，其款额不亚于另一笔资金，就是英国为了将它属民的另一个阶级，即殖民地的黑人，将他们从残酷的压迫中解救出来所耗费掉的资金，而那些黑人的境遇，并不见得比爱尔兰人苦。当然，用在最穷苦人身上的资金，可以认为有一部分是积存起来，而不是用掉了。我们曾假设爱尔兰泥沼地改造成良田之后，将全部地产出让，每英亩征收10先令的定额地租，然而，向被运送到加拿大的移民征收任何地租，既不公正，也是不慎重的，尽管他们耗费祖国的资金并不小；实际上，他们的工业可能够他们自己的生活需要，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们如何能从工业中赚钱。

把泥沼地改造成良田所需的贷款，应该得到英格兰的保证，这样一项贷款，始终是爱尔兰要求大不列颠慷慨做出的一种巨大的牺牲。如果王国政府同意贷款，它就有权对爱尔兰领主说：“你们由于贪得无厌和缺乏远见，把依附于你们，并应该受到你们保护的人，推入苦难的境地，这是法污我们的法律，而且，你们若是强行维持这种局面，就不能不犯罪。你们把王国四分之一多的人口推向穷困，就使整个大不列颠王国面临危险，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结果只能把他们逼反。你们把产权法变得令人憎恶，便动摇了人类社会本身的基础。你们同我们一道陷入了危机，我们同意把你们从危机中拉出来，但是，我们自然不能承认你们的权利了，我们不能让你们把我们再次拖进危机。地产的首要权利，就是耕者依靠他的劳动果实生活的权利，你们违反了这项权利；从今以后，我们将无所畏惧，毫不留情地干预进来，以便完全保障这项权利。爱尔兰的土壤肥沃，植物茂盛，我们将要求爱尔兰农民生活在这里，要同居住在普鲁士沙土地的农民，或者在俄国严寒气候中的农民生活得一样好，要求他们在住房、穿衣、吃饭或者取暖方面，水平绝不能低，还要求让他们享有同样的休息，将来也有同样的安全保障。只有在保证他们应得的份额之后，我们才承认你们其余的权利，而且，我们也注意保障你们的这些权利。”

为了农民的幸福和国家的昌盛，究竟应该向他们做出什么必要的保证呢？那就是当全体人民都承认土地产权时他们为谋生的技艺所争取的保证。全体人民感到只有考虑子孙万代的农业，才是好的农业，才是土壤不断改良

的农业。他们希望使土地结出果实的人，应当把土地看成永远是属于他的。从全体的利益着想，必须让耕者清楚地知道，他可以不遗余力地治理他的土地，他对土壤的一切改良，不管多久的将来才能见到成效，对他或者他的子孙后代来讲，绝不是徒劳无益的。土地的真正改良，奠定一个国家昌盛基础的土地改良，全都是百年大计。埃及在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前实现的土壤改良，现在依然受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好几个县农业丰产，完全是依赖于灌溉，而兴建那些水利工程的日期已经湮灭了；意大利所有的大小河堤，荷兰围海造田的大坝，也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巴伦西亚完善的农业，直到今天还是得力于阿拉伯人；爱尔兰的泥沼地，多亏一个贫苦农民的个人技艺，有好几小块已经变成良田，那些土地的稳固性能保持到世界末日。历史传下来的那些农业工程，包括堤坝排灌等设施，往往是公助兴建起来的，有时大资本家也兴办。然而，最有利于使土地面貌一新的逐渐细致的土壤改良，还是默默无闻的农民，怀着爱的感情，几乎是无私地通过顽强聪明的劳动，独自所进行的改良。是他发现一个水泉，把水引到远处；是他给一片沼泽地开凿一条排水沟；是他栽植百年成材的树木；是他驯养野兽；是他改良了果树品种，这是一项需要好几个世纪的事业；是他给每块土地找到收成好的作物、最适宜的种植法、保持最大地力的轮作。产权的意识，只此一件就把耕者与土地联结起来，它促使耕者研究并利用一切改良土地的办法，它使耕者为他的孩子和将来着想，感到劳动是甜美的，它曾是人的享乐的最大源泉，同时也是人类昌盛的最主要原因。

最令人憧憬的社会状态，就是广大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状态。不是那种提供最大的纯收入、最大的利润的社会状态，而是有最大的总收入、最大的就业机会，并给予较高劳动报酬的社会状态。就是能够维持更多的人幸福的社会状态，因为，生活幸福的人不增加，人口增长只能是一场灾难。也是能够最有效地制止人口无计划增长的社会状态。小土地所有者知道，他的家庭依靠他的小小的产业，可以过着体面的生活，他同伯爵或侯爵一样，并不打算让他的家庭降低地位；他也同他们一样，如果对他自己或者他的孩子来说，不能确保他家庭的体面地位，他是不打算早婚，或者让他所有的孩子完婚的。实际上，自耕农具备了贵族的品德、谨慎，以及对秩序与安定的喜爱，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财产微薄，却又防止他们象贵族那样染上恶习，追求醉生梦死的享乐。如果拿欧洲各国的自耕农的数量作一比较，就不仅会找到最广泛幸福的尺度，而且会找到人民拥护现秩序和政府中长久因素的尺度。

在大不列颠三个王国中的自耕农，比任何国家的都少。从本意来说，领主权只是一种政治权力，可是在英格兰，领主权却变成了产权，而在其他所有的国家，每过一代人，产权就与领主权进一步分离。没有土地便不成为领主，这句封建领主的格言，在法国已经被许多事实揭穿，在英格兰却变成了法律。在法国，平民自由租地的保有者曾继续服许多繁重的劳役，但是，他们的土地永久保有权得到了承认；在英格兰，繁重或屈辱的劳役早已废除；然而，自由租地的保有者在同意和他的主人达成新的条件时，答应向主人交钱，不再服劳役，这是他亲自谈妥的交易。他从农奴变成了佃农，并以为这样捞到了许多好处，他也许真正地得到了实惠，因为在一个时期内，英格兰的大农场主形成了一个非常有钱，既聪明又可敬的阶层。可是，佃农丧失了土地的永久保有权，什么也不能补偿这种损失。不过，在上一次战争期间，食品价格暴涨，这激起了英格兰农场主投机的狂热，他们感到是投机的好机

会；后来转入和平时期，食品物价又暴跌，几乎使他们全部破产。英格兰使共同从事种植的三个阶级的人，产业主、农场主、短工的利益对立起来，本身就开始意识到它步入了歧途。在爱尔兰，这个同样制度的产物，也只有痛苦和压迫。对于这个不幸的国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尽可能使农民地位与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趋于一致，给农民开辟道路，以便让他们的每一点节省，都是给他们添的一个砖码，使他们确实变成土地所有者。

爱尔兰农民今天濒临饿死，着想购买和支付土地费用，资金当然差得很远；他们即使有能力购买，也切勿鼓动他们抛掉他们小小的资本，他们应该用来改进他们小小的产业。如果不用资金购买土地，也可以用永久地租来支付。自由租地的保有者，每年交纳固定不变的租金，并把地产传至子孙万代，同他的领主一样，也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签订为期十四年或二十一年租约的佃农，从他的利益考虑，到租约期满之时，不能让土地比他接手的时候好：对他来说，向土地投进所有较长时期生效的资金，不仅会分利无取，反而会被主人利用来对付他，结果只能使重新订约的条件更苛刻。英格利斯先生在爱尔兰注意到，佃农在二十一年期间，对土地进行了重要的改良，而到租约期满时却破了产，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第2卷，第7章，第113页）。永佃户则不然，他为了子孙后代，可以着眼于无限的未来。他对土地的感情，完全是所有者的那种怜爱，他不仅考虑每年能从土地收获多少果实，而且还要装点它，整理它，使它便于管理，他每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或休息时间，每往土地栽上一株树，根本不考虑是他还是他的孩子收获果实。他同领主的的关系永远确定下来，双方不会再发生争议，也不会再引起忌妒。他只把领主看成是他的保护人，他从领主的手接过来的土地，是联系他们双方的纽带，而不是纠纷的根源。

迫使爱尔兰领主把他们的土地永远佃给耕者，收取定额地租，这绝不是前所未闻的尝试，也绝没有超越立法者在许多别的国家行使的权力。恰恰相反，这是恢复所有兴办农业的人民的习惯，是效法各国文明的榜样。永佃租约，旨在鼓励植树，保证植树者的永久享受权的租约，正如它的名称 μ

所表现的，大约是从希腊人传给我们的。它是和罗马立法一同传给我们的，后来又染上了封建主义的色彩。租契、年租就是在法兰西、瑞士、萨瓦的各省里实行的这种产权的不同形式。在意大利，*livetti* 不是别的地租，也就是定额地租。托斯卡纳大公、皮埃尔-利奥波德就强令在他属地的所有宗教会门、所有的医院、所有的慈善基金会，把全部土地租出去，收取定额地租，定额地租以3%的利率随时可以赎回。这项强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广大的阶层诞生，就是 *contadini livellari* 或者说纳年租的土地所有者，并使他们高度兴旺起来；同时，这项措施也使所有的公共基金会恢复了秩序，防止贪污侵吞，使之免遭破产。

出让土地，收取定额地租，在爱尔兰并不是绝然没有的事情：英格利斯先生行至那个岛国最荒凉的地方，康诺特地区，在巴利纳斯洛城看到一片罕见的富裕景象，感到诧异。他写道：“巴利纳斯洛是一座洁净得出色的城市，旅行者看到第一眼就承认，它不是被弃置不管的城市，而是有一只手在它的

希腊文，意思是长时间的租借。——译者

意大利文，意为定额地租。——译者

意大利文，意为交纳定额地租的佃农。——译者

上空护佑……克兰卡梯勋爵是已利纳斯洛的领主，当地对土壤的各种改良，都得到他的鼓励。而且，在推动改良那地方的土壤方面，谁也没有克兰卡梯勋爵做得那么有效果，他把土地永远佃给所有建造了象样住房的人，收取定额地租……对出佃的土地，克兰卡梯勋爵始终有一个公正的估价，尽管由于竞争，很容易把他要求的地租抬高1倍，他绝不规定更高的租金。（英格利斯著作，第2卷，第2章，第16页和17页。）

不出康诺特省，再往前走就是喜气洋洋的繁荣城市克利夫登，那个城市是达尔西先生创建的，他没花一文钱，仅仅把土地出让给愿意建造的人，每英亩征收6先令的定额地租；这是土地的全部价值，但是，城市和港口建成，给地方的其他方面带来更高的收入（英格利斯著作，第2卷，第5章，第74页）。最后一个例子，北爱尔兰比爱尔兰其他地方突出，它之所以繁荣起来，部分原因在于把没收的土地交给了伦敦的一些公司，那些公司又把土地转让给农民，向他们征求定额地租（同上，第2卷，第12章，第220页）。在那个省，安特里姆郡是唯一能见到真正农民的地方。他们享受父辈技艺的成果，因为他们父辈就是靠交纳定额地租佃来的土地过活的。（同上，第2卷，第13章第243页。）

一个外国人，如果企图指出立法机构采取什么措施，把土地永久耕种权交给农业阶级，就可以使他们的命运安定下来，未免要被人耻笑为狂妄。对于最高权力机构在对立的利益之间必须进行的这种干预，以及这种干预应该达到的目的，我们在这里仅仅提出几点一般的看法。

为了使一国的农业发展起来，为了让人们把爱的感情和聪明才智倾注到所耕种的土地上，就必须使两个从事农业的阶级对土地享受永久权利：一方面是开明的官人，他们进行研究，改进，并且影响他们周围的人对发现与改良产生兴趣；另一方面是干粗活的人，即劳动者，他们更接近自然，而且一般来讲，都固守古代的习惯，他们发挥耐心与节俭的精神，利用富人取得的发现与改良，使之在革新中避免操之过急。这两个农民阶级对国家的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爱尔兰，由于贵族的巧取豪夺，第二个农民阶级已经被摧毁。如果急切改革，稍微失慎，再把第一个农民阶级毁掉，爱尔兰面临的厄运，就是穷人起来造富人反的那种局面，其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的。在这两个阶级中间，立法者应当竭力保持平衡；他应当鼓励大农场主亲自经营他们的土地。在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上，良田比比皆是，有钱的侨居者到处可见，如果从这两个角度看，爱尔兰的贵族未免太多了。这倒无妨：让爱尔兰贵族在他们的采邑上，自由地选择他们要栽培倚重的那些人，立法机构绝不要横加干涉。

然而，一种契约使土地失去主人的那种关心、聪明才智和喜爱，法律也绝不应该承认。法律应当对土地的主人说：“在您自己不能承担起主人责任的地方，为了社会的公益，就让自视为主人的人代替您好了。您把土地交给他们，并保证他们的永久耕种权。”

人类有一部分人沉沦在穷困和愚昧之中，而他们都是服从立法者的人，因此，把他们从卑下的地位中解救出来，是立法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使富人免遭一次暴动的灾难，使整个王国免遭一次内战的浩劫，也是立法者的责任。最后，他的责任还要使爱尔兰永远摆脱风靡全国的哄抬物价的现象，使爱尔兰永远摆脱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在那里，穷人为了找到一点事干，被迫接受非人的待遇，而富人由于贪得无厌，总想独吞全部劳动成果，这样

富人就面临丧失一切的危险。立法者不应该，也不能让整个农民阶级再长期面临双重可能性：既造成他们的领主的罪恶，又造成他们自己的罪恶。他不能允许仅仅因为一个利默里克勋爵，或者一个克利夫登勋爵不顾那里的居民有多么灵巧、朴实和善良，一味图利而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幸。当然，也有一些领主庄园，那里的主人受到人们的感激和爱戴。但是，即使在那些地方，法律也应该保证将来；好主人的后裔如何很难说，他们可能不慎重，可能破产，也可能造孽，好主人还可能没有后代，法律应当保护农民免遭这类情况造成的恶果。有许多领主很聪明，令人尊敬，但不肯以任何形式的租约把土地佃给农民；他们要使农民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他们。他们这样做，现今也许是一心为农民好，然而，谁能替他们的继承人担保呢？再说，他们的产业将来或许被债权人所占有，或许让别人买去，谁又能替那些债权人与买主担保呢？自耕农可以通过支付一笔资金，或者仅仅交纳一份定额地租，就有自主权了；吃他租子的人放荡也好，残暴也好，挥霍无度也好，跟他的关系就极小了。他不会因为那人去世而破产，也不会因为那人的代理人不公正而受盘剥。

我们确信现今出租土地，收取定额地租，是既保护爱尔兰的富人，也保护爱尔兰的穷人的唯一可行之道，我们同时也认为，土地租赁的价格，只能由当局来确定；因为要定的价格，必须比卖主要的和买主给的价格低，必须低得多。我们曾讲过，农民的权利，就是他做为一个人，要以他的劳动完全维持他的生存，只有土地产品的剩余，才是地租的合理金额。不过，爱尔兰农民已经陷入非常屈辱的地位，他们只要能得到家畜那样的饲料和待遇，就乐得出卖他们的劳动；他们之所以没有交纳更多一些，也只是因为有些主人慷慨，绝不肯接受农民向他们提出来的过高的地租，或者有的主人纯粹出于谨慎，不愿意签订一项他们知道不可能履行的契约。由此看来，还有一些比较公正或者比较明智的主人，并没有把他们的农民逼到行乞的地步，但是，没有一个主人让农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心灵手巧的人、大不列颠的庶民，是有权过这种生活的。因此，在计算地租的时候，不能以爱尔兰人现在这样的贫困生活为标准，来看维持这些不幸的人生存以外土地的纯收入可能是多少，而是应该看在保障劳动者必要的生活条件下，供养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生活之外，剩下来的收入是多少。他们必须象熟练的农民那样有房住，有衣穿，得到温饱，他们还必须能经常吃上肉，喝点酒。从土地的收获中去掉这些生活费用，所余部分才是唯一合理的地租，也就是永久不变的地租，地产将以这种价格易手。

正如我们多次讲过的，人们应当确定的目的，就是向土地提供自耕农，而不是提供雇用更加贫穷的短工干活的承包人。因此，一个家庭新继承来的土地面积，必须同这个家庭的劳动力相称，这个家长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必须有足够的土地从事各种劳动；因为，在小农家庭里，妻子和孩子们在父亲的监视和指导下，年纪很小就开始干活了。然而，短工的孩子就挣不到钱，孩子的母亲也不得不守在家里照看他们，而小农民在他父亲身边干活，对他来说既是一种学习，一种营生，也是一种乐趣。反之，如果让短工的孩子干点什么活，他们聚在一起，几乎总是相互学坏。在租佃土地的份额中，将爱尔兰所有人的妻子儿女排除掉，迫使他们无所事事，这是岛国穷困的最大的根源之一。租地面积的多少，还必须考虑到那个家庭如果会技术，能在一年四季中在土地上找到活干。实际上，扩大生产种类繁多的产品，这是自耕

农耕作制度的优越性之一；通过扩大产品种类，聪明的农民在比较有限的土地上，一年中每天都能找到适当的活干。实行大农场制则不然，农民想的不是他本人可能消费的产品，而是能够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以便赚了钱好交纳地租。对他来说，搞单一产品比搞多种产品更合适，他只出售谷物与家畜，此外没有其他东西；因此，他的土地全都同时播种，同时收获。在这农忙的两个月中，他以非常高的报酬雇用短工，可是，在一年的其他 10 个月中，他就抛弃他们不管，任凭他们闲散失业，沦为乞丐，这不是他的事情，而是国家的事情：这是爱尔兰贫困的第二大根源。雇用来播种与收割的人，有半数在一年的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无事可做（请看英格利斯著作，第 2 卷，第 16 章，第 299 页）。可是，一个聪明的农民，什么都由他自己来干，甚至他的工具都是自己做的，对于这样一个农民来说，即使他居住在比英国气候恶劣的瑞士或德意志，也绝不会有农闲季节。在英国，大农场表面上的产品是虚假的，因为，每个农场主在一年的 9 个月当中辞退数百名工人，根本没有把这些人的生活保障计算在内；诚然，他并没有负担他们其余 9 个月的生活费用，但是，或者通过征收赈济税，或者通过他们行乞，最终还是由社会来负担。在爱尔兰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每个自耕农自己干自己的活，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向邻居借几个工，但是他用实物来偿还；还要让他象农业问题作家一致主张的那样，在一年当中的每一个季节和每天，都竭力为自己找到有收益的活干。如果说，议会指派的委员到每个郡去是要确定每一等土地的地租，他们还应该作出估计，每户在不借助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能够耕种并且种好多少土地。从今以后，以定额地租租赁土地的农户，就将以这个尺度来规定能有多少土地。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要指出来。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按照我们的建议分配土地，并且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风俗，每户自耕农肯定非常重视他们的地位，绝不愿意让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降低，人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会很谨慎，能够避免早婚和家庭人口过多。我们确实也看到，在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所有国家，租田的数目几乎始终保持不变，租田的范围也变化极小。每户家长非常清楚，他如果分了租田，就会破坏耕作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使他一年中每天都有活干，同时也使他能够供给全家消费的所有物品。他仅仅让一个儿子结婚，两儿子只有在工业的行业里找到事干，有了收入，才可以结婚。军队、海运以及宗教部门会录用他其余的儿子。至于他女儿的婚姻，也是在他经过节俭，有了积蓄时才给予解决。他知道，如果有一大家子人口，会给他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在孩子出生的时候，而且要管孩子的一辈子；这对他倒是一种有益的警告。因此，真正从事农业的地方的人口，没有明显的增加，而且增长的速度不超过收入增加的速度。但是，一个国家人民的风俗是长期习惯与思考的结果，立法改变的时候，风俗不会随之改变。我们把爱尔兰现在贫穷的原因，归咎为一百八十年前土地所有制发生的变革；我们也指出，许多后果到今天才开始表现出来。同样，土地所有制的一场新的变革，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改变爱尔兰的风俗；尽管这场新的变革势在必行，我们却要缓和它的势头，使它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爱尔兰人非常穷困，根本不考虑将来，也根本不顾虑他会有多少孩子。他们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件家具，口袋里没有 1 埃居钱，可是不到 20 岁就结婚了；他

们出的租金过高，因此永远无力向产业主买下一间小茅屋和一块土地。

他和妻子儿女过着衣不遮体、上无片瓦的生活，可是他的孩子却每年不断地增加；他能吃上马铃薯，填饱肚子，就感到很满意了，眼光看不到更远。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爱尔兰人才能明白，这种穷困和缺乏远见的状态是可耻的，他们才能以正确的憎恶态度面对这种状态，他们才能感到如果不能保证妻子儿女有一个较好的生活，他们结婚就是不理智的，就是有罪过的。因此，必须用立法强有力地推动新风俗的形成；起码在一个时期内不准分租田，哪个佃户如果企图分租田，那就会有丧失租地的危险；必须设置种种障碍，防止轻率结婚与早婚；必须加强父亲和家庭委员会的权威，以便制止轻率结婚与早婚；必须给结婚规定期限，必须先发表结婚通告，再等待一段长时间才能结婚；最后，也许还应该要求夫妇二人做出保证，在国家储蓄银行或者教区储蓄所里，为将来出生的孩子存些钱。凡是与公共自由一致的办法，都应当用来克服爱尔兰人目前缺乏远见的状态，而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就是克服那些目光短浅的当地陈规陋习。瑞士农民的女儿出嫁时，如果不给她的丈夫带去她的床、胡桃木衣橱，以及她今后生活需要的全部服装的整套嫁妆，就会认为非常丢脸。而男方如果不穿上一身民兵的新制服，也绝不肯去教堂举行婚礼。为了遵循这种村庄礼仪的要求，就必须进行长期劳动，长期节俭，这比父母的苦口婆心劝告更能阻止或推迟轻率的婚姻。但愿各地方名流齐心协力，将这类风俗引入爱尔兰，或者加强已经存在的这类风俗。农民如果生活富足，对未来有信心，也就会产生自尊心；他们自己就会慎重地维护这种尊严，这样一来，蹂躏这个美丽国家的灾难就会终止。

第八篇 论奴隶制对人种产生的后果

我们曾讲过，而且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一点，一个民族的昌盛，不能根据在它的领土上积聚财富的数量来估价，只能根据财富在组成这个民族的人中间分配幸福的大小来估价。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的，就是在财富分配方面，保证所有的人都受益，尽管有些人比其他人受些优待。必须让全体人都能享受到财富所能提供的娱乐、身体与精神的发育；随着民族逐渐富裕，必须让全体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必须使全体人在生活中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对前途抱有更大的希望，同时对各自的欲望也有更大的克制力；必须让全体人能有更多的闲暇来发展智力，解除疲劳，休养身体；最后，还必须让全体人在享受逐渐增长的财富中，能发现相互友善的新理由，而不是激起更大的优视。

但是，随着民族财富的增长，也必须单独给最富有的人一些好处，并且只给他们，而其他人起码要等到这一措施有了成果才能享受到好处。在一个民族中，必须让一些富人能够集中精力，专门从事人类追求的最崇高的目的，必须使他们能够培育他们的智慧、想象力与情感，不为物质的利益分心；还必须让他们分散居住在国内，以便使全国各个地方都能得到他们的教育，使他们任理性、科学、艺术、道德与博爱等领域取得的专门成就，有益于全体人民。必须同时关怀贫富两个阶级的幸福，必须在他们中间维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以便最大限度地促进全体人民的幸福与进步，对于这些，我们永远不能掉以轻心。

只要阐明社会科学的这一伟大目的，就能使人感到奴隶制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公正，多么不人道。人类社会的创建，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如果为了这个社会的半数人利益，牺牲另一半人的利益，如果让一部分人享尽幸福，让另一部分人受尽痛苦，那就是抛弃了人类社会的首要原则。然而，人们一旦抽象地看待财富，而不是同参加分配财富的人数联系起来看待，就几乎会立刻导致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财富数量的增加，可以建筑在它本来应该使之幸福的那些人的穷困与痛苦上；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失去主见，思想陷入混乱，结果竟追求与自己愿望直接对立的目的。这样，人们确实再也不能把社会取得的财富，与损害社会而取得的财富区别开来，就会把人从大自然的收获，与人在人身上夺取的东西混为一谈；人们把在生产中所做的一切节省算成进步，即使这些节省是从同一个社会里的成员口中夺食也在所不惜。然而，如果有人计算一下，在所谓节省生产费用之前和之后的社会财富，就会发现它减少了，并没有增加；因为，这种节省的后果，恐怕不是增加了富人的财产，而是使穷人倾家荡产。节省给富人多带来一点净利，却更多地侵吞了在穷人之间分配的总收益：因此，它毁掉了财富本身，而财富学派的整个学说，正是旨在增加这种财富。

有人一旦把富人财产的增长，同国家财富的增长混淆起来，一旦认为富人可以通过节省劳动力或工资的办法来日益致富，他就已经在心里，或者起码在思想上牺牲掉了穷人，接下去无非就是选择什么办法，以便使穷人尽量少消费，尽量少占一点净利。办法有三个：其一，或者借用机械能力取代人工，或者只向自然索取使用少量人力就能出产的产品，使劳资双方的合作失去意义：于是，如同苏格兰某些地方的情形那样，工人成为多余的了，人们就尽量输出劳动力。其二，让他们在找工作中竞争，接受能够维持生命的最

低报酬：这是在爱尔兰实行的办法。其三，根本不由他们选择，他们只要还有一点气力，就用暴力和皮鞭逼他们干活：这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这些办法之所以能够发明出来，能够继续实行，无一不是因为无视社会权利的首要基础、财富的首要用处、全体人民的幸福。人们不是设法让大家享受，而是一心为几个人打算，其实为了全体的利益，那几个人已经受到优于其他人的待遇；人们允许他们夺取绝大多数人少得可怜的口粮来发财，然而，他们反过来吃他们贪婪的苦果，因为，上苍自有巧妙的安排：富人需要穷人，至少同穷人需要富人一样。一个人以为办工业可以脱离开人，却不得不看到，他不能脱离开人来消费他工业的产品。一个人把给他干活的穷人推到饿死的边缘，不给工人留下度日钱，结果他既没有足够的钱财周济工人，也无能力防御饥饿激起的工人的仇恨。一个人以为可以随意剥夺工人的智慧和意志，却在自己的身边养起一头野兽，而且，这头野兽的劳动已经得不偿失，它渴望报仇的情绪一直令人战栗。在前几篇中，我们力图阐明一些制度的必然后果，那些制度让穷人在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同富人较量，根本不给予他们任何保障去对付过于强大的对手。我们也认为说明奴隶制的后果是重要的，奴隶制更加专横，更加野蛮，后果更加悲惨，而它恰恰说明了同一个原则，即“国家通过多生产，或者少消费的办法来富裕，通过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劳动力的办法来富裕，通过尽量压低工资，尽量逼劳动者多出产品的办法来富裕”；也就是说，政府所应考虑增加的，不是人以及人的幸福，而是财富，这是错误的学说；财富不是全体人的利益，而是少数人实现的纯利润，这是这种学说更加错误的后果。

为了阐明奴隶制给主人，给奴隶，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后果，我们认为在提出把社会从这种灾难解救出来的办法之前，应当在这里分析一下孔德先生关于《家庭奴隶制》的那部杰作。实际上，在论述奴隶制及其灾难性后果方面，我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全面、最有学术价值、最富于哲理的著作。当然，人类不止启迪一个哲学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指控如此凌辱人类的制度。但是直到今天，奴隶主认为可以鄙视这些著作，甚至可以赞赏它而不用担心后果，照奴隶主的说法，这是因为作者不了解事实，因为最美妙的理论一旦付诸实施，也就行不通了。可是，孔德先生的这部书则不然，它向我们介绍的正是事实，正是各个时期、地球各个地区的事实，而且，事实介绍得非常恰当、准确而真实，在材料一致和人们应当得出的结论方面没有一点凝竅。

对法国来说，奴隶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甚至在记忆中也逐渐淡薄了，因此，许多人看待一部关于奴隶制的悲惨后果的论著，同看待一部关于异教谬误的论著所持的眼光完全一样。他们顶多会认为，这部著作仅仅针对远离美洲大陆的几个岛上的制度，针对他们毫无好感的一个种族的命运。他们不胜其烦地听人说，基督教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所以没有注意到，直到1660年，根据第24章第12条法令，英国才废除奴隶制（查理二世时期）；在其他西欧国家，直到18世纪才废除奴隶制，而在东欧各国，奴隶制始终存在。废除奴隶制的事业非但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就在我们的眼前，曾进行过并且现在依然在进行着一种演变，突然使一些土地辽阔的国家跻身于强盛文明国

指王国朝廷律师，孔德先生所著《立法论》的第5部书。1827年巴黎出版。其中第4卷就是论述这个问题，共计536页。

家之列，可是在那些国家里，奴隶制已由法律确定下来；在世界均势方西，这种演变可以确保由占有别人的人统治的国家，对禁止这种占有的国家拥有最可怕的绝对优势。

在俄国与波兰，人民群众是奴隶；在将近一半的奥地利属国中，人民群众也是奴隶；俄国和奥地利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在欧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和荷兰在它们分布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中，仍然维持奴隶制；英国则废除奴隶制不久；西班牙与葡萄牙在它们余下的殖民地中，也维持奴隶制度。在美国的 24 个州中，有 10 个州是奴隶制，而这 10 个州是美国土地最广阔、地理位置最好的州。在整个英属印度，在英国统治下的整个印度，情况虽然不尽相同，奴隶制却是合法的。最后，在以前属于西班牙的美洲的几乎所有大共和国，以及在巴西帝国，奴隶制也是合法的；这些新国家为了将来废除奴隶制，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守旧的人、偏激的民众不断攻击，或者逃避执行这些措施。请看，组成今天基督教与文明世界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国家！请看，统治其他国家的都是一些什么国家！当统治权依然掌握在这样多的奴隶主手中的时候，讲废除奴隶制的事业已经胜利这种话的时刻，当然还没有来临：恰恰相反，我们更应该收集事实，加以研究，并予以公布，以便改变那些以新的方式继续这样一种可憎制度的民族。

我们将在尽可能短的篇幅里，尽量介绍孔德先生的一系列思想；而且，在介绍他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基本上保留他本人的表达方式，即使为了更加简明，用不着加注或者摘引的时候，我们也将这样做。奴隶制虽然在几个文明国家保存下来，但是它的起源，显然是野蛮民族取得胜利时滥用的权利。征服者没有把战败者屠杀掉，而是保全他们的性命，让他们为自己干活，认为这样做是人道的，尤其认为这种作法很合算。正如他作品的题目表明的那样，孔德先生致力研究征服者的这种打算有什么后果，奴隶制对主人和奴隶的身体、智力与精神各机能有什么影响。他首先承认，没有因为实行奴隶制，奴隶主的身体器官就衰退了。他们能保持身体健壮，恐怕是因为常年吃得好，有足够的活动，还能够选择人来传种接代。由此看来，无论是在野蛮社会里，还是在文明社会里，奴隶主可以享受一切利益。他们的伙食始终得到保证。生活习惯、娱乐，乃至政治，都起码能使他们继续活动，使他们的身体能适应狩猎和战争。最后一点，他们除非受民族的一种成见的约束，否则就可以挑选最漂亮的女奴隶为妾，结果生下来的孩子比父亲长得好看。土耳其人与波斯人就是这种做法，他们得以不断地改良他们的人种。

但是，奴隶制必然要损害奴隶的肌体。因为，他们吃穿住的条件，完全取决于主人的意志。只要是能够增加他们的体力。智慧与勇气的活动，都严禁他们去做，因为这对奴隶中有危险。奴隶主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让他们做一些为数有限的机械操作，也仅仅能使他们的个别器官得到发育。即使如此，发育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被迫搞一种过量的操作，不但不会使他们更强壮，反而会使他们更衰弱。除了上述几点，再加上只能把最丑的女人配给男奴隶，其余的女人都成了主人的婢妾，显而易见，人类受奴役的那部分为什么必然日益退化。

然而，身体组织的发育，主要看是否能给人掌握事物的手段，并使事物满足人的需要：可是，无论对奴隶主还是对奴隶来说，奴隶制阻碍了这种机能的发育。奴隶制在奴隶主身上产生的第一种后果，就是使他们脱离直接向人提供生存手段的劳动；第二种后果，就是使他们鄙视劳动。在古代，奴隶

主认为，只有一种技艺不是低贱的，即豢养，租赁并买卖奴隶。据说，奥克塔夫的一个祖先因为开银行，后代人就觉得蒙受耻辱；而马尔居斯·卡顿买卖奴隶，却成了风俗的捍卫者！

这种轻视体力劳动，认为体力劳动是下贱的看法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是普遍的；在殖民地的整个奴隶主阶层，这种看法也是普遍的。即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欧洲普通工人，如果他拥有一个仆人，他只要从事体力劳动，马上会认为有损他的尊严。荷兰人在本国是那么看重各种类型的有益劳动，可是到了巴塔维亚和好望角，便对任何工种都感到无法忍受的鄙视和憎恶。在圣赫勒拿岛、牙买加岛，在英属的所有殖民地的英国人，在南部 10 个州的英裔美国人，全都放弃了任何劳动。在匈牙利、波兰、俄国，奴隶主从来不劳动，农奴只在田地里干活，仅仅犹太人办一点工业，可是，这些犹太人已经倍受歧视，绝不肯因为有益于社会而招致更大的歧视。因此，奴隶制虽然不见得损害奴隶主阶级的身体器官，但是后果却使他们的器官丝毫不能从事于人民生存不可缺少的各种行业。这些器官不仅对整个人类没有益处，而且对具有这些器官的个人也没有好处，而只会给许多人带来损害。假使有一天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奴隶主突然在一个实行奴隶制的国家灭绝，任何类型的劳动却不会停止，人们不会惋惜损失任何财富。除了他们使奴隶遭受的痛苦会停止，其他什么也不会停止。

奴隶主由于鄙视劳动，技艺的能力停止了发展；同样，奴隶由于处在奴隶主给他们造成的愚昧状态中，技艺的能力也停止了发展。凡是要求智慧、兴趣与精心的工作，今天的奴隶都不能做了。古罗马那些宏伟的工程，修建的人大概都是在他们自由的时候练就的技艺，后来在战争中变成了奴隶；因为，罗马征服了所有掌握技术的人民，此后只能掠夺野蛮人来充当奴隶，情况一旦至此，一切艺术，各类工艺，很快就都衰落了；他们本身也重新沉沦到野蛮状态。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论述，接下来看看，奴隶制不但对奴隶主的智力，而且对奴隶的智力产生了什么影响。（第 4 章，第 54 页。）

至于奴隶主，必须把享受政治自由的人，同被剥夺自由的人区别开。前一种人，确实相当成功地发展了他们的智力，以使用来影响与他们平等的人，然而，他们绝不发展他们可以用来掌握物质的能力。后一种人既没有发展智力，也没有发展掌握物质的能力。人由于懒惰，每逢选择的时候，总喜欢强制而不喜欢说理，总喜欢施威而不喜欢说服；可是，古代自由城邦的公民，由于不能象指挥奴隶那样指挥与他平等的人，就不得不学会说服。这样，他就要研究人，研究他要说服的那个与他平等的人；可是，他不研究自然，他仅仅通过他的奴隶的胳膊作用于自然。他认为没有必要发明使奴隶们省力的方法：因而，一切实用于技艺的科学，他都觉得与他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当公民丧失政治自由，他对研究人就再也没有兴趣了，他对研究自然的兴趣也不比从前大；他放弃了一种没有目的的劳动，全部知识便都泯灭了，其结果就是回到野蛮状态中去。

在欧洲人的殖民地中，只有在英国人的殖民地中，殖民者才能从祖国得到一些政治权力；也只有在这些殖民地中，他们才感到有发展智力的需要，这使他们能够以理说服与他们平等的人，并且只是依靠政治自由所允许的手段，在与他们平等的人中间赢得一点权威。在其他人民的殖民地中，宗主国

掌握绝对的统治权，殖民地的主人只需要一面服从上边，一面指挥下边，表现出恶霸与奴隶所特有的愚蠢性，只有那些远离这种奴隶制的景象，在祖国培养起来的人例外。作者列举事实，并通过所有旅行者亲眼目睹的详尽材料证明，在好望角的荷兰殖民者，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殖民者，在他们奴隶最多的一些省份的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全都轻视任何形式的教育。

在美国，由于有政治自由，主人也就能够发展智力。但是，南部各州的公民，只发展控制人的能力，而北部各州的公民，既要控制人，又要控制物，他们分别从事这两种职业。因此，南部各州也许提供了更多的有统治才能的人。华盛顿，肩负战斗或统治人的使命，可以出生在一块由奴隶耕种的土地上，但是，富兰克林，肩负照亮世界、增强人对自然的力量的使命，只能在自由之手创建艺术之邦里成长起来。

至于奴隶制在奴隶身上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奴隶的智力得不到任何发展。因此，在美洲的殖民地中，一切体力劳动都由奴隶承担，凡是需要发挥智慧才能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奴隶主不得不从废除奴隶制的国家进口。主人可以使用他们的奴隶采伐和运输树木，但是，若想制造船舶，他们必须将木材运到有自由工人存在的国家去。他们可以让奴隶以粗放大耕种土地，通过奴隶的劳动收获小麦，但是，若想将小麦磨成面粉，他们不得不将小麦运到有工人会建造磨坊的地方去。奴隶甚至不能象农业要求的那样精心地耕作；他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也没有足够的精心来种植蔬菜或果树。总而言之，奴隶的技能非常低，因而农业依然处于最原始的状态；森林虽然近在 7 英里之处，奴隶主还是要从英国进口煤来取暖。他们要盖房子，有时甚至还得进口砖。

奴隶没有能力搞任何工业生产，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心灵才能手巧。我们身体的器官，不过是我们智慧的工具。智慧如果得不到丝毫发育，指挥它掌握的器官就一定非常糟糕，可是，在所有建立奴隶制的国家，主人不仅没有能力发展他们奴隶的聪明才智，而且，他们几乎全都有一种自然的倾向，要阻止这种发展。安全的需要，比吝啬的情绪更有力量，迫使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被奴役的人控制在越接近野蛮的状态越好。罗宾报导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个殖民者，一再重复说他最担心的是有智慧的奴隶。那个殖民者说他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阻止奴隶得到智慧上，在这方面，只能说取得了过分的成功。那些殖民者的看法，同过去罗马人的看法没有差别。审查官卡托恩认为，聪明的奴隶比什么都危险。当他的奴隶不干活的时候，他就逼他们睡觉，他多么害怕奴隶企图思考啊！在现今的奴隶主当中，南部各州的英裔美国人的无知与暴虐程度还是最轻的，然而，他们却非常恐惧地拒绝让他们的奴隶识字的想法。大不列颠有好几个居民做出努力，给他们的奴隶启蒙，使之接受基督教，而服从英国政府的殖民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带着同样惶恐的心情看待这件事。

但是，如果说奴隶制必然导致奴隶主轻视工业，导致奴隶没有能力从事

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译者

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美国物理学家和政治家，避雷针的发明者。——译者
《路易斯安那州之行》第 3 卷，第 68 章，第 197 页。

布鲁塔克：《卡通先生传》。

请看 1825 年 6 月 23 日英国下院辩论。

工业生产，那么，一个民族是是否可以指望既非奴隶主、又非奴隶的阶级搞点工业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确立了奴隶制的国家里，一个既不属于奴隶主阶级、又不属于奴隶阶级的人，不是被迫游手好闲，就是受人歧视，除非他到别处去办工业。如果说，自由人有时同意参加劳动，那么，他所得的工资，也只能补偿对劳动的鄙视；一个自由工人甚至买奴隶，或者一旦他有了一些积蓄，便马上不干体力活了。在罗马共和国，无产者或者由于歧视劳动，或者因为有贵族的奴隶竞争，一个个全被排除任何劳动之外，他们的状况，是一个民族中，既不属于奴隶主，也不属于奴隶的部分，被奴隶制逼进堕落与贫困境地的明显而可怕例子。

奴隶制对人的肌体、技艺与智力的影响就是这样。它对风俗习惯的影响还要更糟糕。奴隶制在罗马人的精神上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使他们好逸恶劳。从缺乏智力与肌体活动和以掠夺方式攫取财富中，滋生了一种毫无节制地追求一切声色饮饌的风气。大贵族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程度，在今天难以想象的。为了供给他们荒淫无度的生活，土地被洗劫一空；一个省份的财富，他们一餐就挥霍掉。一个大贵族的家里，关了人数众多的男女奴隶，在这种杂居在一起的情况下，奴隶主的习俗对他们立即产生了影响。罗马历史提供了这种堕落的最臭名昭著的事例。孔德先生举出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罗马共和国的盛期：一例是判处 160 名贵族院议员夫人，因为她们合谋要毒死她们的丈夫，以便向贪恋女奴而对她们漠不关心的丈夫进行报复；另一例是于 539 年在罗马发现一个协会，参加协会的男女会员集体放荡；罪犯的人数超过 7,000，其中大部分是妇女：他们有半数被判处最严厉的刑罚。作者接着叙述随着奴隶主的财富增加并进一步奢侈，罗马的奴役日益加深；奴隶的食品供给量日趋减少，而刑罚则越来越残酷；叛乱、奴役性的战争、奴隶的私人报仇，不仅对每个奴隶主，而且对整个国家都增加了危险。谈到了这部分，我们感到遗憾，读不下去了。

人们被罚作无休无止的无效劳动，不断地遭受歧视、凌辱与武断的刑罚，而且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人落到这种地步，简简单单地被处死就不再是一种痛苦了。要使死刑变成令人恐惧的，就必须让被惩罚的人慢慢忍受各种各样极端痛苦的折磨，直到死去为止。因此，罗马人要处死他们的奴隶，就必须想出一些刑罚，足以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害怕，不得不忍受生活。那些刑罚只能由奴隶主随意而定，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奴隶不过是奴隶主的所有品。当时最广泛使用的刑罚，就是先将奴隶鞭笞得遍体鳞伤，然后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受这种刑罚的人，可以延续数日才能死去，除非施刑者出于怜悯，伤到了他的一个生命攸关的部位。向我们描述这种刑罚的作家，没有讲到妇女可以幸免，甚至年幼的孩子也不例外，当他们的主人无缘无故地死掉，他们照样要被处死。

接下来，孔德先生遍观现代人的殖民地，以便说明奴隶制所造成的后果，在所有的殖民地都是一样的：荒淫、放荡、残暴。我们就不在这里重述

拉罗什富科尔：《美国之行》第 2 部分，第 4 卷，第 293、294 页；第 3 部分，第 6 卷，第 75 页。第 6 章，第 80 页。

关于荷兰人的殖民地，第 7 章，第 106 页；关于英国人的殖民地，第 8 章，第 140 页；关于英裔美国人的殖民地，第 9 章，第 159 页；关于法国人的殖民地，第 10 章，第 187 页；关于西班牙人的殖民地，第 11 章，第 198 页。

那些场面的最可怕的情景。直到现在，千百万人还在痛苦中呻吟，谈论他们所受的折磨，太让人难过了。我们只是概括地介绍这几章，并且还继续使用作者的语汇。

每当一个女奴生孩子，从婴儿的肤色就可以判断出，他的父亲属于什么人种。由于白人与黑人从来不通婚，主人同他们的女奴的关系，就更难弄错了。所有的混血儿，都是一种不道德关系的产物，几乎总是主人强奸他的女奴的结果。勒瓦扬说，人们到了好望角，看到那里许多奴隶的皮肤同欧洲人一样白，都大为惊奇。然而，在那个国家，从来没有任何白人沦为奴隶；恰恰相反，那里的奴隶始终是埃塞俄比亚种人。主人同埃塞俄比亚姑娘发生关系，生出混血女孩，主人再同混血姑娘发生关系，生出肤色更浅的女孩；最后，埃塞俄比亚的血统消失了，奴隶终于与他们的所有者同属一个种类了。但是，在人种的这类变化中，有一个现象很重要，必须指出来，因为，在几乎其他所有殖民地中，我们还将碰到这种现象。一个殖民者不解放他同女奴生的孩子。他象要求所有其他的奴隶那样，要求他的私生子女劳动和驯服；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将他们出卖，转手易物，或者传给他的继承人。他的一个嫡生子如果把他们继承下来，也并不把他们与他的其他奴隶加以任何区别。就这样，一个弟兄却变成了他的兄弟姊妹的所有者。他以同样的残暴对待他们，要求他们干同样的活，用同一根鞭子抽打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发泄同样的肉欲。一个欧洲人看到有大批的白人奴隶，感到很奇怪，其实，他们差不多全是通奸与乱伦的产物。一位旅行家注意到，在那块殖民地上，亲属之间感情很淡薄，难得看到兄弟俩一起说话。一个人有 10 来个兄弟姊妹，当他把他们看成是属于他的最不值钱的物品，并用来满足他的兽欲，他怎么可能对他的另外一个兄弟有感情呢？

在好望角，土地是贫瘠的，只用来放牧，并出产一些同欧洲一样的谷物。那些产物中没有一种需要花费沉重的持续的劳动。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却是费力最小就能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是最廉价出售的东西。因此，一般来说，在好望角的奴隶劳动并不过重，食品也是丰富的。在荷属圭亚那则不然，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适于生产糖和其他只长在热带的物品。那些通过长时间沉重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是供应出口。由于销路很好，奴隶主从本身的利益着想，便要求他们的奴隶加重劳动负担，加长劳动时间。可是另一方面，由于食品匮乏昂贵，主人只给奴隶勉强维持他们生命的最低限量。

这种截然不同的对照，不仅仅存在于好望角与圭亚那之间：凡是实行奴隶制的地方，无不是残忍丑恶的；不过，在牧区，由于奴隶能有较长时间的休息与足够的食物，情况要好一些；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劳动更艰苦，农忙时间也长；然而，在这些地方，奴隶制还不能阻止奴隶人口的增长。在种植咖啡、棉花、烟草，特别是在种植甘蔗的地方，劳动过量，食物却不足，因此，奴隶人口的死亡率大于出生率。

长得漂亮的女奴不仅惧怕主人或管理他们的人的肉欲，而且惧怕残酷的刑罚，因为，主人或管理人经常以刑罚来逼迫她们顺从或加以惩处，最后，她们还惧怕白人妇女忌妒她们。一个女人要惩罚她的一个女奴，主要是毁掉女奴的容貌，使之变丑。她让人用鞭子专打女奴的乳房，有时甚至用匕首刺

第 1 卷，第 76 页。

巴罗 (Barrow) 第 1 卷，第 130 页。

伤。斯特德曼叙述说，一个克里奥尔妇女，在自己的种植园发现有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奴，马上让人用烧红的铁块烙她的前额、面颊、嘴唇，同时还命人砍断她的跟腱。就这样，这个女人在片刻之间，便把一个漂亮的人变成一个畸型的魔鬼。

概述了奴隶制如何败坏英国殖民地和美国的风俗之后，作者又援引在美国实行的还要可恨的法律，因为这项法律是经过深思熟虑制订的；他还援引了一些事例，这些事例只能被看作是发泄无耻的偏见。法律特别规定，禁止任何奴隶主发展他的奴隶的智力。如果确信哪个主人教一个奴隶识字，他就要被处罚罚金，这项罚金的款额，要比他砍断奴隶的手，或者割掉奴隶的舌头所受的罚金高出7倍。在后一种情况，奴隶主只被判交纳14个利佛尔，而在前一种情况，他要交纳100个利佛尔罚金。法律也明文规定，禁止让奴隶从事任何为他们自己利益的交易。受奴役的人不得有任何集会：一个白人如果在大路上发现有7个以上的奴隶在一起，就可以罚他们受鞭笞，每个人不超过20鞭子。奴隶如果自卫对付白人，就要当作大逆不道来惩罚。天黑之后，任何黑人或者混血种人，没有经过特许，不能出现在大街上。军警不断巡逻街道，如有违者，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要被军警抓走，并酌情给予惩罚。

在西班牙的所有殖民地中，奴隶制都是合法存在的；但是，凡是得到迅速发展繁荣的殖民地，那里的黑奴或者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被征服的土族，当初虽然在非常严厉的制度统治下，但是没有沦为奴隶。这样，除了古巴和一些出产热带物品、并实行种植园制的少数地方外，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中，都是自由人劳动；劳动在那里是光荣的，仅仅这种情况为人类造的福，就胜过政府实行的独裁，对智慧的恐惧，严格的检查制度，以及仿佛为了阻止文明的发展而采取的一切谨慎措施能够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孔德先生通过一系列事实证明，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中，智力、技艺的进步，人口与道德观念的增长，总是与奴隶的人数以及对待他们的严厉程度成反比。

奴隶制损害奴隶的肌体，不但使主人不能从事任何劳动，而且也使奴隶干不了适于自由人干的活；奴隶制促使奴隶主厌恶任何思维活动，也禁止奴隶进行思维；奴隶制阻止中层阶级，即不属于奴隶主、也不属于奴隶的那些人的阶级形成，那种人即使存在，奴隶制也把他们逼到国外去；它使奴隶主养成了可耻残忍的风气；它禁止奴隶有行动的意愿或自由，甚至不准他们具有道德的愿望；证明了上述诸点之后，似乎就已经证明在人类社会所能建立的体制中，没有比奴隶制更悲惨的了。而且不止如此：孔德先生还研究了奴隶制对保证奴隶主私人自由方面的影响，对增加财富的影响，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对政治自由以及民族独立的影响；在这些新的总结的每一部分中，他都以普遍的经验说明，在所有容忍奴隶制的人民当中，对奴隶主和奴隶来说，这种可怕的体制是同样祸患无穷的。

在实行奴隶制的国家里，总有一场可怕的灾祸不断地威胁自由人，因为他们的地位可能要受到怀疑。如果推定一个人是自由的，结果最后证明他根

期待德曼（Stedman）：《苏里南之行》（*Voyage à Surinan*），第2卷，第170、171页，第3卷，第101、102页。

弗朗西斯·霍尔（Francis Hall）：《加拿大与美国之行》（*Travel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424页。孔德先生的著作发表以来，美国南方的立法变得更加严酷了。

本不是自由的，那么，奴隶主怎么能够保住他们的奴隶呢？奴隶如果逃掉，他们怎么追赶呢？他们怎么知道逃跑的奴隶躲藏在什么地方呢？反过来说，如果推定任何人都是奴隶，结果最后证明是自由的，那么，自由人怎么能不经常面临被人当成奴隶对待的危险呢？

在古代人中，拐孩子的现象比什么都普遍。奴隶经常以这种办法向他们的主人报复；他们或者出于报复，或者出于贪婪，甚而出于喜爱，逃跑时将交给他们照看的孩子带走。但是，日后在贫困的逼迫下，他们就把孩子卖掉。古代戏剧经常反映这类拐骗的情形。维吉尔 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年人，尤其是妇女，全逃不脱身分质疑的问题，他们的身分一受到怀疑，就可能在法律上被剥夺自由和名誉。在英国殖民地中，任何埃塞俄比亚种族的人，或者稍微有一点那个种族人民的肤色特征的人，都被推定为奴隶，一直到有相反的证明为止。一个与奴隶主同一种族的人，只要他是纯种，就可以把略微带有一点肤色的人据为己有，不管那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并且把那人当成他的财物留住不放，一直到证明那人是自由人，或者另外有一个主人来索取为止。一个人能通过欺骗或暴力，夺取证明某某是自由人的权利，他就凭这种权利，也可以将那人变成奴隶；因此，他要想把一个人变成自己的财物，只要把那人据为己有就行了。

在欧洲人的所有殖民地，以及在美国，由于这种立法的规则，压在有色人种头上的不幸与危险的程度，人们是难以想象的；在美国北部各州，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劫持自由的男人或女人，以便重新将他们卖到南部各州的骇人听闻的强盗行径，也是罄竹难书的；还有滥用所谓学徒合同的可耻行为，甚至在废除奴隶的州里也屡屡发生，以便把有合法权利享受自由的人，保持在真正的受奴役的地位。当然，时至今日，这些不幸还仅仅打击一个这样的种族，就是白人对他们既没有表现出慈悲，也没有表现出同情与怜悯的种族。白人对待这个种族，既抛掉全部的道德义务，又抛掉了全部的宗教义务，而这种宗教义务，不仅把我们同人联结起来，而且把我们同一切有感知与苦痛的生物联结起来。然而，欧洲人的罪孽，终于反过来替黑人报仇。我们看到欧洲人放荡所生的孩子，同白种人十分相近，到了无法辨别的程度。纯白种的孩子，可能会被人从他们有钱的父母身边偷走，被当成混血儿或者混血种人的儿孙卖掉，而孩子家庭毫无办法将他们讨回去，这种时刻已经来临。

在谈到奴隶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时，孔德先生反对下面这个问题的不道德性是正确的：“奴隶所干的活，比自由人干的活花费少吗？”这就如同问，拦路抢劫的匪徒通过绑票向游客索取赎金所得到的产业，是否比用某种技艺挣得的产业付出的代价少。更糟糕的是，把人类最大的部分视为生产机器，因为这种机器只消耗它所生产出来的财富的很小部分，所以认为它更有价值。不过，孔德先生在使人感到这个问题提得多么不恰当之后，仍然指出来，一个人用鞭子把许多人打得皮开肉绽，以这种办法从他们身上取得的劳动，对他来说，比他付给他们合理的工资而从他们取得的劳动代价要大。

人们可以给奴隶主算一笔帐，以便向他们证明，废除奴隶制对他们本身

第 12 章，第 223 页。

维吉尔（Virgile，公元前 71—19 年），古罗马诗人。——译者

第 13 章，第 237 页。

有好处；可是，作者给国家算的这笔帐还为重要。他论证了奴隶创造，分配和积累的财富，比在任何制度下社会劳动可能达到的都要少。实际上，在一个拥有奴隶的国家，奴隶主厌恶劳动，认为劳动可耻；从生产和积累财富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体力，同时包括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全都浪费了；此外，他们由于不得不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便滋生了一种偏好，迷恋声色之享乐，迷恋一切能够打破他单调生活的东西：美食、女色、赌博，以及各种各样能很快挥霍掉别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恶习。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除了奴隶主，就只有奴隶，居民中的任何别的阶级都必然消失了。但是，奴隶一无所有，也不能积累任何财富；在穷困和愚昧方面，奴隶沦落到人可能达到的最低程度。造成他们愚昧的有三种原因：一是主人特意使他们蠢笨，以保证本身的安全；二是他们被繁重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时间进行任何思考；三是他们对受教育没有丝毫利益可言。奴隶的可用之点，仅仅是当苦力；当奴隶把产品交给主人，主人对他就再没有任何要求了。

奴隶由于被剥夺了智力，虽付出一些劳动，却尽量设法少出产品；他创造的财富，同他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此，他在规定的耗费上，尽量造成浪费；因为他如果节省，只能对他有危险。在一个由受奴役的人们开发的国家，就生产财富方面而言，依靠的仅仅是奴隶的身体器官，而且，那些器官被剥夺了智慧与活力的一切因素，只能通过鞭子来推动。然而，体罚可以使奴隶的身体动起来，却不能产生自觉情愿干活的劲头；即使产生出这种劲头，一种缺乏灵巧、智慧与道德的力量，不管它有多大，也不能生产很多财富，更不能积累很多财富。

我们对古代人的工业史了解很少，仅仅大致知道，只是在有少数奴隶同劳动结合，而不是完全由奴隶承担劳动的人民那里，工业生产才得到了发展。农业也是如此，仅仅在执政官统治时期才得到发展；但是，奴隶的人数在意大利越增加，土地的肥力越减少，最后不得不改成牧场。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判断，在殖民地，奴隶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农业差不多是那里存在的唯一生产部门，但耕作却不是精耕细作。消耗地力的作物一茬接着一茬，土地得不到休耕；奴隶的劳动没有任何利益激发，据旅行家们说，他们在同等时间内干的活，勉强相当于法国自由工人干的十分之一。因此，他们劳动的果实，食物，当然更贵。凡是确立奴隶制的地方，在殖民地，在美国的南半部，土质变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木匠、金匠、泥瓦匠等各行手艺，奴隶都没有能力掌握；美国南部各州的居民，不得不出高价从北部雇佣工人修建房屋；但是，那些工人干完了预定的活，马上就离开了，又去建新的工程。要想维修房屋，就必须等几年之后。因此，那里完好的住房很少，有时会看到一桌山珍海味，一色的银制餐具，却摆在一间半数玻璃缺了十年的房屋里。其结果，在拥有奴隶的国家里，奴隶主必须从国外进口一部分食物和全部工业品，他们要出高价才能得到一切需要智慧的服务，可是，他们从土地获得的收入，只等于在一个没有奴隶的国家里所得的一半；因为，在面积和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土地售价的比例就是这样。因此，几乎所有的奴隶主、所有的土地所有者，个个债台高筑，生活窘迫。根据牙买加殖民者议会呈送众议院的一份报告，那些殖民者几乎都负债累累，近年来，经过法院批准，他们的甘

罗宾：《路易斯安那州之行》，第1卷，第6章，第92页。

拉罗什富科尔：《美国之行》，第5卷，第2部分，第95页。

蔗种植园有四分之一拍卖。

在研究奴隶制对居民各阶级人口增长的影响时，孔德先生特别强调这样一项原则：由于人口只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每个奴隶主必须有 5 个或 10 个奴隶的劳动供养才能生活，这样，奴隶主的人口若想增长，奴隶必须以高出 5 倍或 10 倍的相应比例增长。然而，由于在奴隶制度中，被奴役的人口非但不增长，反而急速地减少；在殖民地的白人人口的增长不但意味着、而且也必然引起人口贩卖增加得更快，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罪恶也增加得更快。

作者用这样的话概括了奴隶制对政府的意图与政府的性质的影响：这样，在一个一部分居民被当成产业，掌握在另一部居民手中的国家里，我们发现奴隶主阶级的大部分人都自然地企图钻到政权机构（由于他们的个人经济始终拮据，并且厌恶一切劳动），而且还本能地有占有别人创造的财富的意图；我们发现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被奴隶制削弱或阻止技艺发展的那部分居民，同样准备同任何打算征服或消灭奴隶主阶级的人联合起来；最后，我们还发现，专制主义，削弱或消灭奴隶主政权的专制主义，即使是最严酷的，对奴隶也是一种恩惠。广大群众倾向拥护建立个人独裁；当这种专制主义建立起来，它在行使这种权力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奴隶主在剥削他们的奴隶时的那种贪婪、野蛮、残酷和愚蠢。

从为了论述奴隶制对人民独立的影响而搜集的材料中，可以引出两条重要的真理。第一条，所有使其他人沦为奴役地位，或者占有奴隶的人，仅仅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就处于两种敌人之间：他们或者有被他们占有的人杀掉的危险，或者有被外国人奴役的危险。第二条，每当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真正联合起来的时候，奴隶主就没有任何办法抵抗了。

应该结束这样大段的摘录了；可是，还剩下另外 7 章需要分析：论述“奴隶制对宗教，宗教对奴隶制的相互影响”的那一章，也许比哪一章都更值得我们注意。然而，我们绝不能用摘录来代替我们分析的这部书；我们指出在孔德先生之前，对奴隶制所带来的后果研究得多么少，指出奴隶制历史在人类通史中多么重要，它对于研究古代伟大的人民迅速衰落具有多大的启发作用，它还使人预见执意保留这种凶恶的麻风病的现代人民要遭受多大的痛苦和不幸，我们指出这些，无非是想引起人们读这部书的兴趣。任何人阅读孔德先生关于奴隶制的这部著作，都会受到新的启发。我们在翻开这部书之前，当然并不是对我们受奴役的兄弟漠不关心，或者同情奴隶制。然而，我们阅读完这部书，更加透彻地了解了这种制度所固有的全部荒谬性、残酷性与毁灭性，以及它破坏一切使民族具有价值，或者使生活具有意义的东西表现出来的有效性。这就是我们读后所得到的印象。我们热诚地希望别人也得到这种印象；因为，我们再重复一遍，奴隶制绝不仅仅是过去时代才发生的一种灾难，这种灾难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人类，还在一些民族中扩展，而那些民族的人口正迅速地增加，已经成为大部分可居住土地的主人。对人类的命

1825 年 2 月 25 日的报告。《东西印度甘蔗园》（EastandWestIndiaSugar），第 121，122，128 页。

第 14 章，第 283 页。

第 15 章，第 299 页。

第 16 章，第 330 页。

第 18 章，第 378 页。

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指出奴隶制的必然后果，以便在开创新文明的国家里，铲除这种穷困、愚昧和罪恶的根源。

第九篇 论黑人耕作者从奴隶制解放出来应遵循的道路

几乎在整个地球上，人们都可见到农民阶级陷入痛苦穷困的境地，这是一件既古怪又令人痛心的事情。土地生产的财富，是人懂得追求的第一批财富，是人生存最需要的财富；而生产这些财富的人，不仅有资格受到人的怜悯，而且有资格得到人的承认。在各种历史时期的开始阶段，我们都能了解到农民生活在自由、安宁与纯真中。在我们的想象中，那种生活景象十分甜美，各种语言的诗人都向我描绘了田园生活的幸福。黄金时代的寓言、各民族的田园诗歌，也向我们叙述了田间劳动与消遣相交替的富裕生活，好象那就是我们渴望的目的。在任何一个耕者是自由人，又是土地所有者的国家里，我们都能目睹到这种幸福景象。瑞士农民，甚至还有托斯卡纳农民，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对诗人凭想象塑造的农民，没有任何艳羡之处。然而，就在财富积聚最多的地方，炫耀自己的文明最起劲的人民，好象竞相促使农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竞相探察可能把农民推到困苦的最后限度是什么，既不让农民丧失生命与劳动机能，又不给予他们任何超过这个限度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欧洲最富、最文明、最人道的民族，他们使它的农民落到什么境地；在苏格兰与爱尔兰农民的命运中，我们可以认定威胁英格兰人本身的命运是什么，而且，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打击到英格兰人。虚假的财富学派的观点，如果继续被其他民族接受，那么，欧洲其他地方的农民，也将被推向这种命运。

然而，也正是欧洲最文明的人民竭力剥夺农民，不仅剥夺一切他们认为对维持农民生存是多余的东西，一切可能给农民的生存添点温暖的东西，而且连农民的理智自由都剥夺了。这些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把与自己不同的一个种族牺牲掉，将他们打入原始人的行列，禁止他们运用自己的意志和认识善与恶，把在自己家废除了的奴隶制又重新加到他们的头上；这些人民凌辱黑人，又因为他们是奴隶而仇视他们，不把他们当成人看待，同时又对他们怀着只有人才能激起来的憎恨、忌妒与报复心理。这些人民甚至不考虑黑人种族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只要找到一种生存方式，使奴隶在累死之前，主人得到最大的收益就行。他们估计，一个黑奴在食物不足与过重劳动的情况下，用鞭子驱使可以干十年，过了这个期限，他最好死掉，主人再另外买一个。贩卖奴隶就是基于这种无耻的打算，直到现在，这种贩卖活动还没有完全废止。

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全都干了这种骇人听闻的勾当，参与了这种惨无人道的交易。干这种勾当的人，也确实是一小撮亡命徒，是这些民族的败类，他们远离祖国犯下累累罪行。美国人比这些国家的人民罪过更大，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自己的家中，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时至今日还继续违反上帝与自然的法规，将农民踩到低于野蛮人的地位；他们从这个州往那个州贩卖奴隶，当他们听到人类憎恶这种行径的呼声，就变本加厉，压迫得更凶。

然而，在地球上，对慈悲心和永久正义的无耻践踏已不能再容忍，这种时代很快就会来临；慈悲心和永久正义应该把所有的人联结起来。黑人奴隶甚至会在爱尔兰农民之前改善处境，因为，人们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使黑人受害的立法是极不公正的；可是，爱尔兰所受的痛苦，是一种复杂的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很难认识，更难判断，并且给人造成印象，认为遭受痛苦的

人是咎由自取。英国以巨大的财政支出，在赎买被它奴役的人方而已经主动付出了代价，这种光彩的行动确实弥补了它祖先的过错。这种榜样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不管殖民者出于贪婪，还是出于统治的欲望，多么激烈地反对这种榜样，也是无济于事的。法国政府已经宣布，它准备效法英国的榜样，只是犹豫采取什么方式。当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恢复了黑人作为人的地位，任何别的民族还把他們当成野蛮人对待的日子就不可能长久了。

关于殖民地以及今天所有由奴隶进行生产的国家，立法者应该确定什么目的呢？我们认为在前面各篇中，已经给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政府要全力促使百姓安居乐业。政府的职责，就是让所有的居民，或者它的大部分居民，享受政府赐予的最大幸福。最广大的阶层，也就是农民阶层，它最容易得到幸福，对其他所有阶层的幸福也贡献最大；在殖民地，只有这个阶层创造财富；在那些特别的国家里，只有这个阶层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此，立法者确定的目的，应该让自由而幸福的农民开发殖民地，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万民安居乐业，首先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不过，立法者也要在农民劳动有剩余产品的前提下，设法保证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便使有闲暇而聪明的人同殖民地居民生活在一起。最后，立法者还应该希望，这两个阶级从农业所得的收入能够卓有余裕，通过他们的消费促进工业阶级的新繁荣，他们这种消费，或者从祖国进口工业品，或者在殖民地当地培养造就一些人来满足需要，添补农产品的不足。

在这三个方面，殖民地的情况，恰恰与我们认为立法者应该希望它们的那样相反。全部农活都由痛苦不堪的农民来干，那些农民几乎一无所有，忍饥挨饿，受人鄙视，浑浑噩噩，但是，他们极端仇视统治他们的秩序。岛国的全部地产，都掌握在经济拮据的富人手中，他们负债累累，穷于应付，他们的全部收入就是食品，卖又卖不出去，因为食品价格逐年下跌。最后再看工业阶级，他们处于同样的困苦境地；直到目前为止，工业阶级在殖民地微乎其微，而且，由于殖民地的债务人无力偿付，宗主国的商人不断破产。当殖民地中占人口大多数，占绝大多数的奴隶一贫如洗，什么也不消费，而所谓富人又捉襟见肘的时候，情况怎么能不是这样！

那么，在殖民地，农业怎么使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都同样陷入困苦境地呢？那些地区位于世界气候最好的地带，土地十分肥沃，欧洲任何地方的土地都不能与之相比；再说，只有那里适于种植热带作物，而且，今天人们已经广泛食用那些产品，所以长期以来，种植园主利用对蔗糖与咖啡的垄断权，对付世界上最富的、最文明的国家。同时，殖民地不纳税，它们政府的开支，它们本身的开支，并不由它们负担。它们自己无法保证的开支，却来源于一个自然条件不如它们，但治理得比它们更明智更好的国家。为什么得不到利润，收益又少得可怜呢？这种原因，我们已经有机会不止一次地指出来。滥用权力、贪得无厌的人，反过来自食其果；产业主在帮助他生产的人身上所赢得的利润，并没有实际价值，而且会很快使他破产；特别是在前一篇中，我们能够详尽地看到，在使用人的劳动的各种方式中，奴隶制是最昂贵的；奴隶制这种方式投资最大，收益最小；奴隶主使自己的奴隶变得愚昧无知，剥夺他的意志和智慧，只给他留下恶念，结果吃亏的是奴隶主本身。然后，在吃穿住等条件方面，奴隶主对奴隶无论怎样刻薄，怎样夺取他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也全无济于事，奴隶主虽然使他只剩下傻力气，可是要维持这种傻力气，花费也还是太高。即使把买黑人的价钱忽略不计，同自由人的生活费

用与劳动比较起来，黑人的生活费用依旧抵不上他的劳动应得的代价。千万不可无视奴役劳动付出的代价比较昂贵的这一重要事实，因为人们应当从中得出结论，在废除奴隶制的时候，主人丝毫没有权利要求赔偿。确实，在奴隶劳动中，奴隶主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产业；依据现行法律，尽管这些法律很不公正，他只有在使他的奴隶能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才有权占有奴隶的劳动；这就象黑人当初不是他的奴隶时也能生活一样；只有在能使奴隶生活下去的情况下，他以同样的投资，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成果。

关于自由劳动与奴役劳动的收益的这种对比，种植园主用一个甘蔗园的经营细节来迷惑人的思想，一口咬定一个制糖厂非奴隶制不能经营。人们似乎应该下这样的断语：他们的制糖厂仅仅因为奴隶制而破产。用甘蔗制糖，不知比甜菜榨糖强多少倍，甘蔗含糖量多得多，榨糖也容易得多，人们能够怀疑这一点吗？然而，甜菜是自由人栽种的，栽种的人带着智慧、灵巧和感情耕作，非常关心甜菜丰收。甘蔗是用血和泪的代价种植的，种植的人希望看到他们要挖沟的土地沉到深渊里。甜菜种植使法国农场主发了财；甘蔗种植却使安的列斯群岛的种植园主破了产。有人提到要向甜菜榨糖业征税；然而，在征税原则提出来之前，整个欧洲已经争先从法国引进甜菜的种植，建设新的制糖厂。事实上，起码可以这样讲，只要在安的列斯群岛维持奴隶制，那里的制糖业就完蛋了。从前，制糖是赚钱的工业，它可以支撑生产的巨大费用，只要在热带地区有几古里见方的肥沃土地，就能垄断整个世界的糖业生产。但是，自从把产量更高的甘蔗从南美洲海岛引进安的列斯群岛之后，自从把制糖厂迁到中美洲平原上，仅仅那里就能生产世界需要白糖的100倍之后，自从东印度群岛开始产糖之后，最后一点，自从发明了甜菜榨糖之后，甘蔗园主就只能缅怀他们糖厂的过去产品，恰如缅怀永不复返的黄金时代。

种植园主还企图让人相信，根本没有必要正式废除奴隶制，因为，奴隶制的废除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他们虚伪地公布统计表，说明在法属的岛屿上，奴隶主都积极地使符合条件的黑人获得自由，解放了的奴隶的人口与日俱增。对于那种解放的性质，他们的动机，以及对那些受保护人的条件，人们尽可以挑毛病；不过，应当向他们做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把经营殖民地建立在自由劳动的方面，他们没有迈出一步。土地需要的，农业需要的，人类需要的，国家安全需要的，全是农民，是自由而幸福的农民。解放在殖民地中确实常见，那不过是在城市还没有任何工业的国家里，招募城里的无产者罢了。被解放的人到海港码头充当散工、水夫、掮客、船夫、卖饮料或小吃的小摊贩。他们虽然不是私人的奴仆，却是公共的奴仆；而且，他们永远也不能胜任一种创造财富的行业；他们从来没有受雇来从事农业生产，哪怕当短工也好，可是国家的唯一收入就是来源于农业；他们从来没有到自由人在热带地区开设的为数很少的行业里，按月或者按年做工。他们在懒散、穷困与罪恶中过一天算一天，碰见有人吩咐就打个零工，他们一天天堕落下去，使他们整个种族蒙受不公正的偏见。

奴隶制的铁链将黑人锁在种植园主的桎梏中，打破这种铁链，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把黑人改变成农民。要使殖民地的土地继续得到耕种，要使对人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劳动得以完成，要使土地财富不至丧失，要使全部固定在土地的资金，或者旨在发挥土地效用的流动资金不致损失，就必须把

黑人改变成农民；要使社会存在，必须这样做；因为，正如人们今天在殖民地看到的那样，白人认为参加劳动有失体面，而被解放的人，只准许他们当搬运工或送货员，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农民，没有奴隶，过不上两年，全体居民就会被饥馑席卷而走。

为了黑人的幸福，为了他们的道德，为了他们的智慧，一定要把他们提高到农民的水平。立法者应当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的作用最重要，由于他们养活了其他所有的人；他们受到极不公正的迫害，受到天主与人的法规都不同意的一种罪恶的迫害；那种罪恶不仅剥夺了他们在人间的一切幸福，而且剥夺了他们的全部智慧、全部品德、人类的神圣品格，也许把他们的整个前途都剥夺了。从他们遭受的所有痛苦考虑，社会应当向他们作出全部补偿，社会必须把他们的利益置于其他任何利益之前。

还必须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地位，这样做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以便使社会中木数最多的阶级不致使社会动荡，以便使这个阶级不再准备同任何使它燃起希望打破枷锁的内外敌人联合，以便不再让非人道的怀疑、不公正的判决和残酷的刑罚玷污立法，腐蚀道德，以便使劳动不再是可耻的事情，以便使社会的全体成员都争相创造和积累财富，以便让民族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回到消费者的行列，从而使它发挥作用，既促进殖民地，也促进宗主国各城市的所有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最后，要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地位，也是为了种植园主本身、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我们根本用不着强调他们这样做，将从中得到多少精神上的好处，将搬掉他们智力发展的障碍，将从他们家中排除各种罪恶的诱惑，用不着强调他们将避开一直悬在他们头上的匕首，也用不着强调他们将结束威胁他们孩子的千百种危险。种植园只要想恢复一些财政的独立性，就需要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地位上。他们需要改变耕作方式，因为，现在的方式耗费最大，最容易导致破产；在各种劳动中，奴隶劳动付的代价最高，收益最少。他们的产品，全部供应外国市场，他们确定的种植方向，最容易使他们受贸易变革与壅塞之害；今天，在所有的市场上，他们的产品已经过剩，这样，他们那种方向必然把他们引向破产；在法国，种植园主之所以幸免破产，也仅仅是因为海关实行不公正的垄断，通过损害法国消费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当今的世界中，任何国家的土地所有者，都没有象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那样负债累累；任何国家的富人阶级，也没有象殖民地的富人阶级破产的那样多；然而，殖民地的土地虽然是最肥沃的，却比任何国家土地的价值都低。

实际上，一个种植园的价格，是以有多少黑人计算的；人们甚至并没有指望全部收回买黑人的价钱。一般来说，土地的整个价值比它更高。

这种益处，的确要强加予种植园主，因为他们竭尽全力拒绝这种益处。当然，一个阶级的人无视自己真正的利益，拒绝有益的，选择有害的，尤其是要维护现状，不愿意代之以未知的东西，尽管现状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病，这种事情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而且，在奴隶主以往的全部经历中，有某种东西促使他们产生幻想。他们用一笔资本买了奴隶，卖掉奴隶得换回资本；当他们失掉奴隶时，必须由一笔资本来顶替。毫无疑问，他们非得有相当大的本事，抽身出来旁观，才能明白他们拥有的黑人价值等于零，完全等于零。然而这是一个事实。他们买了一个黑人，究竟得到什么了呢？得到黑人扣除生活费用的劳动剩余价值；可是，他们雇佣任何自由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

所做的恰恰是同样的交易。不过，黑人的待遇虽然更糟，而费用还是比他在自由的情况下要高，因为，他的生活费用不是按照他的节俭原则来安排的；黑人的劳动虽然是强制性的，而产值却比他在自由的情况下要低，因为，他的劳动不是由他的智慧指挥的。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唯一的金钱问题，就是比较每一种耕作制给他带来的剩余价值。必须指出，一个主人在他的奴隶身上行使的权力，不能仅仅用金钱来衡量。自己发号施令，立即有人服从，这是一种乐趣；有的人把别人吓得发抖，按照自己的一时兴致进行赏罚，高高凌驾于法规之上，自认为比整个黑人种族优越，他们本身可鄙，却鄙视黑人，并且依赖黑人满足他所有的嗜好、所有的邪恶，这些全是乐趣；然而，这类乐趣，任何阶层的公民享受，社会都不应该给予保障。

要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水平，立法者必须首先探求，采取什么耕作契约，才能在保障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同时，保证耕者享受最大的幸福，保证耕者的精神与智力得到最大的发展；立法者还应当探求，采取什么契约，从奴隶制解脱出来的人，在被剥夺了一切，甚至被剥夺了劳动的智慧与意志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履行。最后，立法者应当探求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救济，才能使奴隶具备条件进入新的地位，才能在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的食品生产也会继续，才能以一种适当的奖惩制度维持新的秩序。

我们在前几篇中，已经给这些不同的问题准备了答案；我们研究了土地所有者与耕种者之间的好几种契约，土地就是通过那些契约进行耕作的；我们也不止一次描写契约史，以便说明各国人民，包括我们的祖先在内，通过什么道路从奴隶制到达自由。因为，所有国家都有非正义和野蛮，今天迫害黑人的罪行，在地球各个地区都先后犯过。不过，我们将扼要地复述一下我们的见解，我们宁可重复一些，也不愿意在这里留下难解之点。

自由农民，或者即将要获得自由的农民，为另外一个人耕作土地的条件，可以归纳成四个主要方面。农民从土地所有者的手中拿到土地，做为交换，可以把半数劳动日给土地所有者；他可以不用把土地接过来，而是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劳作，双方平分所得的收获；他也可以交纳定额地租，而不用交纳一半收成，到规定的年限再把土地还给所有者。最后，农民还可以永远租佃土地，同样交纳这种定额地租或者固定的劳役。第一种契约下的称为农奴；第二种契约下的称为分成制佃农；第三种契约下的称为定额租制佃农；第四种契约下的称为永佃制佃农。可以看出，我们没有把农业无产者或者说短工放在农民的名目下。其实，农业无产者并不属于乡土，乡土也不属于他。

我们将农奴列入这个发展阶梯，读者绝不要惊奇；农奴，正如他同土地所有者签订的契约规定的那样，他在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虽然还依附于领主，已经不再是奴隶了，尽管领主的政治权力可能而且必然被大大地削减了。农奴还被看成是主人所有，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一所住房、一些土地、羊群、车马，这些全属于他。每周，他只需要亲自服三天劳役，其余三天，他可以支配他自己和他的产业。这种契约是不好的：它使人变得愚昧，阻止农业的发展，酿成并维持仇视的感情；不过，它给农民造成痛苦的程度，远不如一些自称为更文明的国家里农业无产者的遭遇。从衣、食、住，以及时前途的安全感几个方面，比较俄罗斯农民与爱尔兰农民的情况，后者的条件显然要糟得多。这种契约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里面还保存当初奴隶制的因素；它之所以不好，还因为它保留了农奴与奴隶之间的相似点。

农奴在自己土地上劳动的三天中，确实象一个自由人，他把智慧和感情都倾注在土地上，因为他受到希望的激励；然而，在另外三天中，他怀着厌恶、恐惧和偷懒的心理，象奴隶一样在领主的土地上干活；在俄罗斯，如同在安的列斯群岛一样，为了让农奴精神集中，快点干活，监工往往使用鞭子催促；可是，在俄罗斯也好，在安的列斯也好，鞭子永远也不能代替意志和智慧，农奴在三天的劳役中，干出来的活抵不上他平时一天的自由劳动。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许将研究俄罗斯与波兰的农民如何才能提高地位。我们绝不会建议将农奴制引到安的列斯群岛，以取代那里的奴隶制，尽管黑人同白人一样，都会从中得到好处；当人们已经战胜了阻止改革的一切障碍的时候，如果人们半途而废，那就未免太可惜了。东欧国家的状况足以表明，这种契约是多么阻碍农村科学与文明的进步。不过，做为例外采用这种契约，ad terrorem，也没有丝毫的坏处，可以用来惩罚一些不愿意遵从任何耕作制度的黑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置若罔闻，一离开监工的鞭子就不能干活。

对半分制租佃契约，正如我们介绍过的那样，给托斯卡纳地区农民造福，我们认为，它也最适合让黑人安居乐业，使农业生产保持繁荣，确保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高于他现在从种植园所得的收益。这种契约在任何地方实行，也许都是最公道的，它既保持土地所有者有最大的收入，同时也保证农民有最大限度的安乐与安全；但是，它对殖民地，对从奴隶制解放出来的人们，显然特别适合。另外，我们也论述了，即使在最繁荣的国家里，租佃制也有弊病，它促使农民之间竞争，竞争的结果，如同在爱尔兰那样，可能把农民逼迫到最可怕的穷困中。而且，这种租佃契约在殖民地尤其实行不通。因此，要根据打算废除奴隶制的国家的状况，来比较这两种契约。人们应该在这两种契约中选择。农奴制只能被当成一种惩罚制度，仅仅在违抗的情况下采用；今天，欧洲最幸福的农民享受产权的好处，全靠交纳定额地租的永佃制，可是，适合永佃制的国情，殖民地根本不具备，这种情况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因此，要想使殖民地拥有农民，就必须把黑人改变成定额地租佃农，或者改变成对分制地租佃农；在这两种制度中间进行选择，如果是在任何别的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情况没有一条会使人看中对分制地租佃农。从种植的作物来看，位于热带地区的多年生植物与灌木，比欧洲南部国家的还要多。甘蔗、棉花、靛青植物、烟草，都是多年生植物；咖啡树、仙人掌是灌木；可可是一种树；香蕉、棕榈、木薯，所有这些食用作物，都长期生长在土地上。在全欧洲，人们体会到凡是灌木性作物，诸如葡萄、橄榄，都不能交给定额地租佃农管理，因为，他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在重新签订契约时把租金压低些，就会在他的契约到期时，故意把园林弄得荒废或者枯竭。一般来说，长期占地的作物，使用犁或者其他节省劳力的工具都不适合；这类作物要求手工操作，要求管理得精心、灵巧，要求注意保护；在殖民地，特别是因为奴隶是他主人暗中的优敌，他的劳动才具有破坏性。对分制佃农则相反，他是他主人的合作者；他在每株作物上花的工夫，与他期待作物所结的果实是相称的。当然，定额地租佃农在租契期间，也关心他的种植园丰产；但是，他不能独自一个人干活，不得不雇佣一些劳力，雇佣的人由于不经心，在短时间内就能给这些多年生作物造成损害，这些作物毁掉，种植园也就随之破

产了。

在殖民地，种植正是用种植园这个名称来表示，如果说，这种种植的性质规定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种植园主只能把他投放到土地上的巨大资本，交给在维护种植园方面同他的利益相等的人，那么，能够经营这类种植园的人，他们的性质则更强烈地要求别人接受他们为对分制佃农，而不是定额地租佃农。定额地租佃农的技艺非常高超，一个从奴隶制出来的人干不了。他在经营中，由于完全要自己负责，他也需要摆脱任何控制；他需要抓销路好的产品，放弃别的产品；他需要在他认为最适宜的时候进行耕作，收获，出售。可是，按照这样的条件，殖民地就没有一个黑人，一个种植园主愿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他。对分制佃农则不同，他习惯于听从主人的指挥；由于他同主人是合伙关系，有共同的利益，双方也都希望发挥各自的知识、经验和技巧。在土地肥沃的意大利，农民有他的老习惯和老经验，可是，他相信同伙更有智慧，绝不会拒绝同伙的建议；在种植园，主人惯于发号施令，黑人惯于俯首贴耳，大家都推定主人经验丰富，聪明伶俐，有远见卓识，而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甚至还有意志，这样的对分制佃农会完全驯服，一直到他自己取得经验，可以启发主人了。

种植的性质与农民的性质，如果都同样地排斥定额地租制，那么，用于农业的资金的分配，就会使殖民地寻求定额地租佃农更加不可能，给黑人留下的，仅仅是对分制佃农这样一种地位。绝不能忘记，从奴隶制出来的人一贫如洗，就连他自己都不属于他，还是别人给他的，可是，除此之外，别人再也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因此，按照习惯，全部资金，都要由土地所有者贷给对分制佃农，他可以贷款，因为，他一直指挥资金的运用，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笔资金并没有离开他的手。他永远也不会同意把资金贷给一个两手空空、拿不出一一点保证的定额地租佃农。他要求，而且应该要求定额地租佃农不仅拥有必要的资金经营自己的农场，而且还有一定的保证，碰到歉年能够交上地租；因为，租金必须是契约规定年限的平均数；土地所有者将大丰收年景的收益让给佃农，不能在歉年时收不上租子；可是，这样一种交易，怎么能同一无所有，既无可丧失，又无可许诺的人来做呢？解放了的奴隶，不能充当定额地租佃农。

然而，从事黑人解放事业的人，似乎特别期望在英国殖民地中，或者有定额地租佃农主动前去，或者种植园主本身转为他们土地的佃农。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将黑人改变成农民，而是仅仅把他们变成无产者，好在农忙时雇佣，然后再辞退。他们促使英国以无比慷慨的精神采取了一项措施，可是，他们仅仅把黑人变成无产者，这项措施恐怕就不完善了。他们虽然付出很高代价赎买黑人，却根本没有把黑人从奴隶制中解救出来，起码说没有把他们从穷困中解救出来；他们根本没有保证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根本没有保证国家的农业生产继续下去，也根本没有保证国家的安全。

正如我们在别处讲过的，为了农业人口的幸福，就必须希望他们全都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希望他们人人劳动，人人安乐；希望参加劳作的人不要分成两个阶级，让一个阶级谋利，而另一个阶级受穷。我们认为人类的祈愿，

我们在伦敦的《新杂志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美国的《美国北方新闻》（North American Review），以及巴黎的《政治经济学月刊》（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1833年12月号上发表的回忆录，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

不是几个农场主发财，而是全体农民富裕。此外，在改善农业方面，精明的农场主，能干的农场主，是本人亲手干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艰苦朴素，能够做出表率的农场主；是要求他的雇工与仆人干的活，他自己样样能干的农场主；是与雇工仆人同桌吃饭，并教他们懂得满足于粗茶淡饭的农场主，是以他的亲身体验确定，他给他们的食物足以维持或者恢复他们的精力的农场主。农场主，或者肯亲自做农场主、把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产业主，只能以这种方式，才能节俭精明地经营他的农业。

欧洲的机灵的农学家，也许没有一个没有这样的体验，在一个他独自经营的农场里，如果他不会亲手做他在理论上所熟悉的事情，那么，他的全部知识对他就毫无意义；如果他不在黎明时亲自下地，那么，他的雇工的劳动起码每天就会耽误一个小时；如果他不象雇工那样会使用农具，那么，他就必须满足于表面的劳动，得不到实在的劳动；如果他不与他们同桌吃饭，那么，他们就会糟蹋东西，使他的开销增加1倍。他也许会试图以一个工头代替自己；的确，他要付工资给工头，但是，他从工头那里永远也得不到主人那样的监督和意志。

在英国殖民地试行的解放，不是将黑人转变成农民，而是转变成农业无产者、短工；这种解放就确定，他们或者在一个租佃整个种植园的白人管理下劳动，或者在种植园主本人的管理下劳动，种植园主经营自己的土地；因为，这种经营体制在欧洲虽然完全独特，在安的列斯却被认为是正常的。然而，要在殖民地寻找一个承租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说在黑人中间找不到，在白人中间同样不可能找到。跑到那些岛屿去寻求发财的冒险家们，一切条件也都不具备，缺乏资金、信贷，缺乏农业知识，尤其不了解当地情况，最常见的是缺乏廉正的品德。再说，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偏见，剥夺了所有白人当农学家的本领，无论是产业主还是农场主，都逃不脱这种偏见：白种人劳动是可耻的。因此，白人经营一个种植园，不管他本身是产业主，是经理，是破产的种植园的财产管理人，还是承租者，无论碰见哪一个，他从来没有亲手荷锄，从来没有尝试干任何一种农田活，从来没有同一个黑人吃过饭。他满足于在一定时间，到种植园里转转，听听工头和黑人监工的汇报，发布指示并施行惩罚。他指望只是用恐怖手段代替兢兢业业。他无知，又无法掌握全面情况，也只能依靠奴隶制来办种植园。一个从欧洲来的农场主，如果并不比他内行，就会很快破产。所有种植园主都债台高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黑人厌恶劳动固然是一条，但也不能小看白人在种植园的劳动中合作不力这一面。

在一种经营体制中，生产的全部领导权和监督权、产业的整个主人翁感、全部智慧，若是统统被白人霸占去，而黑人在里面只能抡臂膀卖力气，如同短工一样，看来，对于这样一种经营体制，白人自己也难以期望能取得多少成果，而这正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如果说，把黑人转变成无产者，不足以保证产业主的利益，那末，就是这种转变，又是多么不完全，想要保障黑人命运的人见了该多么失望啊！我们在考察爱尔兰的情况时，已经研究了人们把殖民地导向可怕的状态。一方面，人们看到那里的一小撮产业主千方百计地节省他们种植园所需要的劳动，这或者是因为他们缺乏资金，或者因为殖民地生产的食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继续下跌；另一方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农业工人阶级，他们一无所有，仅仅靠双手过活，他们为了得到别人的雇佣，竞相抢工作，压低劳动报酬。在这两种人之间，穷人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没有

任何慈善机构救济，而且还得不到丝毫同情。实行这种雇佣短工的经营方式的地方，到了农闲季节，半数黑人就会被辞退，这时让人们派一个使者，到黑人原来的主人那里，向他们陈述被解放的黑人濒于饿死，恳求他们大发慈悲吧。请再看一看牙买加议会的辩论记录，想象一下他们的回答：它会使人人类颤抖。

我们比谁都更憎恶奴隶制，当然，我们也确信，爱尔兰无产者常常陷入的穷苦境地，是黑人奴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比起黑人的茅舍，爱尔兰人的草棚更简陋，更缺少家具和用品，更贫寒。双方全都衣不遮体，可是，爱尔兰的气候潮湿阴冷，爱尔兰人更需要穿衣和住房条件；爱尔兰人的食品种类和营养价值，比不上黑人的食品；爱尔兰人的劳动更少间歇，延续时间更长。当然，黑人在劳动中，有被工头鞭笞的危险，还要遭受主人的反复无常的残暴待遇，爱尔兰人倒不受体罚，只是忍受饥饿的精神折磨，饥饿每天都威胁他和他的孩子们。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两者状况的差异，然而，使英国议会赢得荣誉的这项解放奴隶的举措，所取得的成果，若是仅仅把黑人提高到爱尔兰无产者的地位上，国家就不值得花费2,000万英镑了。

法国在弥补它对人类的专欠时，路应当走得更正些；它必须完成它的事业，黑人也是法兰西的属民，它应当把黑人提高到法国农民的地位上；同时，法国必须不顾殖民者的反对，帮助殖民者，法国产业主应该把安全作为收益给予黑人。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君主不应当计较那些产业主的过错，要为他们打算，要推行一项对他们有利的正确措施，而且，我们也绝不主张把黑人提高到法国产业主的地位上，尽管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变成有产业的奴隶，尽管这是那些省份繁荣的原因。中世纪的混乱局面以及内战，给人类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恩典，当人们目睹混战破坏的惨象：大领主的野心取代了贪婪；他们要把他们的财富转变成力量；他们把他们的奴隶转变成仆从，不向仆从收地租，只要求服劳役。在他们的保卫者身上，他们需要找到爱戴、勇敢、荣誉和美德，这些与奴隶制是格格不入的，为了使仆从萌生这些品质，他们赐与仆从独立的地位。如果他们要仆从把扣掉消费的劳动剩余价值，以金钱或食物的形式交纳，那么，就根本不会唤起那样炽热的感情；在十一、十二世纪，那种感情在过去受奴役歧视的种族中大放光彩，使居民和农业技艺，英勇和对故乡忠诚的品格，都以神奇的速度重新振兴。黑人如果成为他们垦殖土地的主人，他们在智力、品德与经济繁荣方面，会取得快得多的进步，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一点，在圣多明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例证。最近游历了那个岛屿的旅行家所写的日记告诉我们，经营大种植园与大糖厂的平原地区，由于连年的残酷战争，几乎依然一片荒凉：然而，穷苦的黑人携家带口逃到丘陵地区，他们在那里享受独立和自由，他们开垦和种植的土地完全属于他们所有，他们只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装成货箱运往外国市场，那里展现一幅幅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和睦幸福的景象，在一个对累累罪行还记忆犹新的国度里，这些景象可以宽慰人心。

然而，立法者却不能鼓励象在圣多明各发生的、打乱一切所有制的一场革命，而是应该运用立法者的全部权力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立法者远远不能允许奴隶主在解放自己的奴隶时，效法中世纪的领主，把奴隶改造成兵士，而是应该监督公民不得篡夺任何部分的公共力量。殖民地的土地，现在是种植园主的合法财产，而在苏格兰与爱尔兰，有一部分土地属于自由租地的保有者，为此，我们认为立法者应该把近来被种植园主侵吞的权利还给自由租

地保有者。在殖民地则相反，人们虽然希望看到黑人，或者起码看到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上升到拥有地产的农民的地位，立法者所应努力的方向，却是使他们成为在唯一既适于他们、也适于他们的主人的契约下的农民，即对分制佃农，因为，若使他们成为定额地租制佃农，或者农奴，或者无产者，都只能产生危险。

为了改变黑人的命运，必须十分了解要使他们脱离的是什么地位，要把他们安排到什么地位。法律根本没有赋予奴隶以权利，不过，它依然迫使奴隶主对他们负有义务，他们通过买奴隶的行动本身，便承担了义务。实际上，奴隶制包括一种有益权利和一种政治权利。正如我们讲过的那样，有益权利，就是扣掉生活费后的劳动剩余价值。黑奴在不致累死的情况下，必须为主人使出全身力气劳动。主人必须供给他吃穿住，在一个生活很不讲究的国家里，黑奴的生活条件只要按一般情理说得过去就行。主人必须在宗教规定的休息日，在时令反常或农忙之后的空闲日子，要象奴隶在劳动时候那样供给他饭食；在奴隶有病期间，处于幼年时期，或者进入老年期，虽然不能挣一文钱，主人也必须保证饭食和医药。我们不清楚是否有这样的事例，主人有意将年老或体残的奴隶饿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殖民者不敢声称有这种权利，当局也必须干预，制止这种残酷行为。因此，奴隶制是一种类契约，它给奴隶本身一种对付主人的权利，就是享有他经营的种植园产品的权利。

然而，在一般法律中却有一个例外，这种例外的荒谬程度，起码与它的不公正程度相等，即禁止奴隶要求他的权利，尽管立法者承认他享有那些权利，因为，立法者授予奴隶主对奴隶具有毫无限制的绝对政治权力，而他本来应该运用奴隶的权利扼制奴隶主。对奴隶来说，主人胜过一个法官，胜过一个国王，主人居于神与人的一切法规之上。正是这种政治权力酿成各种凌辱、惩罚、罪恶、刑罚来残害黑人；正是这种政治权力腐蚀了白人，既使他们的心变黑，又使他们的思想变坏；正是这种与社会良好组织相违背的政治权力，建立了国中之国，破坏了社会契约的义务，鼓动一些人大逞暴虐，而把其他人丢进最可怕的灾难的火坑。

立法者没有权利授予这种政治权力，这种人对人的权力；两者在法律面前，在社会权力面前，如同在造物主面前一样，都是平等的；废除这种政治权力，是立法者责无旁贷的义务。立法者参与了双方的关系，因此，保留奴隶制的类契约中一切可能对双方有益的因素，也是立法者责无旁贷的义务，立法者应当维护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的权利，也应当维护黑人对于种植园的劳动权利，并且维护他根据他的劳动，从中提取他的费用的权利，他在有病期间同健康时一样，在不可避免的休息时同劳动时一样，始终享受这种权利。

种植园有多少黑人农户，就分成多少份对分制租田，租田按照一种统一的契约出租，那种契约，我们谈托斯卡纳的时候已经阐述过，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人们也都了解；这样，双方就会得到足够的保证，享受他们事先规定的所有权利；主人的政治权力、司法权力将立即取消，这对主人没有别的妨害，只能使他丧失骄横与犯罪的特权。

种植园继续由原来的耕作者管理，每个农户都不会迁走，任何一种经验都不会舍弃，甚至任何一块田地也不会荒废；可是，从此以后，主人就不用花钱雇佣或供养监工和工头了。每一个农业工人都了解他自己的利益，他本身就是一个监工，比所有雇佣的监工都强。黑人挥锄的时候，不仅使用力气，而且要把他的智慧、技巧和经验用上；有了这些长处，用手工操作管理多年

生作物，就比用牲畜和农具不知要强多少倍；作物的长势会更加旺盛，收成将会更好；收成的半数向产业主交租，一点也不减少收入。产业主用不着急于出售产品，以换取流动资金，因为，他再也不用投资，再也不用修理农具，再也不用买奴隶，再也不用为奴隶置办吃穿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收成的另外一半将由黑人用来消费，这是他在从前的地位中就有权享受的，他在没有收入的季节和生活时期，甚至也应当依靠这笔费用。他的费用，自然比从前更充裕，因为他在消费中不会有丝毫的浪费，因为他感到要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必须量入为出，还尤其因为他劳动的产品大大增加，他劳动成果的半数，对他来说是丰裕得多的份额；然而，虽说黑人提高了富裕程度，主人却不会有丝毫损失，而且恰恰相反。农业生产只能伴随农民对农享的感情和他的智慧而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将使主人的收入得到保障，他如果要出售他的产业，就容易卖出好价钱，这是一个奴隶主永远难以期望得到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在普遍实行对分制经营的国家里，对分制佃农几乎总是同他的产业主搞交换，以最畅销的产品换取最适于他消费的产品；这样，黑人会按市价出让他的一半殖民地产品，而主人则给他相应数量的他所要求的食品。的确，农民所得的份额，绝不应该把大部分投入市场；农民要根据他需要的数量，在土地上种植供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因此，产品对口，有固定的消费，就保证避免市场壅塞，也可以避免在今天已危害了所有的工业的那种灾难，而殖民地的工业更是首当其冲的。实行对分制经营之后，生产糖和咖啡的作物很可能不再那么单一，新的农民将多考虑一点他们自己的需要，以及居住在殖民地上的消费者的需要，少考虑一点欧洲消费者的需要。因此，殖民地的出口贸易可能要减少，这正如爱尔兰人若是开始自己食用小麦和咸猪肉，人们就会看到爱尔兰这两种产品的出口减少。我们很高兴终于让读者理解，出口额多少绝不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尺度。其实，只要种植园主不再象现今这样负债累累，而是享用他们的收益，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比较容易地售出他们的产业，只要农民丰衣足食，只要人口的增长同尚未开垦的土地相称，只要农业不断地改善，只要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殖民地就将是繁荣的，尽管它完全停止生产我们今天称之为的殖民地食品。

在执行这样一项重大组织改革过程中，宗主国必须要意识到它要造福人类，绝不理睬地方的成见和偏激情绪。它必须把它的权力授予没有殖民者的偏见、有一定魄力和威望的人。不过，它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以便慷慨地补偿殖民者的损失，使他们同意它的观点，自愿将他们的种植园分为对分制租田，从而首先做出完全成功的榜样。最后，它也必须掌握手段，如果有的黑人捣蛋或者太愚昧，不肯劳动，拒绝它要施给他们的好处，它就遏制或惩罚他们。但是，这些行动手段，不再是政治经济原则的直接后果，也不是司法和人类的手段，仅仅是政府的权限，而一个局外的文人，极不情愿把这些权限赋予一个政治家。我们不再是以建议，而是以祝愿结束这一章和这一卷，祝愿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一致摈弃它们法律还允许的最大罪恶，摈弃它们的贪婪还把它们拖进去的最大谬误；祝愿受它们欺压最深的那个种族，从它们那里得到它有权要求的赔偿，并由它们引导重新获得智慧、道德和自由；最后，祝愿整个人类社会都切实地关心整个人类社会基础的那个阶级的幸福，并祝愿无论什么肤色的农民，都能在风俗习惯、法律、所有人的同情中，得到对

他的富裕、他的独立、他的前途的保障；他的这种保障被剥夺的时间太久了。